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Immanuel Wallerstein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nn

Georgi Derluguia

Craig Calhou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曼

格奥吉·杰尔卢吉扬

克雷格·卡尔霍恩

徐曦白 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2

自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尤其是西方经济大衰退以来，资本主义的现状与未来成为全球公众与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与此相关的讨论与出版物层出不穷，但多数讨论只局限于危机的短期原因和后果，而本书的作者则与众不同，他们不纠缠于微观的具体人物或事件，而是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问题，考察宏大的历史结构性因素和趋势，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矛盾和弊病来推演未来，并发出质疑：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本书的五位合著者都是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界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有几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尽管本书五位作者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相互对话，打造出一个相对连贯的整体思路，最终的结论则是开放的。人类社会必将经历一系列阶段而不断地向上发展，任何历史体系均逃脱不了系统性的崩溃，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处在一场重大的全球历史转变之交？

“终于出了一本不一样、有影响力的著作！这五位杰出的学者用他们的集体智慧和种种分歧展开了一场自由讨论，讨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未来将会如何发展？这本书应当成为全球大学生的必读书，这并不是因为它能给出什么答案，而是因为它向读者展现了所有最重要的问题。”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的五位作者都是思考宏观问题的著名思想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以及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不同情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地消化思考。”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ISBN 978-7-5097-5748-2

定价：49.00元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Randall Collins 兰德尔·柯林斯

Michael Mann 迈克尔·曼

Georgi Derluguia 格奥吉·杰尔卢吉扬

Craig Calhoun 克雷格·卡尔霍恩

徐曦白 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 (英) 沃勒斯坦等著; 徐曦白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5748-2

I. ①资… II. ①沃… ②徐…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505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2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著 者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曼
格奥吉·杰尔卢吉扬 克雷格·卡尔霍恩
译 者 / 徐曦白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徐沅潮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 170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748-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4-0353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Randall Collins, Michael Mann,
Georgi Derluguian and Craig Calhoun.

ISBN 978 - 0 - 19 - 933085 - 0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6

www.oup.co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译出。

作者简介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桃乐西·史文·托马斯社会学讲席教授，美国非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杰出教授，其四卷本巨著《社会权力的根源》被誉为社会思想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

格奥吉·杰尔卢吉扬 (Georgi Derluguian) 俄裔社会学家，现任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研究和公共政策副教授。

克雷格·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 美国社会学家，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译者说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的现状与未来成为全球公众、媒体、商界、政坛以及学术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与此相关的讨论和出版物层出不穷。但是多数讨论局限于这次金融危机的短期原因和后果，很少触及宏大的历史结构。而这正是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五位作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问题，他们不纠缠于微观的具体人物或者事件，而是考察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和趋势，时间跨度从几十年到几百年，同时还从过往帝国的兴衰过程中总结经验，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已经出现的结构性趋势和问题来推演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五位作者都是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其中有几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学术界泰斗级的人物。

撰写第一章的作者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他出生于 1930 年，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于 1959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美国宾汉顿大学等校任教；1994 年到 1998 年间，曾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1999 年退休后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2003 年，他被美国社会学协会授予终身杰出学术成就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其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① 是沃勒斯坦耗时

^① 《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 2013 年出版中译本。

37 年（1974 ~ 2011）才完成的巨著。他开创了研究资本主义的新范式和新学派，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极其深远。他在这本书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中心—半边缘—边缘地区”的不对称结构、准垄断以及全球市场体系的变迁和运作机制，同时预测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结构性危机。除此之外，他还著有《历史资本主义》（1983）、《资本主义之后》（1995）、《乌托邦理想，还是 21 世纪的历史选择》（1998）等数十本著作。在本书中，沃勒斯坦继续采用他的“世界体系”框架，考察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这两种在资本主义常规运行阶段保持系统平衡的机制。他认为这两种机制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中将难以维系，资产阶级获取资本和利润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当最终无法继续获利时，资本主义体系就将面临解体。

本书的第二位作者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出生于 1941 年，是美国社会学家，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桃乐西·史文·托马斯社会学讲席教授，是美国非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 1969 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宏观历史社会学、微观历史学、知识分子研究和社会冲突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主要作品包括《哲学的社会学：学术变迁的全球理论》（1998）、《大历史：着眼长期的社会学论文集》（1999）和《暴力：微观社会学理论》（2008）等。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柯林斯集中讨论了资本主义面临的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即科技对中产阶级工种的取代。他援引马克思对体力劳动机械化的论述，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因机械化灭亡，是因为有多种机制抵消了体力劳动机械化带来的后果，而这些机制却不能继续阻止科技对服务和行政类劳动的取代，现代科技的发展，最终将导致 50% ~ 70% 的劳动力失业，其中主要是从事中产阶级工作的那些劳动力，到那时，资本主义将难以维系。柯林斯和沃勒斯坦都认为后资本主义将伴有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但具体的形式现在还无法预测。

与前两位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悲观看法截然相反的是第三章的作者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他生于1942年，是美国历史社会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杰出教授。迈克尔·曼于1963年获得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最著名的著作包括《民主的阴暗面》（2005），以及从1986年到2013年他耗时近30年完成的四卷本巨著《社会权力的根源》。这部著作阐释了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这四种最重要的社会权力，以符合每一种权力来源的方式对社会加以整合，从而形成社会网络之间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并最终表现为可见的制度化结构。该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誉为社会思想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迈克尔·曼在本书中也延续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以当下的情况为出发点，考察了四种社会权力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多重互动。他的观点较为乐观，认为到了21世纪中叶，美国的霸权将被多极格局所取代，资本主义将会进入低增长、高失业阶段，那时如果能出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来对社会进行再分配，那么，资本主义是可以以一种比现在更好的形式维系下去的，即便出现生态危机，或者核危机，也有可能通过政治方法来加以解决。

讨论资本主义危机自然会谈到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制度，这个任务交给了第四章的作者格奥吉·杰尔卢吉扬（Georgi Derluguian，俄文名字为 Георгий Дерлугьян）。这位1961年出生在苏联高加索地区的社会学家，现任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社会研究和公共政策副教授。他早年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非洲语言和历史，并在苏联体制内工作过。他的研究关注非洲、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游击运动、革命和内战，以及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根源和市场改革的政治问题。其成名作《高加索山区中的布迪厄秘密信徒》（2005）是研究苏联解体和原苏联内部民族主义问题的重要作品。杰尔卢吉扬将苏联兴衰的历史置于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下，详尽地分析了沙俄作为边远后进帝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的扩展、苏联以国家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以及苏联共产主义体制最终僵化与解体的综

合因素。他认为，苏联式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体制无法取代资本主义，而且苏联和 20 世纪地缘政治对抗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 21 世纪的危机将主要是经济危机，如果我们能从 20 世纪苏联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或许能够避免未来出现极左或者极右的政权。

最后一位作者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生于 1952 年，是美国社会学家，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他于 1980 年获得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执教。卡尔霍恩倡导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合作，并致力于运用社会科学解决社会问题。他不仅扩展了批判理论的传统，而且使之与社会实证研究的联系更加紧密。他在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颇丰。他出版过多本著作并发表过 100 多篇论文。卡尔霍恩在本书中的观点相对居中，他列举了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種威胁，例如新自由主义、过度金融化、非正式部门、环境问题以及成本外化带来的负担等。但他认为这些并不足以使资本主义崩溃，而且认为，即使资本主义衰退也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有可能出现改良的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出现新的替代制度。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对此五位作者的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独特新颖的视角和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从中得出自己的答案。此外，诚如作者们在书中反复指出的，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中国绝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时，中国的一举一动也都会牵动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和命运。因此资本主义的未来不仅仅是西方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也是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译者

2014 年 1 月 25 日于牛津

目 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62

引 言	下一次大转折	/ 1
-----	--------------	-----

我们五位作者尽管观点不一，但一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面临重大挑战。资本主义能否克服内部的结构危机以及战争和生态恶化等外部问题？后资本主义时代将实行何种社会和经济制度？我们将从宏观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即将到来的历史大转折做出预测。

第一章	结构性危机：资本家或无法再从资本主义中获利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9
-----	-----------------------------	---------------

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在过去的五百年中处于常规运行阶段，通过“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保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未来的三四十一年中，这两个周期都将达到极限进而失效。资产阶级将无法继续无止境地积累资本，资本主义体系将随之进入结构性危机的阶段，最终走向衰亡。

第二章 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再也无处逃避

..... 兰德尔·柯林斯 / 36

机械化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逐渐取代了体力劳动工种；高科技的发展将在 21 世纪取代中产阶级从事的脑力劳动工种。资本主义曾经通过各种机制缓解劳动取代带来的后果，但这些机制都不能逆转高科技取代劳动的历史趋势。当大部分中产阶级都面临结构性失业时，资本主义将难以维系下去。

第三章 末日或已临近，但丧钟为谁而鸣？ 迈克尔·曼 / 71

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多重社会权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作用下，资本主义将在 21 世纪中叶进入低增长、高失业的阶段。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有可能改造资本主义并且帮助我们应对可能出现的生态危机和核危机。

第四章 共产主义的真相 格奥吉·杰尔卢吉扬 / 101

以宏观的历史角度审视苏联的兴衰就会发现：十月革命和苏联都是特定的地缘政治和历史条件的产物。苏联的干部后来蜕变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官僚的僵化使国家失去了对工人、知识分子和中层干部的控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苏式共产主义无法替代资本主义，苏式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已不复存在。

第五章 资本主义面临怎样的威胁？ 克雷格·卡尔霍恩 / 132

资本主义不会立刻崩溃，也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新自由主义和过度金融化严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健康运行所需的制度保障。复兴资本主义需要重建这些制度保障，因此我们的政治选择

将极大地影响未来的发展方向。既有可能出现漫长的停滞，也有可能出现改良的资本主义或者全新的替代制度。

结 语 回到现实中来 / 166

最近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全球左翼运动的溃败和新保守主义的复辟，这把资本主义推到了危机的边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发生重大转折。我们五位勾勒出了不同的可能结局，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未来可能危机四伏，但前景依然是光明的。

引言 下一次大转折^{*}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各种突如其来的震荡和重大的挑战，其中既有新问题，也不乏各种老问题。这些震荡和挑战将引发空前的政治僵局和困难抉择。这个过程可能很快就会开始，并将深刻地影响当今一代年轻人成年后的生活状况。不过我们认为这不见得是件坏事，也不会仅仅是件坏事。未来的几十年将赋予年轻一代新的机遇，让他们能以不同于老一辈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将基于自己对世界史的社会认识对这些挑战与机遇展开讨论。说到底，最令人担忧的是随着 30 多年前冷战的结束，探讨未来世界的可能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前景，成了不合时宜甚至是令人尴尬的话题。

我们五位作者之所以合力打造这本与众不同的著作，是因为远处的天边已经乌云密布：那将是一次结构性危机，其规模远远超过最近这次“大萧条”。多年后重新回顾这次“大萧条”时，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它不过是一段更深层次的危机与变迁的序幕。在本书中，伊曼

^{*} 引言由本书五位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曼、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和克雷格·卡尔霍恩合作完成。

纽尔·沃勒斯坦将阐述预测资本主义体系瓦解的基本原理。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将使全球市场进入过饱和状态，他们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社会与环境成本等方方面面的重压下，恐怕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做出商业决策。在过去的五百年里，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其国际化和露骨的等级差异使处于核心地理位置的精英在经营中占据优势，并借此获取相对稳固的高额利润。沃勒斯坦认为这一历史趋势无论多么有弹性，终归都会像其他历史系统一样达到其系统极限。在他的假说中，资本主义将在资产阶级自身的挫败中终结。

兰德尔·柯林斯则着眼于冲击资本主义前景的具体机制：新兴的信息技术将取代中产阶级工种。在西方和全球范围内，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将有多达 2/3 的人面临结构性失业；这将引发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后果。经济评论家们最近注意到了中产阶级的减少，但他们倾向于以模糊的政策方案来应对。历史上曾有五种措施来应对科技创新产生的社会代价并最终挽救了资本主义。柯林斯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这五种措施无一能够有效地应对科技对服务和行政类工种的取代。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用增加中产阶级职位的办法来弥补体力劳动的机械化。21 世纪高科技的发展轨迹将使中产阶级工种也变得多余。这引出了另一个假说：或许资本主义将因为丧失了保护中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缓冲而终结？

克雷格·卡尔霍恩的论点与之截然相反，他认为改良的资本主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卡尔霍恩详尽地阐释了一条我们都认可的道理，即资本主义体系不仅是市场经济，更是一个政治经济体系。其制度框架受制于人们的政治选择。结构性矛盾或许是复杂市场运行的内在产物，但其解决方案可能要在政治领域里才能找到，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换言之，要么是一部分足够开明的资产阶级正面应对这个系统

带来的代价与责任，要么是资产阶级继续无忧无虑地搭便车，在上一代“左倾”进步人士对它们的挑战逐渐消退后，资产阶级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从当代资本主义到未来改良体系的转变将会多么彻底，这尚无定论。高度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可能，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许更有可能。即便资本主义的法权和金融模式在未来式微，市场还是可以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可能在丧失了一部分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后幸存下来。

迈克尔·曼则更倾向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困境，但他同时也点出了一些深植于权力多重性来源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外尚有政治、军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全球各式各样的宗教。这种复杂性在迈克尔·曼看来使资本主义的未来具有不可预测性。有一点是完全可以预测的，那就是贯穿 21 世纪的生态危机将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这个危机很可能会升级为对水资源和粮食的争夺，并造成污染和特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进而增加极权主义抬头甚至是核战争的可能性。迈克尔·曼把它和本书的中心议题，即资本主义的未来联系起来。他的分析认为，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难上加难，因为问题的根源是肆无忌惮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坚持主权的自主民族国家以及为市场和现代国家制度提供合法性来源的消费者个人权利，这些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在全球被广为推行。因此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对当今世界的制度状况做出重大调整。

这些结构性预测类似于土木工程中的“负荷测试”，公众现在也都听说了其在银行业中的应用。我们并不以谴责或者褒扬作为预测资本主义未来的落脚点。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伦理和政治倾向，但作为历史社会学家，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福祉，至少在人类走出游猎生活这一初级阶段之后的一万年里，并不取决于社会形态带来的善恶多寡。我们的讨论不涉及资本主义相较以往社会形态的优劣。本书的议

题是：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这个议题呼应了一个陈年的预测：期待资本主义的消亡是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然而苏联本身却解体了。这是否说明资本主义前途一片光明呢？格奥吉·杰尔卢吉扬把最终引发自我毁灭的苏式试验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之下，还原了其应有的位置。他同时还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共产主义的垮台并成就最新的经济增长奇迹。苏联式共产主义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有效替代品。然而，1989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下层民众的动员和精英阶级的盲目恐慌中，顷刻间土崩瓦解，这种终结方式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前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本书无意描绘末日情景。改变当前系统的一些变量来做出短期预测是商业和安全专家们的惯用手法。我们不认为研究具体事件有什么意义。具体事件受瞬息万变的形势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唯有更深层的结构性相互作用是可以大致估算出来的。在本书中预言资本主义没有出路的两位作者——柯林斯和沃勒斯坦，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言了苏式共产主义的终结。但没有人能预测出其具体的终结时间，更不可能预测出终结的方式竟是（苏共）中央委员们非理性地将他们既有的工业和超级大国地位付之一炬。这个结局之所以不可预测是因为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结局。

我们在困境中寻找希望，正是因为世界的政治前途尚无定势。系统性危机会使一些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凸显出来，这些制约性因素本身又是上一代人的困境与制度决策的延续。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会产生迥异的道路选择，一切照旧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在对旧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的同时，也成为社会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使我们有机会来改造和重组这个世界的社会机制，从而创造出一个人能促进社会公正及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历史系统走向灭亡的过程破坏性或多或少，而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系统有可能会变异成其他形态。人类社会经历过革命的勃发、大规模的发展以及痛苦而漫长的停滞甚至倒退。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停滞和倒退正是未来全球危机的一种可能结局。资本主义制度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很可能在不断增加的成本和社会压力下失去活力，从而在结构上造成全球的碎片化，形成一个个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排外政权。一些人将此视之为文明的冲突，也有人把它比作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反乌托邦，只不过增加了一些高新科技和电子监控手段作为统治工具。在这种极端的冲突中重建社会秩序，既可以通过类似法西斯的手段，也可以通过更广泛地实行民主。这是我们在本书中最想强调的一点。

最近几十年政界和主流社会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不存在什么值得思考的重大结构性转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各种模型，向来都只是假定存在一个从根本上而言是静态的社会体系。危机发生时，政策调整和科技创新总能使资本主义获得新生。但这只是经验归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已经维系了五百年，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个系统还会永久维持下去。20 世纪 80 年代，当 1968 年的乌托邦梦想早已烟消云散，而苏式共产主义的危机开始凸显之时，各式各样的后现代文化哲学批评家以反运动的姿态兴起。他们虽然也经历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但都不曾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结果就是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者缺乏基本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世界的结构现状。在结语中我们将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包括知识界的态度做更深入的讨论。

我们刻意用较为通俗的语言写作本书，希望能把我们的观点带入更广泛的讨论中去。在我们各自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本书观点更详尽的论述和注解。我们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所谓的“世界体系分析”，也可以称之为“宏观历史社会学”。宏观历史社会学者研究现

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历史上各种帝国和文明的兴衰过程，观察长期的社会运行模式，并总结出人类历史如何在多重矛盾与冲突的推动下形成长期的历史时期，这些历史时期的发展又取决于其中非永久性结构的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足够的共识，所以能够共同完成本书首尾的两个章节。单独写作的各章则反映了我们各自的理论和专长。这本小书并不是一份意见统一的宣言，而是基于我们对古今人类社会研究的平等讨论。因此它也是一块敲门砖，让我们严肃并公开地发问：世界史的下一次大转折是什么？

最终我们是不是在预言某种社会主义的到来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要避免由于意识形态信仰造成的扯皮。理智的回答应该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我们坚持遵循科学分析的法则，因此不是在占卜算卦；也就是说我们对变化的原因以及从一种历史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历史形态的过程有较为精准的把握。那么历史终点会是社会主义吗？我们的分析范围是接下来数十年的中期未来。兰德尔·柯林斯思考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在赢利性市场组织中的作用正被科技发展所取代，有什么能够挽回这一即将到来的中产阶级的消亡呢？一种可能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对生产和分配进行重组。这种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自觉的、集体化的运作模式使大多数人受益。因此，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的恶化使社会主义成为最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然而我们不应忽视 20 世纪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组织化的过度集权给专制统治提供了沃土，同时会逐渐削弱经济活力。即使资本主义的危机能通过社会主义路线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届时也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展望更长期的未来，柯林斯认为社会主义同样不会永远存在，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震荡发展，而每种制度都会因其内在缺陷而崩溃。

与之不同的是克雷格·卡尔霍恩和迈克尔·曼的乐观预测。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很有可能为应对核危机和生态危机而团结起来并结成联盟，这可以保障资本主义以一种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全球化模式延续下去。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被何种制度取代，这种制度都不会与（苏联式）共产主义有什么交集。幸运的是，产生苏联式“堡垒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 20 世纪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已不复存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是，从根本上无法预测哪种制度会取代资本主义。既有可能产生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等级化和两极化特征的非资本主义体系，也有可能产生相对民主和平等的体系。或许这个历史转折会催生出多个世界体系。卡尔霍恩则认为有可能会产生多个相对松散耦合的体系来应对由资本主义内生风险和外在威胁带来的震荡。这种观点和当下被广为接受的全球化不可逆性互相矛盾。那么卡尔霍恩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见解有什么理论根据呢？

20 世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们无论持何种观点，都错误地认为通向未来的道路是唯一的。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也是支撑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狂热信徒们传播并强制推行其理念的原因。我们都不认同“人定胜天”这种乌托邦理想。不过人类社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态，这是有据可循的。这种组织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面对创造历史的重大危机时当事人的政治远见与魄力。这种历史时刻在过去是表现为政权解体和革命爆发。然而我们五位作者都强烈质疑这种过去在各国国内爆发的暴力革命将预示国际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前景。这个理念让我们对未来向好的方向发展抱有希望。

资本主义不是皇宫或者金融区这样的具体位置，因此既不能被革命群众占领，也不能成为理想主义者示威抗议的对象。同样，资本主义也不仅仅是生意经里常说的可以实施并修改的“良好”政策。把

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中的雇佣劳动，这是长久以来许多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幻想。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特定的市场与国家组织形式；这个体系的终极目标是个人可以通过几乎任何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其获得利益的多寡则是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准绳。未来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与此迥异而更令人满意的市场与社会组织形式。

本书和我们以前的论著对这一点有详细论述。这里让我们仅举一个历史事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实现飞行，至少在人类梦想实现社会公正那天起就有了飞行的梦想。几千年来人类飞行一直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直到热气球和飞艇时代的到来。对这些装置的实验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是灾难性的。然而通过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以及鼓励他们创造性的社会机制的建立，人类最终通过发明新型引擎和铝制机翼实现了突破。现在人人都可以飞行了。多数人挤在经济舱狭小的座椅上实现飞行，只有那些有胆量的人能够驾驶小型飞机或者滑翔机体验独立飞行带来的刺激。飞行也带来了空袭和无人战斗机的恐怖。科技发明还要看人类如何运用。一个旧梦想实现了，新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着艰难抉择，每种选择都将成为创造新型社会结构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乐观的态度是我们调动情感力量的必要历史条件。当公众对制度设计的思考与讨论有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时，历史性的突破就不再遥不可及了。

第一章 结构性危机：资本家或无法 再从资本主义中获利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我的分析基于两个前提：其一，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凡是系统必有生命，而生命总有终点；其二，所谓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即我认为资本主义在其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遵循一套特定的法则，在此，我将简述这套法则的内容。

系统都有生命。伊利亚·普里高津对此有过扼要的概括：“人类有寿命，文明有寿命，宇宙也有寿命……”^① 也就是说，包括中期历史社会系统在内，从人类所知的最微小的系统到最庞大的系统（宇宙），依我看都可以划分成三个性质不同的阶段来加以分析：系统产生期、“常规”生命期（这是最长的阶段）和消亡期（结构性危机）。本文将剖析现代世界体系已有的情况，不涉及对其产生原因的解釋。后两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常规”生命期及其消亡的模式，将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我的观点是：在了解现代世界体系以资本主义形态运作的法则之后，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系统已经进入了结构性危机的末期。由此

① Prigogine, Ilya.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166.

便可提出这个末期阶段的运行规律，以及这个末期约 20 ~ 40 年的生命期。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标志性特征，或曰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不少论者只关注他们认为关键的一种制度，例如雇佣劳动、以交换或利润（或两者兼有）为目的的生产、企业家/资产阶级/布尔乔亚与雇佣工人/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或者是“自由”市场。这些在我看来都不足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

理由很简单：雇佣劳动并非现代世界所独有，它在世界各地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此外，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大量非雇佣劳动。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同样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它从未在这些历史系统中占据过主导地位。“自由”市场确实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门咒符，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市场从未独立于政府干预或政治影响存在过，也不可能独立存在过。现代世界体系中确实有阶级斗争，但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实在过于狭隘。

我认为，要把一个历史系统定性为资本主义体系，其主导或起决定作用的特征必须是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即以积累更多资本为目的的资本积累。这个特征要占主导，必须有一套机制来惩罚那些追求其他价值或目的的社会成员，把这些不守规矩的成员淘汰出局，或是严重削弱他们积累可观资本的能力。现代世界体系中繁多的各种制度，无一不是为了促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至少也是被这种促进资本积累的压力所制约。

将以积累更多资本为目的的资本积累作为头等要务，在我看来这是彻彻底底的非理性目标。以我对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理解（参见韦伯的“工具理性”），其非理性并不是指它不能长期维持一个历史系统的运行（参见韦伯的“形式理性”）。现代世界体系已经维持

了五百多年，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作为指导方针至今也相当成功。然而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以此为基础的历史阶段已经接近尾声。

一 处于“常规”运行阶段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实际中是如何运行的？所有系统都存在波动。换言之，系统运行状况总是偏离其均衡状态。人体生理就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我们不断地吸入和呼出空气，我们需要不断呼气吐气。人体内部和现代世界体系内部都存在使系统回归均衡状态的机制，尽管这是一种动态平衡。一个系统的“常规”运行阶段，就是指在这个阶段中，回归均衡状态的压力大于任何偏离均衡状态的压力。

现代世界体系中有很多这样的机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即在这个系统的历史发展中最具决定作用的机制，我称之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下面介绍二者的工作原理。

首先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生产者需要垄断来积累可观的资本。只有在垄断的情况下，生产者才能以远远高出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在存在真正竞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通的系统中，任何精明的买家都可以找到愿意以一分钱的利润甚至是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的卖家。存在真正竞争的体系是无法产生真实利润的。真实利润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限制，也就是建立起垄断。

垄断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形成：①产品有创新，从而存在（或能够催生）足够多愿意购买的买家；②一个或多个强力国家愿意动用国家力量阻止（或至少是限制）其他产品进入市场。简而言之，垄断只有在市场无法独立于国家干涉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我们现在习惯把此类垄断产品称为“领先的产品”。之所以“领先”，是因为它们通过自身或是上下游的关系决定了世界体系内

很大比例的经济活动。在这种准垄断建立起来后，世界经济就会随之进入一段“成长”的扩张期，这段时期总体上被视为“繁荣”期。在此期间，生产者对准垄断和其上下游关系的个人需求以及受雇者的消费支出使全球的就业率处于较高水平。尽管世界体系中某些地区和群体的收益无疑会更多，但绝大多数地区和群体还是会随着生产的总体增长而“水涨船高”。

国家有不少手段可以创造并延续这种准垄断：可以通过立法建立专利系统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可以通过对准垄断行业进行直接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对研发的投入；还可以作为大宗产品的采购商高价收购准垄断行业的产品，或者是利用地缘政治实力防止其他国家的潜在生产者破坏这种准垄断。

准垄断的优势不可能永久维持下去。生产者面临着准垄断具有长期自偿性这一系统性难题。原因同样很简单。既然准垄断的利润率如此之高，那么其他生产者自然会挤破头也要打进市场来分一杯羹。方法很多，如果准垄断是建立在某种秘密的新技术基础之上，那么可以尝试窃取或者复制这种机密技术；如果准垄断是靠一国的地缘政治实力抑制市场准入，那么其他生产者可以诉诸其他地缘政治力量与之对抗，还可以鼓动该国国内民众的反垄断情绪。

此外，准垄断者最直接的顾虑，是要避免出现停工现象，因为这会造成重大的资本流失，在其他具有寡头垄断地位的生产者没有同时停工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这就给工人持续争取更好的待遇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最终往往发现对工人做出让步比停工的损失要小。然而，长此以往，不断积累增长的劳动成本又会压缩整体的利润空间。

无论通过哪种形式，其他潜在的生产者最终都能削弱领先产品的生产者延续准垄断的能力。到目前为止，这个过程平均需要 25 ~ 30

年。然而无论对领先产业的保护多么持久，垄断迟早还是会被严重削弱。正如资本主义的先驱们早已预料到的，这会造成价格下滑。降价对买家是好事，对卖家自然就是坏事。原先赢利的领先产品在全球市场上遭遇更激烈的竞争，逐渐成为利润率低下的产品。

生产者有什么对策呢？一种对策是放弃较低的交易成本带来的优势，转而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实现途径通常是将主要生产场地从原来的“核心”地区转移到世界体系中历史上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这些新兴生产地的人们或许会欣喜地把这种进入全球生产链的方式视为国家的“发展”。更贴切地说，这其实是原先的高赢利产业在无法维持利润率后的向下转移。

产业转移只是应对形势变化的一种手段。先前领先产业中的生产者也可以专攻某种小众的利基产品，这类产品更难在其他地方被复制，因此原生产国得以保留一部分生产。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与劳方谈判达成减薪（包括各种形式的经济补偿），从而避免更多的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原生产国内更为严重的失业现象。总的来说，在全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劳工阶层将很难维护其在世界经济扩张期中获取的优势利益。

生产者也可以部分地或彻底地停止从生产领域（甚至是从贸易领域）中获取资本，转而集中从金融行业中获利。我们现在常说“金融化”是20世纪70年代的发明，其实，金融化历来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中的普遍做法。正如布罗代尔所展示的，真正成功的资本家无一例外都会抓准机会游弋于实业、贸易和金融领域之间，而不会过度专注于某一行业。

如何在金融领域中赚钱呢？基本的机制就是有息放贷。当借款人过度借贷而只能偿还利息无法偿还本金时，放贷人得到的回报是最高的。这是因为借款人在无力偿还（即破产）前，必须持续地向放贷

人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

这种金融借贷机制并不能创造新的价值或者资本，只能对现有的资本进行再分配。同时为了维持借贷循环，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借款人来取代破产的借款人。对于放贷人来说，这个金融过程是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的。

然而从资本主义“常规”运行的角度来看，这个借贷链是有缺陷的。最终它会耗尽所有对生产的实际需求。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对这一系统的运转构成威胁，因此需要回归均衡状态，也就是回到以新的生产作为积累资本的主要方式这一状态。熊彼特对如何在经济上实现这一回归有清晰的阐述。发明转化为创新，创新带来全新的领先产品，从而使世界经济得以继续扩张。

这一转化过程的政治是饱受争议的。可能需要增强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而一部分资方则要学会向较为强大的劳工阶层妥协，以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来换取资本家群体长期的共同利益。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产生这一扩张与收缩的循环，是因为资本主义并不限于某一国，而是存在于世界体系之中；既为世界体系，自然是超越国界的。假定此过程仅在某一个国家里发生，那么就无法避免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侵占剩余价值，从而剥夺（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企业家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市场里完全没有国家，就无法形成准垄断。只有当资本家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世界经济”，即有多个国家参与的经济时，企业家才有可能追逐无止境的资本积累。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霸权周期”。这一周期要比“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得多。世界经济中的霸权，指的是某一国有能力迫使其他各国都接受一套法则，从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建立起相对秩序。熊彼特在其论述中特别强调“相对”秩序的重要性。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内战、黑社会的横行、大范围的官场和制度腐败、猖獗的

犯罪，这些无序状态都能使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获益。但它们无一例外会制约全球对资本积累最大化的追求。实际上，这些无序状态会摧毁许多维持资本积累不断扩张的基础设施。

因此，由某个霸权强加的相对秩序对资本主义总体的“常规”运行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能给霸权自身，包括其国家、企业家和普通公民带来很多益处。然而我们有理由质疑，对系统（以及对霸权）总体而言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是否也能给其他国家以及那里的企业家和公民带来益处。实现霸权并维持霸权之所以如此困难，原因正在于此。

此前“霸权周期”的特征是：两个力争在世界体系中寻求支配权的大国进行一场毁灭性的“30年大战”，其中一方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取得胜利后，这一方在经济活动的三大领域，即生产、贸易和金融中同时占据了明显优势。该国更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此前的“战争”胜利而获得了较大的军事优势。与其综合实力相称的是，该国在文化上亦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了地缘文化的模式（参见葛兰西的“霸权”概念）。

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的方方面面都占据优势，便可实现其目的并推行其意志，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如此，我们可以视其为地缘实力的准垄断。表面上看，这种霸权主导确实能在世界体系中营造相对的秩序与稳定。但问题是与领先产业的准垄断一样，地缘实力的准垄断也有自偿性，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相对的稳定秩序下总还是有明显的输家。这些输家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为了抑制反抗，霸权国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通常是采用军事手段。镇压在短期内往往十分有效，但使用武力总会带来两个负面效应。

第一，军事手段一般不会百分之百奏效，这就会暴露出霸权在镇

压时的某些软肋，从而激励后来的反抗运动。

第二，对霸权国的军队和其他部门来说，使用武力镇压是要付出代价的。人员的代价（伤亡）会节节攀升，经济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随着公众开始更清晰地权衡镇压的利弊（通常霸权国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从镇压中获益，其他大部分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对武力镇压的支持肯定会慢慢动摇。其结果就是霸权国的掌权者们在推行世界秩序时开始遭遇内部压力。

其次，尽管在霸权统治初期，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实力远逊于霸权国，但它们会逐渐恢复实力并开始寻求更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世界系统开始从毫无争议的单极霸权转向多极平衡。由于这个过程是往复的，因此会有其他国家开始寻求成为下一个霸权国。不过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艰巨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霸权周期”比“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要长得多^①。综上所述的原因，霸权会开始逐渐衰落。

在描述现代世界体系运作过程时，还有最后一点需要强调。“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都是周期，但绝对不会完美地回归其出发点。这是因为这两个周期的上升阶段都伴有增长，无论是真实价值的增长、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的增长还是商品化的深入，这些增长不可能在下降阶段里完全消除。以下降阶段为代表的回归平衡状态最多只能是部分的系统回归，更恰当地说，是系统的“停滞”。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不可能完美地回归到系统原来的状态。

① 对这个过程的论述参见拙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2011版）前言中的“世界经济体中的霸权概念”小节。Wallerstein, E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 - 17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xxii - xxvii.

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棘轮效应：向前进两步，向后退一步。因此历史系统的往复节奏会带来动态的平衡，在现实世界中就是螺旋式的上升。以 y 轴，即纵坐标度量某个现象的百分比，以 x 轴，即横坐标度量时间，可以画出一条逐渐趋近于渐近线（ y 轴上的 100% 位置）的曲线。由于不能跨越渐近线，系统逐渐接近渐近线时就离平衡状态越来越远。当曲线达到约 80% 的位置时，系统就会开始快速反复振荡，进入“混沌”状态并出现分支。系统达到这个位置后，我们就称其为结构性危机的开始。下面我们将以确凿的例证来阐述当前历史系统已经开始发生的结构性危机。

二 现代世界体系，1945 ~ 1970 年前后

上一次争夺霸权的大战是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展开的。算起来这场争夺战差不多在 1873 年就已经开始了，并在 1914 ~ 1945 年的“30 年大战”期间趋于白热化。随着 1945 年德国的“无条件投降”，美国成为这场“30 年大战”中明确和公认的胜利者。

经历了我们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拥有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其经济能力和竞争力早在战前就已经十分强大。而战争在两个方面强化了美国的实力。一方面，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工业大国——从英国跨越欧洲到苏联、再到日本，都在物质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战时的农业生产受到了破坏，绝大多数工业大国在“二战”后的短期内都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不但避免了物质损失，还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发展了其工农业基础。战后，不仅是战败的轴心国，就连美国战时的盟国也不得不立刻向美国寻求恢复与重建的援助。

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衡量当初这个优势有多大。在所有

生产领域里，美国都能在 1945 年之后的 10 ~ 15 年间以低于购买国当地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其他所有工业国内销售其产品。

美国唯一不占优势的领域是军事。苏联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部队占领着中东欧和东北亚地区的大片土地（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朝鲜半岛的北半部、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1945 年的美国倒是独有核武器，不过就连这个优势也在 1949 年丧失了。

其结果是，美国若想成为世界霸主，就必须和苏联达成某种妥协并消除其军事优势。美国在国内政治压力下进行全球范围的快速裁军后，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我认为美国和苏联随后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协议”，也就是我们象征性地命名为“雅尔塔”的协议。在我看来这个协议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大致以“二战”后两国军事力量的部署为界将全球划分成两大实际势力范围。社会主义阵营从中欧的奥德河 - 尼斯河线延伸到朝鲜的 38 度线（其中包括 1949 年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彻底击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

美国和苏联实质上都认可了它们对各自势力范围内的事务拥有（实际上是独享的）最高发言权。这个实质协定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不寻求以军事（或者政治）手段改变这个势力范围的边界。1949 年后，这个协定因“相互保证毁灭”的思想而得以强化，后者的基础是双方都拥有足够的核武器来反击并毁灭对方。

这个心照不宣的协议的第二部分，是两大势力范围的经济实质上处于隔离状态。美国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建提供任何协助。其援助仅限于其势力范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和对东亚地区的相应援助，首先是日本，其次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美国对盟国的援助并不是简单的不带私心的慈善，美国需要为其兴旺的工业寻找顾客，而重建这些盟国的经济可以让盟国成为其忠实的顾客和政治卫星国。

相应的，苏联也发展了其势力范围内带有强烈自给自足和封闭特征的经济架构。

“协议”的第三部分是否认存在任何协议。双方都以各自独特的话语大肆宣扬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你死我活的斗争。“冷战”由此得名。双方都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溃败，不过这个前景在当时是遥不可及的，因此这场喧闹的口水战并不旨在改变对方。在这个意义上双方都没有尝试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这两个超级大国实际上寻求的是，迫使自己的卫星国（委婉地称之为盟国）严格坚持各自制定的政治路线。

随着这个军事现状的形成，美国接下来就可以通过在联合国的自动多数和大量其他的跨国组织来实现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与文化主导权。唯一的例外是控制军事事务的联合国安理会，在此，苏联与美国这两国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因而确保了军事现状的维持。

这个“协议”起初十分有效。然而没过多久，地缘政治中准垄断的自偿性就开始显现。1945年后的20年间，有两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分别是第三世界的反抗和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复苏。

两个超级大国试图强行维持全球地缘政治的现状，而当时被看作第三世界的国家（其后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南方）几乎无法从中获益。于是有些国家开始反抗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不与国民党妥协，结果他们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政权。越盟和越共也各自发展，后来分别击败了法国人和美国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游击队也成功地夺取了政权。阿尔及利亚不顾法国共产党的反对（至少一开始是）走向了独立。而纳赛尔则成功地夺取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

美国和苏联其实都对这种混乱局面十分不满，他们各自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了调整。一开始双方都坚持强迫其他国家在冷战中选择自己

的阵营，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说，“没有中立可言”。后来，双方发觉有必要放宽这个要求并转而结交那些寻求中立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中国“交恶”，美国则在越南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另一个变化对美国的影响要比对苏联的影响更深远，这反映在经济复苏带来的政治后果上。这个时期是一段相当长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阶段。举例而言，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已经无法在德国和日本以低于当地生产价的价格销售汽车。相反的趋势开始形成。德国和日本制造的汽车开始成功地打入美国市场。

美国这些从前的卫星国展现出全新的经济实力，并逐渐成为美国在全球市场中真正的竞争者。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全球生产领域或跨国贸易中相对其盟国已无明显优势可言，地缘政治上的霸权基础开始分崩离析。

1945年后，世界体系经历了自16世纪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资本积累；1945年后，世界体系也经历了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地缘政治实力即美国霸权的扩张。这两个周期几乎是同时到达了各自的自偿点。最大的上升之后就是最大的下滑。世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远离了其历史系统的平衡点，而恢复机制似乎已经失效且无法补救。整个系统现在进入了结构性危机时期。

三 结构性危机，从1970年前后到……

两个至关重要的新情况促成了这场结构性危机的形成：其一，是世界经济体长期的世俗趋势使资本家很难继续无止境地积累资本；其二，是地缘文化中那些偏中间的自由派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削弱了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1. 长期的结构性趋势

如何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无止境地积累资本？方法自然很多，其中一个基本的方法是通过生产。企业家兼生产者保留商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成本越低售价越高，能实现的利润就越多，这些利润可以用来再投资。

但怎样才能将成本和售价之间的差额最大化呢？这里面有两个必要元素。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必须建立垄断，这一点我们已有累述。在此要讨论的是除此之外如何尽可能地缩减成本。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任何生产环节都会产生三种成本，即人员成本、物资成本和税负。

生产者即企业所有人需要支付三级不同的人员成本：非技术工种和半技术工种、技术工种和监理、高级经理。最低的非技术工种成本在上升阶段趋于提高，这是因为非技术工人会以各种工会运动的方式向雇主要求提薪。在这一阶段雇主通常会向这些非技术工人让步，毕竟提薪比停工或缓工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然而劳动成本最终会超出雇主，特别是领先产业雇主的承受范围。

雇主历来的解决方案是迁移工厂，也就是在下降阶段将工厂迁移到“历史上”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在那里应聘的工人（通常是来自农村）原先的真实收入比新建工厂（通常在城镇）所提供的工资要低很多。这对劳资双方来说是双赢局面。不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迁徙出来的工人就会逐渐了解到周遭的情况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较低的工资水平。他们开始从事工会运动。雇主迟早会发现，成本再一次超出了其承受范围，于是不得不再一次迁移。

这种迁移虽然代价高昂，却也十分有效。然而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棘轮效应。缩减的成本最终无法完全消除成本的增长。过去五百年里，这个反复的过程几乎耗尽了所有可供迁移的地区。世界体系的

非农村化水平，在过去 50 年里大幅提升并持续快速的攀升就印证了这一点。

监理成本的提高由两个不同的因素引发：其一，是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中层人员来从事协调监理；其二，是为了抗衡非技术工人工会运动带来的政治威胁，需要一个更大的中层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盟友，同时可以为人数上占据多数的非技术工人制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削弱其政治动员的能力。这个中层阶级的工资极大地提高了总体的人员费用。

高级经理人的成本增加是企业结构日趋复杂化的直接结果，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高级经理人从而得以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得据为己有，完成寻租，这就降低了企业所有人（股东）的利润收益和对企业的再投资。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成本的增长是十分惊人的。

同理，物资成本也在不断增长。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地寻求成本外化。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资本家并不承担所有的物资成本。三大可外化的成本包括有毒污染物的清理、原材料的补充、建设必要的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中，将这些成本外化基本上是企业的通常做法，很少会成为当权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过政治大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了极大的变化。第一点是，气候变化成了被广泛讨论的议题，并催生出对“绿色”和“有机”产品的需求。过去外化的“惯例”早就成了遥远的记忆。关于清理有毒污染物的政治讨论之所以出现，原因非常简单：这个世界已经基本上没有空闲的公共空间可供倾倒废弃物了。与之类似的是全球劳工的非农村化，即无法再找到新的潜在的低工资劳力。其结果就是要求清理环境、控制污染的社会运动不断升温。

第二点是，全球人口快速增长引发了公众对资源可持续问题的关

注，这形成另一个新的政治问题。人们突然间发现各种资源短缺，有些是已经出现的，有些是即将到来的，比如能源、水资源、森林、渔业和畜牧业资源。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使用目的以及谁来买单成为争论的议题。

第三点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为全球市场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运输发往各地，通信已成为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当今的运输和通信比以前要快捷得多，效率也要高得多。不过这意味着成本也大大提高了。由谁来买单呢？在过去，对基础设施使用量最大的生产者为此只付出了很少的花费，大部分的花费属于公共支出。

现在的各国政府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需要在清理污染、资源可持续和扩大基础设施领域扮演新的直接角色。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大力加税。此外，仅仅加税而不触及这些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就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坚持要求企业家将这些成本内化。税负的增加和对这些成本内化的要求将极大地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对于这一点企业主们早已是满腹怨言。

第四点是，这也是最后一点，各种形式的税负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中一直在增长。各级政府都需要税收来支付人员的工资和政府应当提供的各种服务。同时所谓的“私税”，即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有组织黑社会的掠夺性需求也在增长。对企业家而言，“私税”和国家赋税一样，都是成本。随着过去 50 年里政府机构的迅速膨胀，需要贿赂的官员也越来越多；而随着全球经济活动的增长，黑社会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多。

然而，税收领域最大的增长点来自于世界各地反体制运动的政治斗争。过去两百年的斗争带来了全球政治的民主化。群众运动的基本纲领是从国家那里争取作为公民的三大基本保障：教育、医疗和终身

收入。而每一项要求在过去的两百年里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增长：一是要求达到的服务水平在提高，这势必带来成本的提升；二是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这样的要求。我们在说“福利国家”的这些支出时，指的就是政府的支出，这基本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常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提供的福利多寡不一，但大体上和该国的富裕程度相当。

综上所述，生产环节的三大主要成本一直在攀升，现在已经过于接近其渐近线，以至于整个系统已无法通过过去五百年间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有效的机制回归平衡状态。生产者追寻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而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2. 重大的地缘文化变迁

资产阶级生产者在面临利润锐减的同时，还要面对巨大的文化变迁：也就是偏中间的自由派在地缘文化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1968 年的世界革命的意义与结果就在于此。1968 年的世界革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反体制运动的历史，反映了其渊源、斗争策略以及到 1968 年为止的历史及其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政治运作的重要性。

1968 年的世界革命中被称为旧左派的运动，在整个 19 世纪基本上包含了两大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外加民族解放运动。这几大运动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和 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缓慢但长足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们的声势并不大，在政治上甚至有些被边缘化。然而在 1945 ~ 1968 年的这段时间里，它们在世界体系内的绝大多数地方却迅速地壮大起来。

这些运动在一段空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阶段和美国霸权的顶峰期得以迅速发展，这听起来不大合乎常理。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偶然事件。此前我已阐述过，资本家，特别是赢利最高的领先产业的资本家，非常不愿意在世界经济体处于繁荣期时遭遇对生产过程

的干扰（如罢工、缓工、破坏）。由于这段时期的扩张获利颇丰，这些资本家宁愿大幅度地给工人加薪，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比生产过程受到干扰造成的利润损失要小。当然，这意味着中期的生产成本增加，最终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垄断衰落的主要原因。不过大部分企业家，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都认为无法预见并控制三年以后的事情，因此总是用短期利润来衡量自己的利益。

霸权在衡量自己的利益时也有类似的倾向。其主要考虑是维持政治领域里的相对稳定。在世界范围内镇压反体制运动，代价是十分高昂的。尽管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协商达成“非殖民化”，以建立以后可能比较“温和”的政权。这样做的后果是帮助了亚非拉许多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独立运动成功夺取政权。

在 19 世纪末期，社会运动的内部出现过大论战，也就是工业化国家社会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以及反殖民运动中的政治民族主义者与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民族主义者认为，只有所谓两步走的战略才是唯一可行的行动纲领，即首先要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才能改造世界。到了 1945 年，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民族主义者明显地在运动内部的论战中占据了优势，并控制了大部分有实力的组织^①。

大型企业和霸权国相对宽松的态度造成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

^① “马克思主义”确实在俄国革命时分化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称第二国际）和共产党人（或称第三国际）这两大阵营。但他们的分歧并不在于“两步走”的战略，而在于如何实现第一步，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战略。另外，到了 1968 年，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不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了，而共产党人则自称马列主义者。对于 1968 年世界革命主体参与者的那一代青年人来说，旧左派视为重中之重的两个国际之间的论战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些年轻人对旧左派社会运动的两大阵营都嗤之以鼻。

期，旧左派运动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实现了其夺取国家权力的历史目标。共产党统治了那时 1/3 的世界，在当时这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社会民主党则在另外 1/3 的世界，即泛欧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里轮流执政^①。而到了 1968 年，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由民族主义者和民族独立运动掌了权^②。

不管这些运动在掌权时看起来有多么“温和”，当时的世界体系中弥漫着一股由这些运动带来的必胜信念。运动的参与者们感受到了并且大声宣告，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历史站在他们一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权贵害怕这真的会实现，那对他们将是最坏的结局。然而 1968 年世界革命的参与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旧左派运动虽然掌握了政权，但这不是胜利而是背叛。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你们或许夺了权（第一步），但根本还没有改造这个世界（第二步）。

如果仔细分析 1968 年世界革命的话语，并且忽略一些本土化的内容（当然会因国而异），那么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泛欧洲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各种运动中，我们都能找到贯穿其中的三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和霸权有关。美国不再被视为全球秩序的维护者，而是帝国主义强权。不仅如此，它还因为战线过长而暴露了自己的弱点。美越此时交战正酣，1968 年 2 月的新春攻势则敲响了美国军事行动的丧钟。这还不是全部，革命者们控诉苏联在美国实现霸权的过

① 我们不应该忽视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策就是“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实际上也已经被这些国家的保守党派所接受，纠结的不过是一些实施上的细节问题。在我看来，在美国推行“新政”的自由派也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尽管出于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些特殊原因，他们始终不接受社会民主党这种称呼。

② 拉丁美洲大多数地区在 19 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正式独立，但那里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声势上与其他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大致相当。

程中与美国狼狈为奸。

在他们看来，冷战根本就是个烟幕弹。雅尔塔协议的实质内容，即维持现状，才是地缘政治的真实情况。这种深层的怀疑从1956年起就开始扩散。那一年还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而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按照冷战思维行事。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也是在1956年出炉的，这个报告粉碎了斯大林时期的宣传，废除了斯大林的诸多政策，使许多当年的忠实追随者们感到理想“幻灭”。

第二个主题和旧左派运动有关。对于他们未能在掌权后实现诺言（第二步）的批评此起彼伏。激进的革命者们实际上在说：既然你们没能改造世界，那我们只好认为这个战略已经失败，必须发动新的社会运动取而代之。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誓言要清除党内和政府高层里的“走资派”，因而是值得效仿的榜样。

第三个主题和那些所谓被遗忘的群体有关，也就是因为性别、种族、性取向或者是因其他与众不同之处而受到压迫的群体。旧左派运动长久以来是等级分明的，他们始终坚信，在一个国家内部只有一种运动是“真正”的革命运动，而这个运动必须把某一类斗争放在首位——在工业化国家（北方国家）里是阶级斗争，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南方国家）则是民族斗争。

这个论点的逻辑是，任何寻求自主斗争策略的“群体”实质上都在破坏主要斗争，于是在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这些群体必须置于党的等级化结构之下并接受党从上到下制定的战术决策。

1968年的激进分子则坚持认为不能拖到主要斗争“胜利”之后再解决公平对待这些群体的问题。他们的需求是迫切的，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同当前的主要斗争同样重要。这些被遗忘的群体主要包括女性和社会上的少数群体（少数族裔、少数民族、少数宗教）以及有其

他性取向的人群，还有反战主义者和对生态问题特别关注的群体。当然这个被遗忘群体的名单是无法穷尽的，并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长。当时美国的黑豹党就是这类群体的一个著名代表。

1968 年的世界革命（实际上是从 1966 年开始并延续到 1970 年）并没有造成世界体系的政治变迁。多数国家都成功地镇压了这场运动，许多当年的参与者也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放弃了青年时代的热忱。不过它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偏中间的自由主义过去势力强大，可以把自己的地缘文化理念推上唯一合法的地位，而这个优势在革命中被彻底摧毁。真正的保守派势力和激进派势力得以重新独立生存，并开始实施自主的组织和政治策略。

这一文化政治变迁对现代世界体系的运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偏中间的自由主义者曾经许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为此人们必须耐心地遵从那些各有专长的专业人士的智慧；然而，随着资本家们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困难，偏中间的自由主义原来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再也无法确保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了。

3. 随即而来的动乱

1968 年的世界革命是重大的政治胜利，1968 年的世界革命又是重大的政治失利。它看似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生根开花，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却在世界各地都偃旗息鼓了。这把燎原的野火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呢？实际上，成果是不少的。偏中间的自由主义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事实上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这一地位被革命推翻了，现在它不过是多种意识形态选择中的一种。另外，旧左派运动也不再是单一的推动根本性变革的动员力量。然而，1968 年的革命志士虽然从偏中间的自由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他们其后的革命乐观，却是浅薄和不可持续的。

世界各国的右派同样从对偏中间的自由主义的附庸中解放了出

来。他们利用全球经济的停滞和旧左派运动（及其政府）的垮台发动了大反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的全球化。其主要目标就是逆转中下层人群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阶段中所获得的各种好处。全世界的右派都致力于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主要成本，摧毁各种形式的“福利国家”，并减缓美国实力在世界体系中的衰落。苏联丧失其对中东欧卫星国的控制以及1991年苏联自身的解体，一时间极大地鼓舞了全球右派的乐观情绪。

全球右派的攻势是相当成功的，全球右派的攻势又是相当失败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停滞（“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资产阶级的大企业家们的确将大量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了新的地区，也确实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中层群体数量得以迅速增长。然而，无论这些企业家们获益多少，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并不十分突出，与从1945年到1970年间这些资产阶级大企业所取得的资本积累相比相去甚远。

为了继续巨量地占有全球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转向从金融业获利，即所谓的世界体系“金融化”。如前所述，这种“金融化”也是现代世界体系五百年来周而复始的现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维持资本积累的方式开始由从生产效率中获利转为从金融交易中获利，更准确地说是投机。投机的一个关键机制就是鼓励借贷消费（当然在每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都会如此）。而这一次不同的是其规模和用于投机的新型金融工具的奇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上升阶段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最大规模的狂热投机。

我们不难看出一次又一次负债的目标，每次都会制造出经济泡沫，然后泡沫破裂。第一次大泡沫是1973年和1979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引发的油价大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提价不仅得到了石

油输出国组织几个极端的成员国的支持，更是获得了美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内两个最亲密的盟友，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君主制时期）的首肯。一直以来都有理由相信这两国这么做是受到了美国的怂恿。

不管怎么样，油价上涨的金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大量金钱涌入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腰包。这对南方非石油出口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有双重的负面影响。它们不得不加价购买所需要的石油和石油制品，而其出口收入又因为北美和西欧的衰退而锐减。这一进一出造成的支付困难使上述不少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动荡。

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不可能立刻就充分利用所有新增的收入，它们把无法利用的部分资金存入西方的银行里。这些银行接着又说服南方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接受它们的贷款以缓解各自的支付问题。这些国家后来却发现偿还银行贷款的难度很大，并最终造成了所谓的债务危机。1982 年墨西哥的拖欠债务是公开的信号。不过危机实际上是从 1980 年波兰接近拖欠债务时就开始了。波兰政府为偿还债务而采取的紧缩措施正是团结工会运动的导火索。

下一批放贷人是一批超大型企业。它们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以发行臭名昭著的垃圾债券为手段来解决自身的流动资金问题。这引来了贪婪的投资者进行收购，并通过剥离企业的实际资产而获利。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信用卡的广泛使用和其后的房产投资让大规模的个人负债在北方国家兴起。21 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的公共债务由于巨额战争支出和税收大量减少而迅速增加。随着 2007 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全世界的媒体和政客都聚焦到了“危机”及对银行业的“救市”上，当然还有美国的发钞上。接下来是各国政府越来越严重的债务问题，这迫使各国都推行紧缩措施以削减国债，而在采取这种紧缩政策的同时也抑制了有效的需求。

获取资本的地理位置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里也发生了变化。所谓

的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崛起，显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体系正在慢慢地进行重组，这种现象在过去屡见不鲜。然而其前提是系统中仍有产生新的领先生产行业的空间，但从总体利润率下降这一点来看，这一趋势似乎不大可能。事实上，“金砖国家”的崛起确实只是让参与全球剩余价值分配的人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降低了而不是增加了无止境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并且加剧了而不是减缓了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另外，当前在如此多国家广泛采取的紧缩措施也削弱了“金砖国家”出口的顾客群基础。

经济危机最有可能导致的金融后果就是美元最终将丧失其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然而其他任何一种货币都无力成为世界性的储备货币，于是会出现多种货币的共存和不断的汇率波动，这对新型生产活动的融资困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从2001年到2006年，在小布什总统统治下的新保守主义奉行单边主义的军事骄横，造成了美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方面的双双挫败，至此美国霸权的衰落已无法挽回，其结果是造成了多极世界的现状。目前全球有八到十个势力中心足以与其他势力中心进行相对自主的谈判。然而势力中心还是过多了，这造成了每个中心都在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会经常出现地缘政治的重组。市场与货币的波动在政治势力的合纵连横的波动中更为加剧。

目前的基本状况是不仅中期发展难以预测，就连短期发展也充满了不可预测性。这种短期不可预测性带来的社会心理是对当权者的彷徨、愤怒和轻蔑，还有压倒一切的强烈恐惧。这种恐惧使人们诉诸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政治方案。媒体称之为民粹主义，不过实际情况远比民粹主义这个标签要来得复杂。这种恐惧驱使一些人到处非理性地寻找替罪羊。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恐惧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世界体

系的运作规律，破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理念。这从美国茶党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迥异中就可见一斑。

世界各国政府——从美国到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巴西，且不说那些在世界舞台上更为弱小的政府，它们的主要忧虑无不是急切地要阻止失业工人的暴动，而后者的队伍随着中产阶层储蓄和养老金的消失正变得越来越庞大。各国政府的一个反应是成为地方保护主义者（尽管表面上极力否认）。这种保护主义倾向的根源是各国政府都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短期资金。由于保护主义不足以克服失业，各国政府也越来越诉诸镇压。

紧缩与镇压的结合以及对短期资金的寻求使全球的局势更加恶化。它造成了系统被进一步锁死。这一僵局反过来又引发更为严重的波动，并且使短期内对经济政治形势的预测更不可靠。这又加剧了公众的恐惧和异化，形成恶性循环。

4. 争夺系统替代品的政治斗争

当前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各国政府应当以何种方式来改良资本主义体系，并使其重新获得追逐无穷资本积累的能力，这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拿什么来取代当前的系统？用2011年以来流行的政治术语来说，这对“1%的人”和“99%的人”来说都是个问题。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表达。实际上很多人都觉得当前的系统可以按照已有的法则继续运行，或者只要对法则修修补补一下就可以了。想法倒是不错。不过在当前这个状况下，继续遵从已有的法则只能加剧系统的结构性危机。

确实也有一些人洞察到了结构性危机。他们意识到，尽管无法延续现有的系统，但我们总可以在决定构建何种新的历史系统、在历史的岔道上决定朝哪个方向前进时有所作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一场对后继系统的争夺战已经展开。尽管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表明，这种分

叉的结局从根本上是不可预测的，但摆在世界面前的几种选择却是十分明了，并可以概括出来。

一种可能的新型稳定系统是保留现有系统的基本特征：等级制、剥削和两极化。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具有这些特征的系统，新系统可能比资本主义还要坏得多。其顺理成章的对立面是一种相对民主平等的系统。后者尚不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当然，没有人能勾勒出这两种系统的制度细节。它们会随着新系统的降生逐渐演化出来。

我给这两种可能性取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名字本身并不重要。我们需要分析的是斗争双方可能采取的组织策略。这场斗争差不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这将一直延续到 2040 年或者 2050 年左右。

结构性危机中的政治斗争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其状况与历史系统的“常规”运行状态有本质的不同。系统在“常规”运行阶段面临很强的回归均衡状态的压力，因此才称为“常规”。但在结构性危机期间，波动巨大而且持久，系统更远地偏离均衡状态，这也是结构性危机的本质。由此而言，在“常规”阶段的“革命”，无论多么激进，其效果都是有限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结构性危机中，任何微小的社会动员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此时的自由意志会压倒决定论。

第二，结构性危机另一个显著的政治特征是，或许因为无法建构上述这两种“精神”，而使得一小群人得以完全决定危机的走向。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参与者，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笃信不同的短期策略，很难协调统一。另外，各方的激进派都要尽力说服更大的一群潜在支持者。这不仅仅使系统处于混沌状态，而且使对后继系统的争夺战也处于混沌状态。

至此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在实际中显现出来的战略。“达沃斯精

神”的阵营内部分歧重重。其中一方倾向于立即采取长期的残酷镇压，并且已经投入了资源，组织起一批武装执行人员来镇压反对力量。然而另一方则偏爱迪·兰佩杜萨式的策略，以万变为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大谈能人统治、绿色资本主义、促进平等和多样性，他们对叛逆者敞开怀抱——只是为了阻挠建立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系统。

“阿雷格里港精神”的阵营内部同样意见不一。其中有些人在过渡时期的策略反映了他们力图构建的世界，有时这被称为“水平主义”。在实际中，这些“水平主义”者力图扩大争论，并在背景和利益迥异的群体中寻求相对的共识，他们追求的是推广运动本身和世界功能上的去中心化。这群人还强调所谓“文明危机”的现状，他们真实的意思是否定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追寻社会目标的理性平衡，从而实现相对的民主和相对的平等。

与他们相对立的群体则坚持认为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一些垂直的组织形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运动注定会失败。这个群体同时强调当下在“欠发达”地区取得短期显著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有经济实力对利益进行再分配。

因此，斗争的图景中并非只有两方，而是有四方在政治角力。这是十分令人困惑的。这种困惑同时存在于智力、伦理和政治层面，并且使最终的结局更加不确定。

最后要说的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当前系统的短期问题更加突出。这种不确定性既让人兴奋不已（感觉行动可以带来改变），又让人望而却步（感觉短期后果太不确定以至于前景不明）。无论对当前系统的受益者（资产阶级），还是对广大的下层阶级来说，都是如此。

那么回到前面的话题：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体系由于过度偏离均衡状态已经无法再维系下去，也无法再让资产阶级继续无止境地积累

资本了。下层阶级不再认为历史站在他们一边，不再认为他们的后代能继承这个世界。于是我们身陷结构性危机之中，资本主义将被何种系统所取代的斗争也随之展开。尽管无法预测最终的结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有一方最终获胜并建立一个（或者多个）新的比较稳定的世界体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尝试分析可行的历史选项，对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做出道德选择，并评估实现这个目标所需的最佳政治策略。

历史是中立的。我们当然有可能对应该如何行动作出错误判断。由于结果不是外加的，而是从本质上就不可预测，所以我们有五成的机会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世界体系。不过五成的机会已经不低了，它相当高了。

第二章 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 再也无处逃遁

兰德尔·柯林斯

资本主义长期的结构性弱点正在显现出来。那就是科技带来的机器对人工劳动的取代，在过去 20 年里，这是以计算机的发展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这种取代正在威胁并会加快威胁整个中产阶级的未来。我的观点并不新颖。马克思就曾对工厂机械取代工人的机制作过讨论，不过他在讨论中还谈到了其他的一些作用原理，比如商业周期、持续下降的利润率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流行的金融化和金融危机。我想要强调的是，技术对人工的取代一旦到了某个极限，就很可能引发资本主义长期甚至是无法消解的危机，这并不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其他作用原理来解释。商业周期在震荡的广度、深度和时间变量上可能是模糊和不准确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曲线和世界体系中的全球霸权也是如此。金融危机则可以通过正确的政策措施加以避免。不论怎样，技术取代引发的结构性危机会超越经济周期和金融泡沫，成为对资本主义前景的严重威胁。确实存在着由金融、商业周期或者其他机制引发的短期危机，但我要集中讨论的是长期的结构性变迁，而这很可能会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将资本主义引向终结。

我不保证我所借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和权威性。今天的

社会学如果有什么基本理念，那就是认为在对待选定的问题时可以有多种过程、多重因果和多重范式。在这层意义上，重要的是韦伯学说在社会学中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政治、文化和性别之间的相互渗透成为了重要的讨论对象。当然，有些时候问题的焦点在于长期结构性变迁的关键特征，特别是结构性危机的问题。这里不管我们多么崇尚学术的多元性和跨学科研究，在我看来都有一种理论在探讨危机的机制和长期结构性变迁的方向上远远优于其他所有理论。我所推崇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总结出的深刻见解。我对他们的理论作了简化。

这确实是简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不谈劳动价值，不谈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也不谈偏离类存在物的异化过程。这个理论不做任何本体论上的论断，也不讨论危机之后人类的最终解放。我把它简化成关于长期经济危机的理论，而讨论如何应对危机和危机后的政治社会形势则需要其他社会学理论。此外，我的理论不是描述国家被经济危机征服的理论，将它本身单列出来也称不上是革命理论，尽管最后我会谈到社会学对革命成因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个理论会谈到社会主义的未来，但它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讨论如何在未来改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说来，我的理论首先并且首要是关于危机的理论。

技术取代是设备和组织上的创新节省劳动力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可以减少所需的雇佣劳动，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家在竞争中追求更高的利润，失败者会被市场淘汰。但随着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取代工人，失业率上升，消费需求也随之下降。技术虽然能带来产品的丰足，但潜在的产品却会因为没什么人有足够收入来消费它而滞销。按照这个内生的结构性趋势进行推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并会被社会主义

所取代。

为什么这个理论被提出 160 年后，上述预言还是没有实现呢？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政权的出现，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的，也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衰败之时。我要说的是，资本主义暂时还没有因为技术取代而崩溃。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了劳工阶层的劳动被取代，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个阶级主要由白领员工、行政文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组成。这正是我认为如今技术取代的危机将会回归的理由。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前，机械化取代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而最近这一波的技术革新则开始取代行政工种，并开始缩小中产阶级的规模。信息技术是人类沟通的技术，它开启了第二轮对劳动的取代，这次取代的是中产阶级所从事的沟通类工种。在机械化之外，我们的字典里又增添了自动化和电子化这两个决定人类长远发展的丑陋词语。

资本主义过去曾有五条逃生路线来避免技术取代造成的危机。我认为，现在这五条路线都被堵塞了，只剩下死路一条。

一 逃生路线 1：新技术带来的全新就业机会和全新就业部门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对新技术持悲观态度是徒劳无益和顽固守旧的表现。1811 年的勒德主义运动破坏工厂机器，参与者认为，是这些机器损害了手工业者的就业机会，而没有看到原来的生产模式正在被工厂体系所取代，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这将引发巨大的工业发展并大大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20 世纪中叶形成的发展理论认为，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矿业、制造业和行政服务业）的转移是很自然的过程。但是发展理论只是以历史特定时期为考察对象

而做出的经验归纳，并不能保证这个过程会永久持续下去。农业原来是最主要的就业工种，如今它在发达经济体的就业比重中只占约1%。制造业则从40%的占比高峰下滑到了15%以下。这些数字表明了技术取代的规模之大。行政服务行业出现类似的下滑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资本主义创新最有研究的熊彼特认为，新产品及其创造的新利润点会通过他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把市场上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不过，受到熊彼特启发的经济学家们也不过是在按照过去的经验，推断出新产品带来的就业机会能够抵消旧市场解体造成的就业流失。

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技术发展对沟通类工种的取代，而这个工种的崛起正是过去补偿旧工种消失的安全阀。有人会说，虽然电话接线员和处理文件的文员会因为自动化和计算机化而失去工作，但是技术也会带来同样多的新就业机会，如软件开发师、计算机技工和手机销售员等。可是没有人就这一增一减的两个数字是否一致给出过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更不要说对为什么这些技术和沟通类任务的自动化——例如网上购物——不会在总体上缩小白领劳动人口的规模这种观点做出解释了。技术取代正在发生，再过不了几年，商店收银员的工作就会被自动收银机所取代，而这正是中产偏下的服务业中最大的就业部门。在需要更多技能的就业部门中，由于许多报业的媒体在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中衰退和倒闭，职业记者正在消失，大量业余的、无报酬的“博客”写手正在取代少量被雇佣的记者。

新型就业机会的创造不及中产工种的自动化来得快。确实有新型就业机会出现，但速度赶不上旧工种消失的速度，也无法补偿失去的收入。这是再就业计划无法有效改善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自动化和互联网催生了新的部门：软件设计、网站建设和大量自由职业的在线信息提供和咨询业。但后者的准入门槛很低，竞争激烈，因此工资

通常不高，很多时候甚至是免费提供服务。虽然信息技术（IT）创造了新的活动，但创造就业的速度赶不上中产阶级工种消失的速度。意见类博客的大量出现不能抵消新闻业雇佣岗位的流失。

以 IT 业创造并取代的雇佣劳动为例，并将这个趋势向前推演几十年，计算机程序员和软件设计师有没有可能占据世界上 70% 的就业机会呢？别忘了自动化才刚刚开始，虽然已经过了初级阶段但还没有进入成熟阶段。这个比喻可能过于生物化，但这里要传达的是，更复杂的自动化还没有到来，即机器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过程。当计算机程序和新的应用能完全由计算机产生之时，中产阶级工种的取代就基本完成了。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到时也无法为我们提供逃生路线。其实从一开始它就不能抵消流失的就业机会，而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就业机会与由计算机取代的劳动相比会越来越——就像走进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隧道。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随着制造业、矿业和农业劳动的衰败，在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总劳动人口的 75% 左右（Autor and Dorn, 2013）。而 IT 经济发展了 20 多年，正在对服务业产生挤压。销售类的工作正随着自动生成的信息和网上购物而迅速自动化；在实体店铺中，收银员正被电子扫描仪所取代。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管理类职务也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人类被计算机和其他机器取代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内在的终点。对人类劳动的取代不仅仅是未来 20 年或者一百年的事，而且是会延续几千年的事，除非有什么外在因素能够改变技术取代劳动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资本主义竞争。

由计算机管理的未来世界不一定会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那样，由国家通过高科技进行监控和专制统治。奥威尔忽视了经济的维度：高科技的电子技术不仅会影响政治，而且还会影

响就业。同样，科幻冒险片中展现的未来美好世界也是错的，机器人和计算机的所有权从来都不是问题。在真实世界中，这些大型计算机系统都将由大型的资产阶级产权人所有。IT 业硬件和软件的制造者将是资本主义企业。现在流行的通信公司（脸谱、谷歌、亚马逊、推特，还有未来几十年所有可能出现的企业）和历史上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模式都是一致的，即在其他创新基础上的快速创新，竞争者大量出现，高增长的企业在大浪淘沙后存留下来；金融市场积极投资，竞争者在金融压力下倒闭。信息技术时代寡头的形成与这之前几波技术更新中的情况完全一样。信息技术时代还比较年轻，因此不能肯定寡头的形成速度与铁路时代和汽车工业时代相比会如何，但从目前看来，其形成寡头的速度要比以前快得多（这是技术取代中产阶级工种这个主要问题的一个附属问题；而只要技术取代还在进行中，那么有没有寡头并不会太过影响资本主义长期的危机）。

也许有人会说，信息技术不一样。自动化不只适用于大企业和大的雇佣者，普通人也可以享用。计算机不归资本家所有，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这就好像（在 1925 年或者 1955 年）说：汽车本身不是资本主义产业，既然我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汽车，那么只要我自己愿意，我就有四处驾驶、或驾车逃亡、或在后座上玩车震、或在高速公路上飙车比赛的自由。对资本主义产业产品的热衷正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之一。没错，抓紧机会享受吧。当代消费级的 IT 设备给人们带来了随时随地可以收听的音乐享受，每时每刻都可以发送并查看的消息和图片，还有其他各种便利，但是，这些不能说明你是否还有就业机会。汽车的流行不只是带来消费者的享受，它更反映了一个产业的发展，在几十年里它创造了大量高薪的职务。但结局是，技术取代和资本整顿大大减少了汽车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今天让人关注和热衷

的个人电子设备，如果不能为这些消费者创造就业机会，就无法阻止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最终，这些消费者将无力购买这些设备，制造者也无力继续制造和销售产品。资本主义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就此成型。

二 逃生路线 2：市场的地理扩张

人们倾向于把市场扩张看作是全球化，但全球化只是扩张的量变而不是质变。即使在一国之内，市场也是通过向原先没有该产品销售的地区扩张而实现增长的；因此，这些地方的条件有利于外来的创新型企业获利。地理扩张和产品创新共同保证了市场前沿的存在。具有活力的市场总是新事物勃发，享有作为市场中心或者与中心同步带来的名声，或是努力摆脱落后的负面名声。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正是灵活地把这一机制应用并体现到了全球和跨国层面上。世界上的每个地区都会陆续地向上发展，直到所有地区都发展出全面的第三产业经济。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就是例证，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大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现代化。

以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这个过程的是世界体系理论（Arrighi, 1994；Chase-Dunn, 1989；Wallerstein, 1974 - 2011）。这个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地理扩张的理论不那么温和：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决定了对全球市场的主导；霸权中心在半边缘地区的协助下间接地剥削边缘地区的劳动力，攫取那里的原材料。在世界体系理论中，这个模式因以战争为标志的霸权交替和扩张与停滞往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波而显得更加复杂。而一系列“霸权周期”——从西班牙到荷兰、英国、美国以及未来可能成为霸权的中国——在边缘地区资源穷尽时自然会终结，此时全球所有地区都会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中。再没有多余的安全阀，没有新的地区可以剥削；资本主义的利润就此枯竭。

先不谈世界体系理论具体预言的准确性如何，我要强调的是，市场的全球化正在缩减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互联网技术使印度或是其他任何地区的白领工人都是可以竞争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已经自动化的行业中的职位。过去对中产阶级职位的保护要强于对体力劳动者的保护，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互联网让更多的劳动者可以参与就业竞争，如果不需要移居到别的地方才能就业的话，就更是如此了。同时，当代的全球化带来了更快捷的国际旅行。管理和专业人员可以直接在世界各地的职场发挥他们的专长和谈判技能，这更加促进了上层中产阶级的就业者被纳入更为同质化的劳动市场，使管理成本的下降和更高级别技术官僚工种的被取代成为可能。更强的互联性导致了更激烈的就业竞争，从而拉低了中产阶级的薪酬。这个过程相对较新：上层中产阶级过去几十年喷气式的增长也开始面临曾经影响他们雇员的相同的结构性取代。高级专业和技术专家过去不会遇到跨国竞争，而现在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和职位上的不稳定。

三 逃生路线3：金融大市场

如果说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工种被技术取代了，那么能不能让所有人都成为资本家呢？这个论点的提出，是基于养老基金在金融市场上开始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金融服务机构也开始积极地向更广的人群营销它们的投资产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们拥有房产是很普遍的，房价的攀升不仅使人们把拥有房产作为投机的机会，而且还提供了从高涨的房价中撤资套现以进行消费的机会。这些金融活动正是造成最近这场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金融风暴的原因之一。

我不是说最近出现的这些问题预示了资本主义正开始消亡。毫无疑问，我们会像克服其他危机那样在短期内走出这场危机，尽管会留

下一些长期的后遗症。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已经很多。这里我要考察的不是短期的危机，而是金融化对中产阶级工种被取代所起的作用。

近来的金融投机体现了资本主义更深层的结构性趋势，即金融市场中大市场（meta-market）叠加的金字塔式交易。资本主义自从进入了自我持续增长或内在驱动扩张的阶段后，就将实物市场和服务市场与金融工具的市场连接起来了。熊彼特（Schumpeter, 1939）将具有企业精神的资本主义定义为用借来的钱办企业。静态市场只能复制已有的货品和劳动力，除非在复制的循环外另起炉灶。因此在熊彼特（Schumpeter, 1911）看来，银行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司令部，它们决定了新的发展会在哪里展开。但由于金融本质上就有投机性，它可以通过很多形式与已有的实物安排建立联系。上层金融市场的市值远远大于实际可交易的实物和服务的价值；这从国际货币投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的差距，或是 2008 年崩盘前对冲基金过度膨胀的价格中就可以看出来。

所谓大市场的金字塔式交易，就是任何金融市场从低级的金融工具中产生出高级市场的历史趋势。在真实的社会活动中，所有的金钱都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因此金融专家们可以创造为未来支付承诺进行支付的承诺，并以此向上无止境地类推。贷款、留置权、股票和债券都是相对低级的金字塔式交易。对股票进行短期卖空、把债务抵押打包放进次级市场再交易、通过杠杆化实现收购、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复杂的交易方式，都是为金融工具的交易而建构的高级市场。原则上对可以继续叠加多少层并没有限制。更高级的市场能产生巨额数字，但把这些金钱转变为低级市场中的实物和服务则有困难。问题是这些市场的计量单位是一样的：美元、英镑、欧元等，于是容易产生错觉。这些名义上的数字可以无限上涨，但在真实的实体世界中要变现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引入金字塔式交易的金融市场社会建构性很高。当然，几乎所有事物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社会的建构，但是有些与实体制约因素的联系要小得多。比如一支军队有很强的社会建构性，特别是在战斗中，正如拿破仑所说，士气对物资的比例应当是3:1；尽管如此，如果有五倍于敌人的规模和武器，那么只要能维持最基本的社会凝聚力，就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取胜。在金字塔式交易的金融工具这个世界中，“士气”（即网络的互动过程及其情绪状态）对实体经济的比例，差不多可以从6:1左右（也就是借贷的规模与银行实际储蓄额的比例）到重度杠杆化的金融投机中的几百比一。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应当把社会建构性作为一套变量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常量，并从其对网络结构的静态关系和与经济兴衰的动态关系两方面入手分析。

这里的重点是，金融太市场的金字塔化越严重，就越脆弱，越容易引发危机，其无论繁荣还是萧条都远远超过了低级实体经济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希望保存资本主义，那也有乐观的一面。金融市场本质上是有灵活性的，就好像用魔术材料制成的大气球，可以吹成任何大小形状。这使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金融资本家，参与在金融市场中的豪赌。而公众对金融市场的参与确实使金融市场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迅速膨胀，例如通过养老基金和数百万小型股票投资者以及利用“庞氏骗局”^①，在泡沫化的地产市场中对抵押的房屋所有权进行投机。

但是，这条路能走多远？能挽救资本主义吗？从金融市场内在的

^① “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很多非法的集资集团就是用这一招聚敛钱财，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裔美国投机商人“发明”的，在中国这一骗局又被称为“拆东墙补西墙”，即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人支付高额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译者注

脆弱性和周期性的倾向来看，这肯定是条曲折的道路。从1637年荷兰郁金香投资热^①和1720年的南海泡沫^②以来，这就是其长期的历史模式。投机泡沫的破裂是如此普遍以至于熊彼特（Schumpeter, 1939）把商业周期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其存在是资本主义自我驱动力的标志。我们也可以把它反过来看：投机泡沫的破裂总会止跌回升，金融市场最终也会随之恢复。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巨兽的本性，而历史表明每次金融危机最终都会复苏。这里我们又遇到了缺乏良好理论根基的实证归纳。当金融危机与中产阶级工种的结构性流失以及一场席卷整个劳动人口的技术替代危机相结合时，会产生什么后果？从金融业所得的收入是否足以弥补那些靠工资和薪酬为生的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人人都成为靠投资收入为生的资本家，要不就是金融业本身成为主要的就业部门（即金融业相关职位的增加）。先来看看第一种可能，很难想象未来人人都以金融投资为生。需要初始资金的积累才能开始投资，就好比赌博需要有赌资。小型投资者要靠他们的薪水、储蓄和养老金；但这些会在技术取代的过程中枯竭。这是个前沿的理论问题，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很可能包括一些现在还无法想见的因素。但是我们可否想象，在未来一切都自动化

① 16世纪中期，郁金香被从土耳其引入西欧，由于量少价高，投机商看到其中的商机，开始囤积郁金香球茎，并推动价格上涨。至1635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已蔓延为荷兰全民运动。1637年2月4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六个星期内，价格平均下跌了90%。郁金香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经济，也间接导致了作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的荷兰的衰落。——译者注

② 南海公司表面上是一家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一家私人的融资机构，1720年通过贿赂英国政府，以南海股票换取国债，使南海公司的股票大涨，从1月到7月涨幅高达700%，但很快其股价又急剧下降，12月跌回股底。这是世界证券市场首例由过度投机引起的经济事件，“经济泡沫”一语即源于此事件。——译者注

的情况下，整个人口都作为金融投资者，成为终身赌博中的后备赌徒？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他们的投资生涯中一直赚钱，有人在好年景也会赔钱，多数人在投机泡沫破裂时都会亏钱。而他们一旦被投机市场所淘汰，除了通过自身就业积累资金外，还有别的途径可以翻盘吗？

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它将财富集中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大户的手中。正是更广泛的社交关系、内线消息、先发优势和与小户相比更能承受涨跌的能力，使大户们在更高级的大市场中有能力比相对低级市场中的中小户获得更多的利润。金钱的金字塔等级呼应了卫维恩娜·泽利泽（Zelizer, 1994）的理论，即金钱不是同质性的，而是在各自社会网络中流通的多元和特定的货币体系。例如，对冲基金圈子中的玩家只是极少数的机构和个人；小的参与者甚至不能合法地进入这些市场。或许这偏离了我们的主要观点，在未来理想的金融乌托邦中，核心投资者将成为巨富，而较小的投资者也能有所收益。这能足以支撑整个经济中的消费支出并维系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吗？如果金融市场越来越集中化，并以牺牲底层小参与者的利益为代价，那这就是不可能的。

再看看第二种可能：技术取代将引发金融行业的就业。我在对资本主义的乐观预计中就提过，金融市场可以通过让人人都成为资本家，或者通过让人人成为金融业的从业者而阻止中产阶级的消亡。后者有可能吗？当其他工种都被技术取代后，金融类的工作能填补这个空白吗？难道金融业本身就不会出现工作被技术取代的现象吗？其实在金融业的低级层面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网上银行正在取代银行的出纳人员和职员，银行在处理更多货币工具的同时反而在减少雇员的数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格言是，非熟练工种将被熟练的专业工种取代。但金融行业还能扩张到哪里去呢？20世纪90年代短期的大发展不过是昙花一现。不管怎样都很难想象，在一个自动化的未来大

多数的劳动者都会是对冲基金的经理。然而这可能正是资本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最理想的梦想——没有人从事真正的生产劳动，人人都靠金融投机为生。或许在 21 世纪后期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真是这样，我预计，那将是资本主义最后崩溃前的回光返照。

四 逃生路线 4：政府就业和投资

下面我们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特征之外的外在逃生路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方案。50 年前就被广为论述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是被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福利国家所挽救的——也就是说右派无力自救，反而是自由左派挽救了资本主义。那么政府支出能解决技术对中产阶级的取代吗？

政府直接雇佣的主要形式是中产阶级的行政工种；因此这些工种持续的自动化趋势同样会减少政府中的就业机会。政治上足够强势的政府也许能抵制这种工作的自动化趋势。英国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治人物，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尝试过这种新勒德主义政策。但以保持技术上的落后来保护就业大概会造成士气低落，在政治上这也不可行。正是这种气氛把英国带向了撒切尔主义的反动。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奏效的例子是军事凯恩斯主义，即通过军事生产刺激经济，并且增加在军队中的就业。然而当代军事也高技术化了，正转变为在计算机、卫星、探空感应设备以及远程控制的监控和瞄准设备协调下更精简的战斗力量。军队在机器人化方面走在时代的前沿，即使再次出现世界大战式的全民动员，恐怕也很难造就 20 世纪时那种庞大的军队了。

政府在直接雇佣之外还有政府支出，这是当今刺激经济计划中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主要是通过对实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如对道路、

桥梁、机场、能源以及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但是这些领域同样也在向自动化发展，因此反而加快了技术取代的步伐。政府对私有经济的投资更不太可能阻止工作被替代的大潮。尤其是在有效投资的座右铭下，政府扮演的是资本家或者至少是资产阶级监工的角色，更会愿意降低劳动成本，并因此造成工作机会的流失。

还有一种市场干预的方式是通过对私营市场的监管、缩短每周工时来保护就业机会不被削减。欧洲大陆的国家广泛地运用了这些政策，但依然没怎么能减缓技术替代的步伐。总体而言，这类政策倾向于保护已有的工作，而不能给年轻人提供新的机会。政府有意地大规模雇佣年轻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很少有国家会这么做（除了把年轻人征入部队），在“逃生路线5”中我会提到，政府实际上已经偷偷摸摸地这么做了，手法是扩招和让文凭缩水。

从原则上讲，政治政策是无所不能的，唯一的局限就是政治意志，也就是说，政治文化决定了政治视野和可动员的政治力量。很明显，国家如果想有效地应对技术对中产阶级的取代，那么其所需的政治文化还是差了很多很多。混合式的“偏自由的”政府政策能够支持私营经济并让资本主义苟延残喘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只要私营经济的牟利行为还驱动着经济发展，这种混合式的处理办法就不大可能解决技术替代这个长期问题。

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今（如美国）10%左右失业率带来的压力，还要考虑在未来的自动化时代，基础的失业率可能比现在要高出三到五倍。换言之，那将是大规模的就业危机和以福利国家模式来应对的民选政府。障碍不难想象，因为现在的政治领域中就有不少障碍。一个是反纳税运动，互联网企业因为网络面临激烈竞争，它们很可能和其他小型企业一起支持反纳税运动。这与政府想增加就业机会的行动相悖，会增加系统性危机的可能。另一方面的诉求来自于政治上的选

民，特别是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群，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是受过教育并且可以高度动员的政治力量。

哪一方会在这场较量中取胜，又会取得多大的胜利呢？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自身之力是无法抵御这场危机的。其最钟爱的改革方案，即减税和减少政府监管，只会鼓励资本家按照自己的意志继续进行扩张，这只会加快技术取代的步伐，并带来诸如金融投机和危机等其他问题。赞同福利国家的力量原则上能够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他们要面对国家的预算问题。为昂贵的福利国家买单的政府将面临金融市场的压力和货币丧失购买力的风险。看起来，福利国家的政府面对的是“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的局面。不过让我们暂时忽略日常政治中的磕磕碰碰而放眼长期。遇到深刻的结构性难题的国家正在走向革命式的崩溃，只差两个因素，即国家精英因解决方案上的分歧而产生的内部分裂，或是外部激进运动的动员。这里说的国家精英的分裂，指的是与金融市场保持结盟的一方同致力于通过国家手段缓解失业和不平等的一方矛盾的激化。在 10% 失业率和后衰退时期经济蹒跚的情况下，这种两极化并不严重，而如果将这个矛盾放到 50% 失业率和严重萧条的情况下，国家整体崩溃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这时通过革命彻底推翻现有的物权体系是最显见的解决方案，这包括夺取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使其无法损害政府发行的货币。革命消灭的将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还有其根本的制度支柱。

五 逃生路线 5：文凭缩水和其他 隐形的凯恩斯主义

文凭缩水指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取得更高级的文凭，就业所需要的学历也越来越高。学历和文凭的价值随着更多人取得更高级的学

位而缩水，这鼓励人们更长期地留在学校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具有高中学历（12 年制的中等教育）的人都是十分罕见的；而现在，高中学历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就业市场中毫无价值。年轻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了 60%，大学学历很快也会重蹈高中学历的命运。这是席卷全球的趋势：在韩国，80% 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文凭缩水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把人们又推回教育市场以寻求更高级的学位。理论上说这是没有止境的过程，很可能形成中国最后几个朝代官员科举的状况（Chaffee, 1985），即学生到了三四十岁还在继续参加考试，只不过今天受影响的是绝大多数人口，而不仅仅只是少数精英。不同国家文凭缩水的速度各不相同，但是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所有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Brown and Bills, 2011）。

教育文凭是一种衡量社会名望的货币，通过它可以获得就业；和其他货币一样，当自主驱动的货币供应超出了有限的商品数量时，文凭也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说购买力下降），而这里有限的商品指的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教育领域的通货膨胀会自我延续，在攻读学位的个人看来，对价值缩水最好的回应就是上更多的学。而获得高等学位的人越多，就业竞争就越激烈，雇主要求的学历就会越高，结果造成继续深造、竞争加剧、文凭再缩水的循环。

在这个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重在不断提高；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美国是如此。在把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情况推演到其他地区和其他时代时要特别谨慎。在学历通胀竞争顶端的人，可以通过几个过程获益：①他们在技术取代开始时相对比较安全，因为最后被取代的才是薪酬较高的体力劳动者和薪酬较低的文员；②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在工作表现上的差距明显扩大了。一个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事实是，教育领域的通胀让那些成绩并不出众的学生在学习上越来越敷衍，异化越来越严重，他们不

得不更久地在学校学习，而要想得到精英的工作机会却仍是遥不可及。这个过程的症状是，考试分数的膨胀和晋级的低标准。在对青少年、青年文化特别是青年帮派的民族志研究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学校学习的扩张造成了偏离官方成人标准的异化现象，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Milner，2004）。第一个青年帮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工薪阶层的青年人头一次被迫留在学校而不是成为劳动力；他们遵循的是公然反对学校的意识形态（Schneider，1999；Cohen，1955）。这成为青年反叛文化的源头，后来不管在加入帮派的少数人中，还是在反律法的多数人都流传得越来越广。今天的雇主常常抱怨服务行业中下层的职位很难找到可靠、有良心的雇员。但这并不是因为大规模的中等教育没能提供足够的职业技能（有礼貌地接待顾客，或者把邮件投送到正确的地址，根本用不到高中的数学和科学知识），而是枯燥劳动引发的普遍的异化现象。通胀严重的学校系统让学生们认为自己会获得精英的工作，但却又把他们抛进了只有枯燥劳动的经济之中，除非这个学生的成绩能超越80%的同龄人。如此一来，不被异化才怪了。

尽管文凭缩水是教育扩张的主要动力，但我们却几乎是弗洛伊德式地抑制了对这个过程的承认。这里的理想化和抑制因子，或者说教育世界里的超我，是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即对就业越来越高的技术要求使得非技术工种消失了，而当今对高技术工种的需求促使了教育水平的提高。30年前，我在《学历社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一书（Collins，1979）中，就曾找到许多例证表明技术变革不是驱动学历要求越来越高的原因。教育的内容并不主要由技术需求决定，多数技术上的技能，包括一些最先进的技能，都可以通过工作或非正式的渠道获得，教育的官僚化组织最多也只是把其他地方已经创新的技能标准化罢了。在后续对文凭缩水和技术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Collins, 2002; Brown and Bills, 2011), 我并没有发现可以推翻我在 1979 年所做结论的新证据。一小部分工作确实得益于科学和技术教育, 但这不是驱动教育大规模扩张的力量。未来不大可能出现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或者熟练技工的情形。实际上, 富裕国家最大的就业增长来自于低熟练度的服务类工种, 因为这里雇佣人工劳力比自动化的成本更低 (Autor and Dorn, 2013)。在现在的美国经济中, 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是文身师 (Halnon and Cohen, 2006), 这是不需要文凭的职业, 因其规模小、收入低, 到现在为止还不受大企业的控制, 也没受主流文化中异化的影响。

虽然文凭缩水源于错误的前提, 即更多的教育会带来更平等的机会、更高科技的经济表现和更多良好的就业机会, 但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为技术取代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文凭缩水可以通过阻止更多的人进入就业市场来吸纳剩余劳动力: 如果学生能获得直接的助学补贴或者低廉的贷款 (最终是无法偿还的) 的话, 这实际是一种隐性的转移支付。在福利国家理念不流行的地方, 对教育的崇拜带来的是隐性的福利国家政策。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就业的千千万万的教师、员工以及文凭缩水带来的隐形凯恩斯主义, 几乎可以说是让资本主义经济免于破产的救星。

只要对教育系统的资金投入不会断裂, 就可以继续作为隐性凯恩斯主义发挥作用: 这种隐性的转移支付和经济刺激类似于罗斯福“新政”中雇佣失业的工人去粉刷邮局的墙壁或在保护区里植树造林。教育的扩张几乎是唯一能被接受的凯恩斯经济政策, 因为大家并不把它当作凯恩斯主义政策。打出的旗号是高科技和精英统治——技术带来了对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迂回地说, 确实是这样, 尽管大家不愿意承认, 是技术对劳动的取代使学校成为劳动市场萎缩的避难所。不管怎样, 只要劳动被取代的速度和学生人口增加的速度

一致，那么系统就能继续维系下去。

困难在于费用上。支付学费（在各级学校中，无论初等、中等、高等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级别）的两个主要途径是政府提供和私人购买。在经济下滑和政府财政吃紧之时，二者都面临压力。2010年前后，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公共教育的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如此之高（特别是在地方级别），以至于引发了削减教育支出的运动。例如在智利，有50%的青年人享受高等教育，学生组织要求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而行政人员和在税收上持保守态度的人则要把更大比重的高等教育推到私营市场中，二者斗争激烈。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由学生和家長负担，这个趋势还在延续，助学贷款的数量（截至2011年）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个数字十分令人担忧。如果我们从延长学习期的学生数量以及助学贷款所占的经济比重向前推演，那么就不难看出，再过大概20年，技术取代和文凭缩水的成本对整个系统而言将是极其昂贵的。如果助学贷款的数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或者100%，那将会有什么后果呢？

教育是政府的主要支出之一，这会限制未来的扩张。随着成本的增加，会出现私有化和将学费负担转移到学生和家長头上的压力；然而这也有个限度，因为中产阶级在经济上也十分吃紧。2012年，美国已经掀起了根据就业前景来决定哪类文凭更物有所值的讨论。一种解决方案是根本不参与教育竞争，不过青年人更流行的选择是寻求特定的职业教育：服装设计、计算机编程、商科等领域的学校发展迅猛。但是，转向职业教育并不能打破文凭缩水的机制，可以预料，这些职业部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也会带来职业文凭的缩水。一个征兆是政治领域和监管认证部门中的争议，它们批评这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较低的就业成功率，并且拒绝为他们提供政府贷款。也就是说，文

凭缩水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

信息技术再一次被提出来作为解决方案。很多大学急于把课程搬到网上，从而实现经济规模效应。网上的有些课程是收费的，虽然费用比实体学校的学费要低得多；有些课程则是免费的。然而这不能阻止文凭缩水；实际上不管收费与否，二者都会因为把更多受过教育的人推向市场而助长文凭缩水。目前这类新文凭并非大学学位，因此还没有造成正面竞争，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在较为传统较为昂贵的教育货币之外，一种新型的廉价教育货币正被创造出来。如果教育货币确实像金钱那样遵守格雷欣法则^①，那么廉价的货币肯定会把昂贵的货币驱逐出市场。另一方面，在经济市场学中，卫维恩娜·泽利泽（Zelizer, 1994）和哈里森·怀特（White, 2002）所做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经济对象可以在独立的领域中与廉价的对象共存，在教育文凭的制造过程中很可能也是这样。

难题在于，让教育成本更低廉的努力会削减教育部门中的就业机会。如果少数知名大学通过网络课程就能垄断教学，少数教授在电子化协助下就能广为授课的话，那么这个教育部门的就业岗位就会被技术取代。结果也会与老式的抗税运动一样：短期内降低了人口的赋税负担，但反过来这也会减少人口中的就业机会。

在这五条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逃生路线中，在我看来，文凭缩水的推进是最有可能的方案。由文凭缩水引发的教育系统扩张，会把自身推到潜在的危机点。但这并不是终点。可以想象有一系列这样的平台期，随着我们对教育决定命运这个世俗信念的态度在笃信与幻灭中

^① 4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退出流通——它们被收藏、熔化或被输出国外；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人们将此称为格雷欣法则，亦称为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译者注

循环而往复。但如果过度依赖政府资金，就成了以教育为幌子的社会主义。可以想见自由派政府可能通过各种办法维持教育系统的扩张，把它们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安全阀以及从资本家和就业人口（他们本身正处在不断被削减中）那里获得转移支付的手段，以帮助失业人口维持生计。不过，只有当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近乎于革命式的幻灭时，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上台执政。

六 全面危机何时爆发？

（自 20 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的）中产阶级工种的自动化，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的机械化（这大概延续了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前 3/4 时期）。对中产阶级的技术取代不过才 20 余年，而消灭劳工阶层的劳动人口却用了将近二百年。

世界体系理论为资本主义未来危机的时间提供了另一种估计。在以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论述中，沃勒斯坦和他的合作者们提出了一个系统长期周期的理论模型。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在扩张期可以通过在边缘地区获得的优惠条件开采资源而占据优势。霸权在核心地区内部的冲突中不断受到挑战，特别是受到来自半边缘地区的威胁。随着新兴领域中更加激烈的竞争，导致早期创新者的利润下滑，核心地区最终会被后来者赶上。在这方面，世界体系的运行类似于熊彼特的企业周期，只不过是放到了全球范围内。每个新周期都会在新兴霸权的领导下找到新的扩张机会和利润增长点，这背后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在世界体系之外必须存在可以被吸收入系统并成为边缘地区的外部地区。因此世界体系有一个终点：当所有的外部地区都被吸纳进来时，核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对利润的争夺就无法再用寻找新兴经济地区的办法来解决了。此时世界体系将进入最终的变迁，而不仅仅是周

期性的危机。

以过去的周期为基础，沃勒斯坦（另见 Arrighi, 1994）预测世界体系的危机将在 2030 ~ 2045 年左右发生。我个人的估计是，危机点将由技术对中产阶级的取代机制所引发，这取决于结构性失业增长的速度（这不能只以方便的数据来衡量，比如美国是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来计算；实际上，应该衡量成年人的口中无法找到工作和被完全逐出就业市场的人数）。10% 的失业率按美国的标准来说是痛苦的；25% 的失业率（爆发危机的经济体中的数字）就是大麻烦了。不过，这在过去也不是没有长期出现过。而当失业率达到整个可工作人口的 50%，或者 70% 时，资本主义体系所承受的压力，包括来自消费不足和政治恐慌的压力，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继续存活下去。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失业率是不可想象的，那让我们透过技术以电子设备取代所有工种的视角再来想想看。很明显，在过去的 15 年里，技术取代的速度在加快。结构性失业的比率很有可能在 2040 年达到 50%，并在其后不久攀升到 70%。粗略地说，这和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将在 21 世纪中叶出现这一预测相吻合。

七 反资本主义革命：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

当技术取代的危机足够严重时，即在高度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世界中，只有少数人在工作，而绝大多数人口要么失业，要么为争夺工资很低且枯燥无比的服务业职位而挤破脑袋之时，会发生革命吗？

这里我们必须把经济危机的理论放在一边，转而考察关于革命的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革命理论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斯考切波（Skocpol, 1979）、戈德斯通（Goldstone, 1991）、蒂利（Tilly, 1995）及其他学者在对国家政权兴衰的比较研究中，建立了所谓革命的国家

崩溃论。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上层的反应，而不是取决于底层穷苦大众的反应。主要的构成要素包括：首要的要素是要出现国家的财政危机，即政府无法继续负担开支，特别是用于安全保卫部队、军队和警察的开支；其次的构成要素是精英就如何应对危机产生分歧，并因此发生分裂。当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危机就变得致命了。在一系列先发事件中还可以加上一些次要的因素，通常有军事原因：国家财政危机往往是军费开支累积的后果，而军事失利会使精英陷入更严重的僵局，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并引来激烈改革的呼声。精英的分裂让政府陷入瘫痪，进而为形成激进的新型同盟扫清了障碍。在这个权力真空期中——也就是社会运动学者所谓的政治机会结构中，社会运动被成功地动员起来。这类激进运动常以解决底层的问题为名，但通常是由具有最优网络和组织资源的上层中产阶级派系所领导。正如托克维尔早就认识到的，运动的激进化和人民生活的疾苦程度没有关联；决定激进化程度的因素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冲突爆发的情感动力中，虽然如何将此理论化还没有最终结论。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都不是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危机，而是由政府的崩溃造成的。主要构成因素是政府自身预算的财务危机，而这通常是独立于外部经济的大型危机之外的。这意味着在未来，革命还会发生，诱因将是政府的崩溃、以国家为中心的财政危机、精英的僵局以及因此造成的国家执法部门的瘫痪这些特定的机制。国家危机比全面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当我们把它放到技术取代劳动力这个长期趋势的大背景下，将会怎样呢？有几种可能：可能在特定国家发生革命，而不一定是在技术取代最严重的国家；另一种可能是革命发生了，但没有带来解决技术替代的方案；还有一种可能是革命发生了而且带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特征。

鉴于历史是多重因果关系驱动的产物，未来就好像掷色子，有如

在中国的快艇骰子游戏中等待五个骰子同时掷出六点。因此未来确实有可能在政府的崩溃，或者再加上军事失利和无处不在的技术取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整体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

资本主义的危机决定了形势的发展。时机一旦成熟，政治上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就一定会有所作为了。可能会按照经典的国家崩溃路径：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政府自身停止了运转（因财政危机或领导层分裂而瘫痪，或二者兼有，或与外部的政治两极化呼应）；警察和军队失去组织上的凝聚力并开始派系化；国家开始丧失对有强力机构的垄断，这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暴力，例如出现动乱、大规模群众镇压或是内战。在革命的某一时刻（如 1848 年 2 月的法国大革命），已有的政权失去了组织力，没有人愿意继续为旧政权服务，新的议会迅速成立，剧烈的危机得以在不出现什么血腥的情况下化解。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 1917 年 2 月的俄国，在民众和士兵连续数天发生零星的暴力冲突之后，沙皇政权迅速退位并拒绝收拾残局。这些例子表明，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特别是在有复辟运动存在的情况下，接手的革命政权将很难巩固。如果把革命的时刻和余波分开，那么国家在革命中崩溃这一过程不一定是暴力的。政治社会学对革命后的政权巩固在什么情况下是和平的，在什么情况下是暴力的并无定论。我们只能说，历史上那些在革命和政权巩固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暴力都有可能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中出现。最危险的一种可能是，对反资本主义革命持反对态度的人把革命当作一种暴力变革的威胁，进而引发新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即以民众挽救资本主义的运动为后盾组织专制政权，推行少量的再分配来让大量的失业人口勉强度日，同时以警察国家的形态时刻准备镇压民众的反抗。我们还无法估计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民主或出现法西斯的概率。沃勒斯坦的猜想是各有 50% 的可能。

但是也很有可能出现好的结局：通过和平的政治过程实现从资本主义到非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变迁，这将是一场制度革命。假如资本主义的危机足够严重，即大部分人口处于结构性失业中，少数富裕资本家所有的机器人和计算机承担了绝大部分产生收入的工作，经济严重萧条，那么持反对资本主义纲领的政党就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执政党或执政同盟不得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金融方式，建立一套在劳动市场和牟利体系之外分配财富的制度体系。

这种选举政治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可能有些痴人说梦，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还不过 20 年，中国虽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市场化有了极大扩张，市场化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胜利。不过政治氛围每隔二三十年就可能出现大摇摆：想想 20 世纪中每个 20 年的阶段吧。如果技术取代的结构性趋势继续深化，20 年后出现重大的民意逆转并非难以想象。

和平的制度革命是可能的。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危机越是深化，选举政治的动员力就越能被激发出来。这条路很可能把我们引向相对非暴力的转变。

我们这个世界是多重相关因果关系的产物。事物总是披着特定位置、过程和记忆的外衣。因此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将会有很多变种。这里重要的不是具体的称谓、地点或是时间，而是相互作用的大维度，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性越来越严重而出现的那些能够彻底改变危机本质的重大过程。

一系列过程和问题将会使未来变得更加复杂：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的大涨、种族和宗教冲突、生态危机、大规模跨国移民以及大大小小的战争。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核心问题上：上述这些过程对技术取代的危机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有些影响会加剧危机，有些影响会加

大国家崩溃的压力，从而使革命的机会更大，也就是在掷骰子时同时得到更多的六点。其中有哪些过程会逆转技术取代、增加中产阶级就业、创造更多的职位来抵消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并足以挽救资本主义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考察一下这个简短的名单。

1. “全球不均”

推动资本主义危机的机制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强度各不相同。在美国和西欧，科技取代中产阶级工种的危机比较严重，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如中国、印度、巴西和未来数十年可能变得重要的地区，这个危机并不十分严重。是否能在世界其他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在特定的国家或者几个国家中实现反资本主义的变迁呢？这要看这个特定国家的经济规模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在经济规模不大的小国中建立的革命政权很容易被推翻；在全球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大国如果发生革命，这种革命就会很稳固且有示范效应。由于军事强国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支持意识形态盟友有干预他国的倾向，接连不断发生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权更替可能会引发类似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国际干预。假如2030年美国或者欧盟爆发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并造成反资本主义政权的成立，那么某个仍然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极有可能会通过干预来逆转这种政权的更替。这种干预能否成功取决于其相对资源、后勤保障力和地理位置等地缘政治因素（Collins, 1995）。

不过一个更大的过程可能阻止上述情景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是普世的趋势。即使在一些地区有波折，但自动化的发展对各种工种的取代会继续在所有地区深化，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种条件下长期维持资本主义的霸权。能够更好地进行再分配的后资本主义政权或许会带来足够的消费需求，并重新实现经济的增长，从而超越那些陷入自身危机的顽固的资本主义国家。

2. “资本主义危机和其他冲突的结合”

在这个多维度的世界里，许多不同的冲突是同时发生的。未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会和其他问题结合在一起，而这些问题常常因为牵扯到人类的情感并且极具戏剧效果而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

仅举几个例子。比如“宗教”，当前的冲突主要是在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和他们的对手间展开（基督教、印度教、后基督教时代西方的世俗主义、后共产主义的后续国家等）；也不排除在未来会出现其他的宗教冲突。“种族、民族和国家身份”，这包括了职务分配、对少数民族获取资源的配额、政府的条例（如平权法案等）、防范移民的边境管理、对移民的排除、领土争议和种族战争等各种冲突。当然也包括促进民族和谐与民族融合的运动，这类运动可能受到前面所说的寻求个别目的的运动的影响。还有一系列在平常能引起政治关注的短期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丑闻、腐败以及一些有时被升级为“文化冲突”的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和其他惨剧。然而结构性危机之所以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其结构性：这些问题涉及制度安排中无法避免的冲突，而这些制度安排又触及当前社会生活的物质和组织根基。与丑闻不同，结构性问题无法回避；也许可以忽略一阵子，但是其影响会持续产生。

与其他问题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涉及民族、宗教、性别和生活方式等的冲突会加剧资本主义危机，或者把局势搞得更加复杂，以至于出现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革命。如果大批民众作为受压迫受伤害的民族、宗教或性别群体被动员起来，并把他们的不满和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相结合，那么这类冲突也可以加深危机和变迁。把特定的身份认同和阶级动员结合起来，这在过去的革命中就有先例，未来还可能会发生。此外，这种结合多数情况下会转移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常常会被反动运动拿来作为动员的手段，通过民族、宗教和其他方面对改

革者个人的敌意而反对整个系统的改革。不过我们还是要看未来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度。如果确实如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那么除了转向后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出路。所有这些民族、宗教、生活方式和其他方面的冲突都只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喧嚣，随着危机的发展，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最终会携手通过转向后资本主义而解决问题。长期的结果并不是这种转变是否会发生，而是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

3. “战争”

我们设想的 21 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危机很可能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可能因为外界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政权的干预行为而引发一系列战争，或是由于外部援助和干预而加剧并延续内战，抑或是由于激进的后革命政权为了输出革命在其他地方引发战争。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路径下的革命（特别是和平的政治过渡）不会带来战争。与其试图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情况，不如让我们来考虑一些全局性的问题：战争会挽救资本主义还是会加剧其危机？总体而言，战争会促进革命，特别是在战败的一方；不过有时在战胜国，由于战争费用加剧了国家财政危机，也有可能引发革命。在反资本主义运动高涨的世界中，那些试图维护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取得战争胜利，能够通过武力来延续资本主义吗？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做到。但是，技术对劳动大规模的取代所带来的深刻危机，是不可能这样就得以解决的。即使出现上述这种情况，也只不过是能延缓向后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已。

4. “生态危机”

长期的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的枯竭和其他的人类活动正在造成严重的后果并危及未来人类的生存。问题是：生态危机会不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变化以至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是在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也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还是说这两个危机会结合起来互相加

剧，从而迫使人们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或者同时陷入无解。

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结合起来。生态危机能够帮助资本主义存活，这种看法实在缺乏说服力。绿色产业无法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以抵消技术取代，特别是因为绿色产业很可能走高科技的路线，从而加剧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生态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尽管从人类苦难的角度来说十分可怕，但在某些地区会更早地发生，生态变化也会给一些地区创造新的优势和机遇。一些地势较低的地方或许会被淹没；其他一些地方或许会因为干旱、炎热和污染而变得不适于人类居住。同时，有些寒冷的地区反倒会变得更加宜居；融化的冰盖会制造新的海岸线，使俄罗斯、加拿大和其他靠近冰冻线的国家受益。这些因素的结合会带来巨大的移民压力。还可能出现重大的人口流失，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可能会有几百万人丧生。不论怎样，几百年后，历史的冷眼会告诉我们，即使有 10%（或类似的数字）的世界人口死亡，剩下的人类世界还是会存活下来，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在把生态危机放到因技术取代中产阶级工种而引发的资本主义危机中。从生态受破坏地区逃入宜居地区的大批难民，会加剧那里劳动市场本就存在的激烈竞争。那些因自动化失去工作的主要人口，他们的生活机会被大量廉价和不断扩充的劳动力继续拉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在移民聚居区和已变得更加宜居的一些边疆地区，确实会出现新的就业机会。但是生态危机不大可能会中断技术取代危机的总体趋势。被取代的人口将从不再适宜居住的地区逃离，紧接着会引发反移民的运动，这可能会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更加不利。而站在人道主义这一边，欢迎这些幸存者的地区，可能会把同情心进一步转化为情感力量，支援那些致力于解决资本主义问题并建立非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总的来说，生态危机可能会增加后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可能性。

至关重要的是时机。对生态危机最细致的预测指出，人类栖息地

被大规模地破坏将发生在公元 2100 年左右。到那时海平面的上升将足以淹没低洼的沿海地区；主要人口区的农业将面临毁灭；水资源短缺将非常严重。而对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预测，则把时间点放得更靠前，大概在公元 2030 ~ 2050 年之间。资本主义危机将占主导，因为会更早进入危机状态。

八 后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可能出现的 经济制度摇摆

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制度将不得不改变现有的、通过资本主义企业和金融交易获取财富并将财富据为私有的安排，它将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将惠及那些由于劳动的自动化和机械化而失业的大部分人口，包括那些现在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人群。再分配计划也会控制目前正在制造资本主义灾难性未来的金融机构。也许这种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形式会比 20 世纪的经典实验，即国家社会主义要更加分散。

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当然不是。前者不会消灭政治。但愿后资本主义政权将是民主的。当然这一次人们会付出更多努力，认可民主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防护堤，而且是有其内在价值的。而政治总是有为人类发展找到新方向的潜力。

反资本主义的改革会让人们感到更加快乐吗？涂尔干（Durkheim, 1893）认为，快乐水平（大概也可说是不快乐的水平）在人类历史上大致保持一致：新形势会带来新的欲望和新的比较点。不管怎样，冲突是人类组织的内在组成部分。20 世纪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社会主义也有内部斗争，我们不能对它期许过多。其主要的优点是非资本主义，因此能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危机。

我不认为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将是永久的。这些政权很可能会因为选举或者未来 50 ~ 100 年内将发生的革命而改变。没有什么深层理由让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政权比资本主义政权更和平。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当世界舞台上存在机会时，一切国家权力组织都会追求权力和地位。有可能再次出现由军费开支引发革命的情况，实际上苏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垮台的（Collins, 1995）。未来的几个世纪远远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反复摇摆，也许还有其他某种我们没有想见的制度。

有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经历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是相当不堪的，不可能再有什么吸引力了。不过，资本主义未来可能会被极少数拥有大企业的精英垄断，他们销售并经营所有的计算机和机器人设备，让大部分人口去争夺那些为精英和机器服务的就业机会。和这种可怕的情景相比，社会主义不一定会更差。我并不认为愿景宏大的空想社会主义会复兴，但在某个阶段，政治人物即使了解到其他制度选择的缺陷，也会在因系统危机四伏无法承受时选择那样的逃生路线。当资本主义坏到极点时，自然会转向社会主义。当国家社会主义扫清了这些问题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很可能会引发反动的运动。因此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将会出现在两个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摇摆。

后资本主义可能不会消除所有的经济不平等。过去社会主义政权的经验表明，可以把不平等的水平降低一半左右——可以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尼系数以及苏联解体后世界上迅速加剧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解决了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并让大多数人可以体面地就业后，人们可能很快又会变得厌烦和不满。之后再过 50 年，很可能重复 20 世纪 80 年代对共产主义体制的理想幻灭。未来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可能是专制的，也可能是民主的。当然政权掌握了所有的自动化技术、机器人以及各种协调和监控的手段，足以让人们感受到它

强悍的社会存在，即使是通过比较仁慈的形式。这种体制中的权力政治不可能消失，而这将是引发未来冲突的另一个诱因。

除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不满，市场也有可能获得重生。如果计划经济的内部有足够的空间（并且假定是比较自由、混合式的计划经济），商业网络会成长起来，企业家会开办新的企业，并有可能通过更大的创新来取代集中的计划经济。投资和金融会像伊甸园里的蛇一样再次出现，引发新一轮的投机和金融操控大结构的金字塔化。如果社会主义政权足够民主，那么资产阶级运动有可能通过选举再次上台，然后部分或者全部地废除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如果政权更加集权，那么革命理论预测的情况会再次出现，只需等待引发国家崩溃和政权更替的条件产生。假如在遥远的未来——比如说 22 世纪或者 23 世纪，资本主义复辟了，那依旧不是历史的终点。如果复辟的资本主义和当前的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自我毁灭倾向，那么人类世界可能会重新陷入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到反资本主义体制的摇摆之中。

总结起来，无论我们向前推想几百年，长远的未来很可能在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和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这二者各自的缺陷之间摇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哪条路都不会带来人类的解放，现实地看，只会在社会经济问题的警号中摇摆。

九 结论

我想强调，我的分析是扼要的。我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长期结构性趋势，这是资本主义内部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当前这个阶段的高科技创新，即自动化、机器人化以及机器对沟通类人工劳动的取代正在全面展开，并且肯定会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越来越极端。完整的人工智能尚不存在，无法准确地模拟人类进行灵活和创造性认

知的能力。人工智能离这个标准越近，就会有越多高级的劳动力被取代。可以想见，不出 50 年可能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将由计算机和机器人来完成，只需要少数人作为技工和维护的人员。机器人成了新的体力劳动者，而工厂的机器人已经取代了大多数薪酬优越的制造业岗位。更高级的具有移动性并配有感应器和计算机的机器人，可能发展成能够取代上层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熟练工种的机器人，接着还会出现取代理人和技术专家工作的机器人。这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幻故事不同。对未来真正的威胁不是什么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ian）式的机器人暴动，而是在拥有机器人的少数资本家主导下，技术对劳动的取代进入最后的阶段。

无论技术化未来的细节如何，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短期性、周期性或偶发性危机，技术对劳动的取代这一结构性趋势都会把资本主义推向危机。这个加剧不平等的趋势也会削弱消费市场，最终使资本主义无法维系。扼要地说，唯一能解决危机的办法是用非资本主义的体系取代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要引入社会主义的所有权以及强势的中央监管和计划。至于这个转变何时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则更多地取决于复杂和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论框架。

最终的结论依旧是：资本主义目前在一些地区处于主导地位，21 世纪结束之前，技术对中产阶级的取代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的衰亡。这个过程和平与否还有待考察。

参考文献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Verso, 1994.

Autor, David, and David Dorn.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 S. Labour Marke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2013): 1553 – 97. <http://econ-www.mit.edu/files/1474>.

Brown, David K. , and David B. Bills, eds. “Special Issue: New Directions in Educational Credentialism. ”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9 (2011): 1 – 138.

Chaffee, John W.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se-Dunn, Christopher.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1989.

Cohen, Albert K. *Delinquent Boys: the Culture of the Ga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55.

Collins, Randall.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Collins, Randall. “Prediction in Macro-sociology: The Cas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995): 1552 – 93.

Collins, Randall.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 ” In *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 edited by Steve Bri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0 – 122.

Durkheim, 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originally published 1893).

Goldstone, Jack A.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Halnon, Karen Bett ez, and Saura Cohen. “Muscles, Motorcycles and Tattoos: Gentrification in a New Frontier. ”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6 (2006): 33 – 56.

Milner, Murray Jr. *Freaks, Geeks and Cool Kids: American Teenagers, Schools and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Schneider, Eric C. *Vampires, Dragons and Egyptian Kings. Youth Gangs in Postwar New Y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Schumpeter, Joseph A.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University Press, 1979

Tilly, Charles.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 – 183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 2011.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s. 1 – 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ite, Harrison C. *Markets from Network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Zelizer, Viviana.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第三章 末日或已临近，但丧钟 为谁而鸣？

迈克尔·曼

一 引言

像我这样的历史社会学家擅长推演历史，但未来可是不一样。预测民族国家或者资本主义这类宏大社会制度的未来尤为困难。把问题简化一下，假设我们讨论的制度是一种具有内在发展逻辑、周期和矛盾的“系统”，那么就有可能找到其当前的发展逻辑并预测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轨迹。很多人确信资本主义正是如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包含了有规律的经济周期和回归均衡状态的内在趋势。因此这次的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将会有一段复苏期，接下来会重新出现危机和复苏的往复，而总体的轨迹应当是向上的。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等人则认为存在更深层次、时间更长且威胁性更大的周期。他们同时认为，这些周期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和可预测性（可预测性是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即便是对均衡状态这个概念存疑的凯恩斯，也不否认长远来讲在国家的少许助推下可以重新建立周期循环。上述这些模型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具有恒久性（熊彼特除外）。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资本主义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但是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和其他生产方式一样最终会在系统性矛盾的作用之下消亡。

系统性因素在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学说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中有明确的表述。对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体系论者来说，最难预测的问题是何种制度将取代资本主义（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丧失了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由于大部分高谈阔论资本主义的学者来自西方，而当前西方的资本主义显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崩溃论。

我也希望能够有十足的把握勾勒出未来，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预测。但是有三个理由让我无法做到这一点。首要的障碍是我描述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型，我并不把社会作为系统来看待，而是把它视为多重交错与互动的网络，其中有四种网络，即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最为重要。在这四个网络之外还可以加上地缘政治关系，作为政治权力和军事的混合体，又可分为习惯上所谓的“硬”地缘政治和“软”地缘政治。上述这四五种权力的来源也有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因此我们有可能从中找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周期或回归均衡的趋势，正如我们有可能在其他社会权力的来源中也找到类似的趋势一样。比如说进攻和防御的周期、移动和静止的周期或者是持续升级的火力，所有这些都是军事权力关系的内在趋势；或者说现代国家的长期增长和民族国家对帝国的取代，这些主要是政治权力关系的内在趋势。不过意识形态有其特殊的发展周期，根据的是主导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奏效”，以及其他哪种可选的意识形态能够解决危机。

这些不同的作用关系是互相“垂直”的。也就是说，它们相互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系统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找出一种权力来源中的“内在”作用关系，毕竟它们不具有绝对自主性，一方面的发展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承认这种作用的重要性后，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比如其中资

本主义的发展就会受到意识形态、战争和国家的影响。在尝试解释前两次资本主义危机，即大萧条和现在的大衰退时我将说明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使得对未来的预测更为困难。

其次，地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这让复杂性更为突出。民族国家和宏观区域之间的差异很大，以至于刚才我们指出的一般性趋势，或许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大。当前希腊的资本主义危机可能很严重，但临近的土耳其就只有很小的危机，而在中国则几乎没有危机。这些差异会带来不同的世界历史发展轨迹，比如说预示了中国可能会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或者亚洲经济将会超越西方。宏观区域的变动在历史上有许多先例。

而核武器的出现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保证了国与国的竞争不大可能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这引出了第三个复杂性。人类不是理性的计算机器。有时人们面对复杂的、没有明显解决办法的问题时，常常有可能受到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的驱动，为了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有时人们会被强烈的情感驱动而失去理性。因此人类的行为常常是不可预测的。在 20 世纪里，人类经常做出在今天看来很不理性的决定——打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或者试图对人类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彻底改造。没有理由相信 21 世纪会有什么不同。

因此我的预测最多也只是指出可能出现的情景。我会考察资本主义的终结，或者退一步说，资本主义的衰落是否即将在美国、在西方、在全球经济中，或者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发生。我预见的一些情景有些会比较乐观，有些不那么乐观，涵盖的世界范围也不一样，其可能出现的概率会受到资本主义与其他权力来源和危机相互作用的复杂影响。我会尝试给每个情景估计出一个大致的概率，尽管有些实在只能算作大致猜想。

二 系统与周期

有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将作为单一的系统遭遇终极危机，对此我保持怀疑态度（后面会解释可能有两个例外）。比如说沃勒斯坦所谓的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的体系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这是由资本积累的逻辑决定的，并以不断恶化中的持续 50~60 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繁荣和萧条往复为表现。沃勒斯坦认为下一次的萧条将会严重得多，并有可能终结资本主义（反正他是这么希望的）。他说利润率会下滑并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滑，因此我们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第二部分是表现为长期“霸权周期”的地缘政治危机。霸权意味着主导。危机发生在不同霸权间的过渡期。他的例证是霸权从荷兰共和国到大英帝国的过渡以及其后霸权从英国到美国的过渡。这些地缘政治周期的长度和经济周期相比起伏更大。从荷兰到英国的过渡用了一百多年，从英国到美国的过渡用了 50 年。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在称霸七八十年后，其霸权很可能近期就会终结。我能理解他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不确定。他确实把中国的霸权作为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他似乎认为更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不再存在单一的霸权。考虑到他是持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人类渴望出现单一的霸权，上述情景可谓充满凶兆。他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和霸权周期的危机会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是认为在某些节点上资本主义危机和霸权周期的危机会重合并互相强化，从而造成整体的系统性危机。

这是一个深刻而简洁的理论，但我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首先看一下他列出的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他把荷兰作为欧洲第一个霸权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选择。在 17 世纪晚期，荷兰率先采纳了一些资

本主义制度，其在海上和陆上都能有效地进行防御，并获得了几块殖民地。但荷兰从来没有主导过欧洲，更不用说主导世界其他地区。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当时是欧洲的主要强权，但是在欧洲大陆（以及其中的帝国）基本上是多极的地缘政治。英国在 19 世纪主导力更强些，作为领先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强权，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最大的帝国，并在一段时期中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然而英国从来没有在欧洲大陆上建立霸权，而是依靠其他国家的实力平衡保护自己。沃勒斯坦认为其后的时期是德国和美国两个潜在霸权争霸的时期。他把从 1914 年到 1945 年的时期作为二者的“30 年战争”期，这实在是很奇怪的描述，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参战很迟缓，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只是在被日本袭击后才加入战争的。美国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霸权地位，然而战争是德国和日本自杀式的法西斯主义和军事上的耀武扬威所引发的，美国建立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战争的意外结果。美国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也是因苏联内部转向经济专制才得以实现。这样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是四大社会权力共同复杂作用的结果。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就已经具有领先的经济强权了，但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美元可能要和其他国家的货币共享储备货币的地位，其军事或地缘政治的实力也会弱小得多。战争的结局使美国成了一个历史上的大反例，它成了有史以来唯一的全球帝国，并拥有了真正的全球霸权。但是仅就这一个例子很难支撑“霸权周期”理论。尽管如此，我还是赞同沃勒斯坦的一些观点，即美国在最近成为了霸权国，而其霸权正在削弱，并很有可能在 2020 ~ 2025 年间终结。这个独特的世界历史过程可能会带来针对美国的危机。

那么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周期大体固定的连续上下行曲线又如何呢？康德拉季耶夫认为，他的 K 曲线会持续 54 年。如果是这样，鉴于经济在 1933 年触底，那么应该到 1960 年为止连续上

涨 27 年，随后开始衰退直到 1987 年到达另一次谷底，然后在 2014 年再次回到繁荣的顶点。可如今并不像是在上扬啊！康德拉季耶夫的后继者以价格的波动或生产总量的波动这两种不同的标准来确定周期长度。有些人认为 1972 ~ 1973 年是上扬的开始（因为价格开始上涨），还有人认为这是下滑的开始（实际生产并没有下滑，但至少在西方的增速开始减缓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更大的分歧：上扬是在 1913 年还是在 1929 年结束的？另一次上扬是在 1938 年还是在 1945 年开始的？对于这些周期的意见少有共识，因此我们对其周期性保持怀疑。

沃勒斯坦有自己的 K 曲线模型。他认为上一次的上扬（生产的上扬）始于 1945 年，在 1967 ~ 1973 年间达到顶峰。对西方经济来说大概是这样，但这不大能被视为是资本主义内在周期的产物，更多的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产物，因为是战争提供了外在的经济刺激。英美首先对建立一个全球规范的资本主义体系达成共识，随后这个共识又被美国所有的盟友所接受。这个体系依靠在战争期间被强行限制的消费需求，加上战时的技术进步，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并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段时期之后，西方经济从 1973 年到 2000 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0 年经济应该开始再度上扬，但十年过去了，上扬还是没有开始。不过我们也看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在西方停滞后又继续繁荣了一段时间，有些国家至今还处于繁荣期。首先是日本，然后是东亚国家和中国，接着是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它们都经历了繁荣期。K 曲线即使在研究西方的经济学家看来也是很有争议性的，对其他地区来说则似乎是毫不相干的。

上扬和下滑在资本主义中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在长期的上扬后，人们开始过于自信，于是摔得很惨。银行家和房地产所有者在 21 世

纪的头十年里正是如此。但是任何精准的周期现象似乎都是难以实现的，真正的全球规律是十分罕见的。不过或许有可能从过去的危机中找到一些资本主义未来危机的线索。因此，作为一个相信理论必须建构于详尽的实证研究之上的学者，我将考察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两次危机，即大萧条和当前的大衰退^①。

三 大萧条

这两次危机都有多重原因。多数是经济内部的原因，毕竟这是经济事件而资本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内在”逻辑。但也有些原因在经济之外，有些甚至是很偶然的因素。在两次危机中，危机都是始于一个严重问题，随着这个问题被“发现”又加剧了其他的脆弱点，于是危机一步一步地深化下去。这些脆弱点，有些是经济上的，有些不是，但都是先前被忽视的。整个过程很有可能朝着其他方向发展。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也不均匀，有些国家的经济几乎毫发无损，有些国家则通过有效的政策快速地摆脱了危机。这些都让我们质疑存在一个单一的系统逻辑。不幸的是，这也让我们更难预测未来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开始于农业的过度生产（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巴瑞·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指出的，危机因为英国霸权和其他强权的中央银行不再合作维持金本位（相对“一战”前而言）

^① 在拙著《社会权力的来源》的最后两卷中，我对此有更加详尽的讨论：“大萧条”参见第三卷 *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 1890 - 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的第7章以及第四卷 *Globalizations, 1945 - 201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的第11章。“大衰退”参见后一部著作。

而变得严重起来。单独的国家在“一战”后通过临时措施回归金本位，但主要是靠民族自尊的意识形态而不是靠实用的经济政策来维持的，因此金本位的水平基本上不切实际。德奥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和同一时期英法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危机。法国和美国储备了黄金。旧政权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眷恋，这与股票市场的泡沫和从旧生产模式到新生产模式的尚未完成的过渡一起造成了经济中就业前景的降低。在处于风暴眼的美国，国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由于奉行那个时期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所谓的“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m）中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取消主义信奉的是通过紧缩措施摧毁效率低下的企业、产业、投资者和劳动者。上述这些诱因相互串联，缺了其中任何两三个，危机最终都可能降级为普通的周期性衰退。而诱因的串联绝非是不可避免的。

大萧条通常被视为全球性的，但其影响是不均衡的。西欧和英语国家最为严重，即使在这个区域里，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的人均收入降幅也是英国的六倍和法国的三倍。但是在最初的下滑后，大萧条对世界其他广大的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中国只受到了轻微影响，而苏联、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还有东欧都在大萧条过程中继续增长。因此大萧条实际上并不是全球性的。或许我们应该把它称为“白种人的大萧条”，因为白种人受到的影响最大。有些国家通过取消金本位和经济的再度通货膨胀很快走出了大萧条。美国最终也走出了萧条，但是罗斯福政权对复苏过于自信，结果导致了1937年的通货紧缩，形成了“二次”衰退。实际上美国的经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工业需求暴涨的情况下才完全实现复苏的。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非经济原因的重要性。我以危机中军事权力关系的作用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大萧条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战争期间，许多较贫穷的国家得以大大增加农业出口。参战国的农业生产

在战后恢复正常，这造成了过度生产，于是价格大跌。但是战争同时也摧毁了各方一致认可的金本位，而和平条约则未能解决地缘政治上的角力，让政治经济上的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危机并不一定是多极地缘政治的结果，因为地缘政治带来了战前的经济稳定；危机是这场特别可怕的战争的地缘政治遗产。

如果战争是由资本主义衰败或者英国霸权衰败造成的，那么这还可以为系统性危机的论点提供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几百年里就已经是一个特别热衷于战争的大陆，战争依旧是默认的外交模式，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这个大陆以前的许多战争一样，始于大国对附属小国（现在的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防卫。军国主义是欧洲的传统（参见拙著《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第2章和第5章）。在大萧条中，不同的因果链如同支流汇入主干一样汇集起来，随着其他脆弱点被“发现”，各种“迷你”的危机串联起来成了一场更严重的危机。

四 2008 年的大衰退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当前的衰退是否会持续、恶化甚至成为引发可能造成资本主义崩溃的力量。不过，让我先来简要地分析一下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同样能看到串联的情况。衰退是以美国危机的形式开始的，结合了几个不同的因果链。第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的霸权和霸权造成的全球不均，使美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可以用低到忽略不计的利率从海外借来大笔资金，最终累积了无法维持的债务。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由此造成的利息上涨挤破了抵押贷款的泡沫并引发了最初的实际震荡。然而，这个因果关系也需要来自政治人物对打造“财产拥有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承诺，即让全国人民都能成为房屋的购

买者。第三个主要原因是，上述过程均发生在取消金融监管之后。第四个主要原因是美国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最后这两点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政治体系内部银行家和企业高管的权力过大所致。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将短期的“股东价值”作为企业的主要目标。由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在英美两国都占主导地位，因此在英国也有类似的发展。这些诱因在其他多数国家不那么明显，不过德国对通货膨胀的排斥（因为受到通货膨胀造成希特勒上台这个历史神话的影响）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政策并不矛盾，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实力也使这种财政保守主义得以在欧洲大陆上传播。军事的影响在大衰退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和排斥通货膨胀的意识形态。

这些压力随后“发现”了金融服务业的“神童”们。他们的数学公式使人们错误地对那些看似高深却与实体经济联系越来越弱的金融工具充满信心。他们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转化成为关于风险的数学模型。人们错误地相信经济完全是市场体系，其中主要的参数可以准确地计算和预估出来。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各种风险因素会串联在一起。

后来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并不是因为美国霸权的衰落，而是因为美国、美国的经济、美元以及美国的数学经济学家们保持着霸权地位。美国经济活动的衰退随即影响了债务缠身的国家，受影响的还包括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良性”的经济体。这些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没有受到债务或不平等加深的困扰，也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或金融资本所吸引。恐慌的投资人在仔细考察后又“发现”了在衰退和资本收缩开始后债务无法维系的部门和国家。在衰退开始前的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欧洲国家所进行的统计表明，只有希腊和意大利的公债率小幅超出这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欧盟国家政府债务的

平均水平略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水平（71%比73%）。政府债务的水平只在希腊是实际问题。在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正如在美国和英国），迅速攀升的是私债——尽管意大利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低下。这些经济体的问题各不相同，可能还没有被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发现”。但是衰退来临并随着紧缩政策恶化时，经济活动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减少，因此各国的公债都开始激增。

之后的欧洲危机由于衰退“发现”了欧元区的一个外部弱点而恶化，衰退成了一场重大的主权债务危机，这首先是欧元区的内部失衡造成的。之前在欧盟内就有大量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较贫穷的国家，希腊政府在财政上的不诚实也使情况雪上加霜。欧元区17个国家的精英通过单一货币积极推动欧盟的“深化”，但没有建立起一个具有财政功能的中央银行，以对欧元提供足够的支持，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其他十个欧盟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导致了危机的深化。这是结构性的政治弱点。精英们很明白，如果意大利或西班牙这样规模的较贫穷国家遭遇危机，那将无法为欧元找到足够的后援。但是作为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他们愿意冒这种风险。他们知道，欧元区国家前三次关于小幅推进欧盟一体化的公投都以失败而告终，各国选民肯定会否决任何一种建立欧洲单一财政部门的提案。对这些精英而言，政治理想压倒了经济智慧，带来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欧洲的危机又因为英国和德国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原因推动紧缩计划并将此强加给其他较弱的欧洲经济体而变得更为严重。各种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因果链（这里不包括军事）还有可能偶发地串联在一起，造成更加严重的“二次”衰退。

大衰退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同样是不均匀的，从世界银行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2008年或2009年中举步维艰。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中，危机确实是国际性的。之后在

美国，在跨越欧洲东至俄罗斯及其东边的邻国，还有在一些贫困的负债国，危机继续深化。但是到了 2010 年，很多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尼日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韩国和新加坡这样的重要国家，经济都已经成功反弹，并取得了 21 世纪以来最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几乎恢复到了之前的最高水平，中国官方公布的增长率从 10% 降到了约 8%，但仍然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除了加拿大以外，上述这些国家都是我们习惯称为“欠发达”的国家。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都从结构性调整的几十年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建立了外汇储备来预防大规模外债。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受创就较为严重。加拿大之所以能逃脱，是因为新兴的能源开采业使银行业扮演的角色较小，而且加拿大对银行业的监管也更为严格。其他各国如果也是如此的话，应该也能避免危机。如果这是系统性危机，那么这个系统性危机是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来规避的。

因而大衰退和大萧条看来都只对某些国家是灾难性的。由美国传来的病毒确实通过金融管道和国际贸易的减少在全球传播。但很多国家都通过不同的结构性安排快速地走出了危机，这些安排有些是经济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也有些是意识形态上的。发挥作用的机构主要有：法团主义和发展型国家（韩国）、快速增长但没有大型金融业的经济体（多数国家）、缺乏新自由主义（多数国家）、避免外债一类的谨慎政策（多数亚洲国家）或是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大洋洲国家都因为上述原因没有怎么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宏观区域。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国家都与中国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一点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正如在大萧条中显现的那样，正确的政策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错误的政策则可能加剧危机。因此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是美国危机扩散和不同因果链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包括

欧盟特殊的政治节奏和制度以及德国（和英国）精英偏向紧缩和避免通胀的意识形态倾向。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更长久的增长，如果有什么威胁的话，这种威胁是来自于外部的，来自于美国和欧洲自身的弱点。

当前的危机会继续深化并吞噬所有的人吗？如果欧元区崩溃，那对其成员国来说自然是个坏消息，也会对全球的贸易和投资造成重大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这样的非欧元区欧洲国家，因为英国对欧元区的贸易和投资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危机会沿着国界线传播，从俄罗斯到近东和北非，还有作为欧洲主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的美国。南美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如果西班牙经济崩溃的话。如果欧盟和美国双双经历经济收缩，那么国际贸易受到的打击将十分严重，毕竟美国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将近一半，而如今经济全球化的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印度，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将大幅下滑。这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比许多人预测的“二次”衰退还要严重。即使如此，危机对西方的打击大概也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打击要大。

这种串联很可能发生，不过欧盟区国家也许能找到金融解决方案，毕竟控制欧盟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精英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不惜一切代价寻求解决方案是他们的共同利益。问题是（在别的地区也是如此），可以用来救市或者刺激经济的金融资源已经没有2008年时那样多了。我要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行为和政治意愿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无法预测结局。但我能预测的是，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在这次衰退中遵循由美国共和党人提出并由英国保守党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如果这一政策又因为德国对通货膨胀的排斥而加强的话，那么有可能出现更为全球化和系统化的大萧条。如果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集体利益，并以此为行事原则，如果这些国家能够

采取更多的凯恩斯主义路线，像法国政府倡导的那样举资投入经济刺激（一部分要靠向富人加税），那么可能会避免危机继续恶化。无论哪种情况，最终应该会迎来经济的复苏，也不会有世界大战，虽然第一种情况会慢一些。后面，我会谈到经济复苏是否能全面地恢复就业。

资本主义存在周期，但这个周期是否有规律则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周期中的衰退阶段会更为严重，这可能是“内部”经济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开支浩大的战争、政治僵局或者意识形态驱动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后者在大萧条和大衰退中都是导致危机恶化的重要原因，在大萧条中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可行的宏观经济意识形态，在大衰退中是由于很长一段的市场增长期因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明显失败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放开监管，特别是放开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政治和地缘政治关系也很重要，但预测起来更加困难。确实可以从这两次危机中吸取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以降低未来发生危机的概率，但是还看不出掌权的精英们是否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在衰退中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让人回想起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取消主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20 世纪的两次大战有着截然相反的效果，这更增加了预测的难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最终引发大萧条的衰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大大促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期和美国霸权的到来。

五 美国的霸权及其异议

综上所述，美国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遭遇最严重的经济衰落。沃勒斯坦认为美国实力最强的时期是在 1945 ~ 1970 年，之后就一直在衰落。对这一点我不是很肯定。实际上由于日本和欧洲的复苏，美国

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中所占的比重从 1950 年到 1970 年一直在下滑。而随着美国成功地利用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带来的优势，这个比重从 1970 年到 2005 年基本上没有变化。之后由于印度和中国的增长势头更快，美国确实出现了相对的衰落，但美元始终保持强势，美国依然可以用不到 2% 的利率借到无穷多的现金，而且在多数年份中美国在经济生产力和增长率上的表现都超越了欧洲和日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瑞·艾肯格林都认为，美元在 2020 年以前将继续保持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还占了全球军费开支的 48%（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数字），并且在专利数量、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一流大学数量和大众文化上继续保持着绝对优势。不论好坏，美国会继续保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当然霸权不可能永久持续，有些人认为美国衰落的征兆已经显现出来。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在过去十年中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失利。其政治和地缘政治权力关系已经接近危机水平。政治人物刻意地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大型企业高管和投资者的融合（特别是保险业和养老基金的经理人），使这些人可以给自己开出天文数字般的薪酬和奖金（而只需要交纳 15% 而不是 35% 的所得税），这也大大加剧了不平等。倒退的税制、企业的被掠夺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共同造成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意识形态上的异化。

但是由于美国的异化问题造成了两极的反应，所以目前并没能带来政治上的解决方案。由共和党领导的一方指责政府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困难并提出减税、精简政府规模和降低监管力度以恢复市场主导的繁荣。共和党人偏好以紧缩措施作为应对衰退的办法，这与造成大萧条更为严重的“取消主义”策略十分接近。自由派的民主党人提出另一套解决方案，他们认为以“华尔街”为象征的大企业和大银行对危机要负主要责任，政府应当加强管制，提高有助于再分配的税

率并通过实行增加公共支出这条凯恩斯主义的路线来恢复经济增长。目前的政治僵局，特别是共和党极端反动和保守的立场，让我们无法对美国应对这些未来重大挑战的能力持乐观态度。美国在面临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涂尔干^①所说的失范问题，即共同规范的缺失（按照涂尔干的理论，失范会降低社会凝聚力并引发衰退）。

共和党人把让民众勒紧裤腰带、让富人繁荣的紧缩方案看成是创造就业的方案，但是富人的消费力并不大。相反，他们会储蓄，这将造成资本过剩和利率下降，推动消费者举债，而这正是衰退形成的原因。这威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积累了财富的大众消费需求型经济的根基。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反科学，这对美国的未来也不是好事。但共和党人在经济政策上更为团结，与他们相比，民主党人主要的问题是内部的分裂。这使共和党人得以掌控近年来的政策议程。以前的共和党领导人在辞令上十分意识形态化，但在实际政策中相当务实。在美国，大众文化和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更能产生共鸣，而不太能接受国家干预主义。在“二战”后的繁荣期里，实际的经济政策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取得妥协的“商业凯恩斯主义”，即由国家推动市场发展。但当时的政治辞令，特别是共和党这一边的辞令几乎完全集中在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上。美国的政府其实变得更强大，但大家假装情况不是这样。因此自由市场的呼声在今天能够占据政治上风，因为相对于国家提供福利，前者在意识形态上更加深植于美国文化。政治人物和选民很可能无法向有用的经济政策敞开怀抱。

① 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译者注

美国还有其他弱点。军费和医疗开支都很高，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倍之多。如果以海外军事干预以及国内人口死亡率和寿命的统计来衡量，其表现是相当差劲的。而政治人物们依旧把这两大开支和不再加税的信条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它们会继续消耗经济资源，增加公债，使国家的负担更重。四大社会权力来源中的这些弱点可能会把美国击倒。对此我们还不能肯定。美国人民是非常勤劳和有创造性的。美国工业大体上还是具有活力的。美国有可能重新捋顺这些意识形态、金融、军事和政治上的问题。否则当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时，美国的借贷能力将减弱，除非能大大提高税率，否则军事力量将会衰落——但加税似乎不大可能。美国的霸权在未来的 50 年中迟早会终结，而终结的方式可能不会很漂亮。

但这不一定会引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美国霸权的继承者不大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单一的霸权国家——中国做不到，印度做不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冲破了云霄，但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达到更成熟的水平后，增长率一定会回落到正常水平。这些国家同样面对自身必须克服的危机。未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近期的美国那样强大。人类社会将进入未知的领域，走向更为多极的政治，并逐步建立一揽子相互协调的储备货币。这曾经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也没有对世界经济造成过什么危害。20 世纪上半叶，确实出现过毁灭性的战争，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与国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特别是当美国人丧失了对战争的热情之后。

然而罗列出迄今为止躲过危机的国家，我们会更加感受到经济力量正在从老牌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还在成功发展的国家转移，这包括亚洲的大部分国家。中期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美国、欧盟和四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分享经济权力。由于金砖国

家经济体——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更注重政府监管，中期的资本主义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国家主义因素。

六 资本主义市场的枯竭？

这里我将开始着眼于长期态势。迄今为止，我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运行法则”造成周期性系统危机的看法保持怀疑。我描述了历史上重大的危机并把它们作为特定因果链串联的产物而不是单一的系统性危机，这些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因果链意外地，有时是相当偶然地叠加在一起。迄今为止的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都是不均匀的，并造成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的转移。以前的危机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世界体系的弱点所在。相反，它们展现了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地缘政治中权力的地理转移。

但在本书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兰德尔·柯林斯在设想可能出现的全球资本主义终结时，都没有考虑过去或现在发生的危机，而是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世俗倾向，认为这些倾向有可能在未来造成资本主义的灭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维持利润和就业的能力有限。他们引述资本主义的增长正在把地球填满，市场将遭遇地理上的极限。他们也注意到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为了解决低速增长期的问题，把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更不受监管的地区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所谓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空间解决方案”。就业从美国北部转移到美国南部，然后再转移到拉丁美洲、中国和越南，并将继续转移到非洲和中亚地区。柯林斯特别担忧的是，他看到中产阶级的脑力劳动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当这些地区都被吸纳后，当资本主义的市场遍布世界各地时，会发生什么呢？

沃勒斯坦认为，从投资大量进入一个乡村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

地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需要 30 年。因此当地球被资本主义填满时，世界各地的工资水平都会很高，利润就会下滑。资本家虽然会尝试降低工资，但他们面对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后者的抵抗将造成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印度和中国庞大的人口中，如今还只有少数人被吸纳进了监管宽松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经济。因此需要比 30 年更长的时间。此外，这个过程在非洲和中亚尚未开始，因此资本主义要填满地球可能要等到 21 世纪末期，特别是考虑到按照现有的估计，人口的增长将持续到 21 世纪末，而在最穷的国家里人口的增长也最快。

然而，我认为地球达到经济市场的极限这个模型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如果没有多余的廉价劳动力，资本家就不能继续通过他们获得高额利润，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新兴发展国家中增加的消费需求可能会抵消前面的状况并带来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让所有人都能享受更多的平等和社会公民权。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更美好的资本主义，让全世界都能享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人享受的那些权利。说到底，那段时期发达国家巨大的财富是由它们之间的贸易和生产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来自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和生产（石油除外）。“二战”后的繁荣期主要是发达国家自身较高的生产力和较高的消费需求的产物，并不主要是依赖于剥削南方国家的劳动力。对整个世界而言，为什么未来不能是这样的呢？

此外，新市场不一定会受到地理的限制。市场可以通过培养新的需求而创造出来。资本主义早已学会了应该如何说服普通家庭，让它们认为需要有两辆轿车、需要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的电子设备。50 年前有谁能想见到这种情况呢？50 年后我们的子孙们又将消费些什么呢？现在根本想象不出未来的消费时尚，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有所消费。市场不是固定在地域上的。地球能被填满，但新市场总能被创

造出来。当然，这取决于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大体类似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活力的核心——企业家将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带来了新产业的形成和旧产业的毁灭。造成美国大萧条的部分原因就是主要传统产业的停滞，而新兴产业虽然蓬勃但规模还不足以吸收那个时期的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这一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其后才实现，从而迅速释放了被战时牺牲所限制的巨大的消费需求。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否正在出现或者即将出现。微电子和生物技术都是新兴的、活力十足的产业。但问题是迄今为止这些产业的规模还没有大到能够带来令人满意的就业解决方案，尤其是解决西方劳动市场的问题，那里的新产业是更加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西方大多数地方制造业衰退带来的失业并没有因为新兴产业的兴起而缓解。近期如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设备的创新，在创造利润和就业增长方面无法与铁路、电气化或汽车业相比。“绿色革命”是近来的一个特例，它主要是在较贫困的国家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同样重要的是医疗和教育部门的扩张，这两个部门更偏劳动密集型，劳动力人口中的脑力劳动者和中产阶级更多。其扩张可能会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和教育资质的缩水而持续下去。

兰德尔·柯林斯列举了人类社会的应对就业下降时可能出现的情景，并且一一作了驳斥。他的分析颇有说服力。然而，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扩张实际上带来了全球就业的增长，甚至超越了世界人口的大增。1950~2007年的就业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40%左右。在国际经合组织这个代表世界上较富裕国家的组织里，就业人口的数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虽然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增大了，后者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增长，而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比例也比以前更高，这包括更多的女性求职者。就业市场中女性的解

放是西方就业最大的难题。但全球失业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07 年基本稳定在 6% 左右。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即使在大衰退中，全球就业依然继续增长，尽管涨幅只有危机前的一半，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也不均匀。2009 年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率开始下降，如欧盟（下降了 2.2%）及其邻国，还有属于原苏联的独联体国家（下降了 0.9%），但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有所增加。在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中，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下降，但在其他地区这个比重在 2010 年末就回到了 2007 年的水平。失业还只是西方（日本在更小程度上也有这个问题）而不是全球性的问题。

西方的损失是其他地区的所得，世界总体上是受益的。而以后发达国家劳动市场的问题，很可能是劳动力短缺而不是高失业率。人口寿命还在提高，而生育率则降到了维持人口基数所需的水平之下。欧洲、日本和北美将需要大量移民才能填补这个空缺。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个人口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预计世界总人口在 21 世纪后半叶将开始减少。因此大规模失业的可能不会出现，也不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

正如柯林斯所言，没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能够永久地制造出新的就业来抵消就业流失。只不过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确实是如此。但也没有理由认为创造性破坏就会停滞。谁能预料到发展的过程会带来怎样的新需求？在后面，我还会提到另一个创造性的部门。

但假设我的合著者们的悲观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有可能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两者在我看来都更有可能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崩溃。第一种结局是相对悲观的资本主义情景：结构性就业保持在水准， $\frac{2}{3} - \frac{1}{3}$ 型社会出现，即 $\frac{2}{3}$ 的人受过良好教育，有熟练技能，经常性就业，生活无忧，而剩下的 $\frac{1}{3}$ 人则被社会排除在外。贫困人口可能会领到足够的福利和救济而免于反抗，也可能受

到镇压。他们是少数群体，因此革命成功的几率很小。融入社会的2/3人口很可能不会同情被排除的1/3人口。前者可能视后者为没用的失败者、乞丐或者骗取救济的人。在一些国家，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的信徒在贫困人口中将超出比例，负面的民族和宗教偏见将成为这类刻板印象的一部分。被排除的人口可能世代相传成为底层阶级，从而强化融入社会的人口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口间的鸿沟。融入社会的人多数会投票要求维持这一鸿沟，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大多不会参加投票。福利多寡的差异可能将继续在西方存在，瑞典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会愿意将穷人保持在主流社会中，而美国这样的国家可能就不会。在美国，我们能看到这种悲观的情景已经出现，社会学家们则认为欧洲也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这是工人阶级的最终消亡，但不是资本主义的消亡。它将带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不对称的阶级结构，这一次资产阶级组织良好，而工人阶级组织内部则混乱而分裂。社会制度即使在表现不好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下来，除非在受压迫的群体中产生反对制度的组织力量。

上述情景是让左派特别心寒的情景，这是剥削更加严重但又不受到挑战的资本主义，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出现。全世界的左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弱小。总部设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全球激进组织“世界社会论坛”，是南方反抗北方/西方剥削运动中的重要力量。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对全世界的剥削。但是“南方”在发展过程中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从最近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印度和巴西与西方和日本一起在较贫困国家的反对声中推迟了减排计划。

第二种情景比较乐观。在这个情景中资本市场确实会填满这个星球，利润和经济增长率也将会下滑，但最终会稳定为一个长期保持低增长的资本主义体系。当然这也不是新情况，资本主义最大的突破发

生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英国，而英国的年增长率从来没有超过 2%。英国的成功经验就是将比 1% 略高的平均年增长率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在 20 世纪，这个步伐加快了。在两次大战之间，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日本和其殖民地以及苏联）取得了史无前例的 4% 左右的增长率。到 20 世纪末期，中国和印度（现在还有其他国家）则实现了大约 8% 的增长率。尽管这个高增长率已经保持了至少 20 年，但最终还是会回落的。非洲和中亚到时可能会表现得更好些。不过这些国家在回到历史上英国成功经验的 1% 的水平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美国和欧洲的增长率下降到这个水平的速度会更快，但是在最近的大衰退中，只有少数国家在一两年中出现了负增长。为什么 1% 的增长率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呢？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按照其历史模式继续作为一种低增长的全球系统呢？在这种情景中，20 世纪——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的 1945 ~ 1970 年和东方的 20 世纪末期——将被视为是特例。低增长的情景也会削弱投机所扮演的角色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大衰退再次出现（现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很高）的几率将会变小。当然，随着全世界劳动条件的改善，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消息。届时整个人类都可能生活在几乎是稳态的经济中，就好像过去 20 年的日本。资本主义的未来可能不会是风雨飘摇，只是会变得枯燥乏味。

如果要选出一个最有可能在 2050 年前后出现的情景（如果在这期间没有其他情况的干扰），我的选择是：低增长的全球资本主义将把更多的平等传播到世界各地，但仍然会有 10% ~ 15% 的人口成为失业或偶尔就业的下层阶级。这是上述两种情景的综合，与 19 世纪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十分类似。我不认为会出现什么革命。

革命式的变革还面临一个障碍。苏联式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革命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是灾难性的，而迄今为止也只出现过这两

种制度。没有什么人愿意再次尝试这两种系统，可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备选的方案。无论是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改良式的社会主义都处于历史上最弱的时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犹太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正在兴起的意识形态，它们对物质上的考虑和对超越现实世界的考虑一样深入。20 世纪关于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选择都失败了。在被卷入全球经济的较贫困的国家中可能会出现社会主义或者类似运动的崛起，但是这些运动可能会转向改良。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革命都是在重大战争动摇了已有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时爆发的。20 世纪最大的两次革命发生在俄罗斯和中国，世界大战（其诱因与资本主义危机不同）都是这两次革命必要的诱因。让人庆幸的是，战争在世界各地都呈下降趋势——实际上只有美国还在继续发动对外战争，也没有出现任何有规模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革命看上去不大可能出现。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到了消亡边缘。

左派的未来大概最多也只能是持改良态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雇主和工人将继续为资本主义就业中各种琐碎的问题而斗争（如工厂安全、工资、福利、就业保障等），可能的结局是妥协和改革。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像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那样为实现改良的、更加平等的资本主义体系而努力。正如西方那样，有些国家的努力成效会更大。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较为严重。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利润分配的不均衡。在那里，社会动荡是有可能发生的，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变数，也许还会带来如俄罗斯那样并不完美的民主制度。美国也面临极大的严重挑战，其经济受到军费和医疗支出拖累，政治制度腐朽失效，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立，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而美国人也将逐渐意识到，他们所特有的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道德优越感是毫无根基的。这也将是美国继续衰落的一个原因。

七 世界的终结？

不过在上述这些情景之外，还有两个比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更大的潜在危机。这两个危机都是全新的，而且是真正系统性和全球性的。它们不会被局限在国家范围或宏观区域内，因为它们就来自人人都要呼吸的大气。

第一个全球性的威胁是核战争带来的军事威胁。这个威胁的严重程度几乎完全不可预测，因为它取决于一系列事件，其中每个事件都可能不会发生。迄今为止只有过两次对决，第一次是美国（及其英法盟国）对苏联，第二次是印度对巴基斯坦，旁边是相对消极的中国。这两次对决中，冲突双方都明显地感到了确保相互毁灭的威胁，在几次小规模危机后，双方都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升级。核威慑发挥了作用。

然而在更复杂的冲突中，如果牵扯的国家超过两个，那么结果就更令人忧虑了。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这样的多极冲突，战争爆发是因为一方没能正确地判断其他各方的意图。如今在中东，以色列已经拥有核武器，伊朗也快实现这个目标了，这可能会迫使周边国家也开始研发核武器。这对中东及其周边地区、世界主要的石油供应地甚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军备竞赛和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核战争真的爆发，那么幸存的任何一方都会把资本主义作为这场灾难中无关紧要的部分。然而，也许伊朗能够接受规劝放弃核武器；也许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土耳其不会以获取核武器作为报复手段；也许人类的理智能够战胜多个核武器国家角力带来的危险。不过也有可能出现恐怖分子盗窃核武器的情况。这些恐怖分子追求的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目标，谁能预料到那将会带来什么结果？他们的意识形

态将是最为危险的。

与之相比，第二个系统性危机是具有高度可预测性的，除非采取一些超常的规避措施。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见拙著《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第12章）。空气、海洋和陆地正在变暖并出现幅度更大的气温波动，这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由于任何地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都会影响世界其他所有的地方，因此这个威胁是全球性的。这些排放将伴随着其他灾难性的情景：食品和水资源短缺，极地冰盖和冻土层的融化，还有海平面升高等。无数人已经由于全球变暖而过早死亡，除非人类社会对发展方向做出重大改变，否则一些穷国在20~30年后将难以维系。

如果人类及时行动，大幅减排，就必须对20世纪最成功的三大制度做出重大的挑战和改良。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主义——不过这只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国家社会主义在兴盛期对环境的破坏同样严重。正如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所言，必须把社会从“利润的踏板”上拉下来。这可能需要“指令型和控制型”的国家对商业进行严厉的监管，或者通过对企业的资源运转征税，抑或是通过诸如严格的“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计划，激励资本家转向对良性的低排放产业进行投资。如果能严格执行这样的政策，那么资本主义尽管会受到更多的监管，仍然会存活下来。由于很多产业并不是高排放的，可能不会出现资本家联合反对这类政策的情况。这也许会成为另一种通过低排放产业带来利润和就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有些企业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此，将投资转向替代型燃料、湿地和森林保护以及其他新型环保产业。目前替代型能源技术还没有在全球带来就业机会总量的上升，但如果这些技术成为常规，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哥本哈根共识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替代型技术部门要提升就业机会的总量需要几个条件：快速的技术创新、快速实现规

模经济、类似的绿色政策在全球施行，也许还要加上采取关税或要求本地化这样的保护主义措施。税收政策也能鼓励创造就业。如果取消对商业和劳动的征税，而只对可再生能源的运转总量征税，那么就能鼓励对劳动力的雇佣。下一波的“创造性破坏”可能就是这样出现的，它一定会消灭基于化石燃料的产业。

不但要对资本主义严加控制，还要改变民族国家沉迷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如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国家成功的标准，而这加剧了环境恶化。政治精英们笃信的是，只有在任期中推动短期增长才有可能继续掌权，必须改变他们的这种看法。追求低排放的政权肯定会拉低短期的增长，但或许能够促进长远的增长，毕竟“照常营业”式的不作为，长期下去对这个星球及其居民将会是灾难性的。然而谁又会为长远打算呢？政治人物肯定不会，选民也不会。此外，政治人物和选民还活在民族国家主权的年代里，外国势力对国家主权的任何抑制都会受到强烈抵抗。然而法规必须是国际性的，跨国协定将严重限制民族国家的自主权。

也许环保运动最终能够说服资本家、政治精英和选民们开始认真对待减排问题。也许欧盟会率先打破主权的障碍，毕竟在其他领域里欧盟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但要实现上面所说的，就必须改变“公民消费权”的想法。人们为了不断增加消费，把对持续经济增长的要求当作一种公民权利。普通公民必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才能避免灾难，但是灾难在实际发生前，总是显得那么遥远和飘渺。

现代时期的三大成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公民权利对环境危机负有责任。这些因果链主要是靠经济串起，但也通过政治权力关系产生影响，问题不单单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为了一个相对飘渺的未来，必须要挑战这三大成就，这很困难，可能无法取胜。如果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将会强化资本主义向低增长发展的态势。对现有状况的

限制需要更多的政治监管，尽管是通过国家的集体行动达成国际协定。这将是一种从市场到国家的新型转变，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型的对市场有所监管的跨国集体主义。在今天，上述这些发生的可能性还很小。美国不仅不愿意开始三大斗争，而且连最宽松的“减排计划”也不愿意加入。中国确实接受了“减排计划”，共产党领导人也有能力推行这些计划，但这些都比不上中国大步伐地实现工业化重要，在印度和其他正在成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也是如此。我预计在 21 世纪中叶，在环境问题开始急剧恶化之前人类可能不会实现大规模的减排。

从环境这一边来看，情况相当不妙。或许会出现技术突破，但目前无论太阳能还是风能都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还在试验中的低温核聚变、完全不一样的太阳能电池或者利用熔盐浓缩的太阳能或许最终会带来重大成果，不过“清洁燃煤”可不行，那不过是煤炭产业的烟幕弹。或许全世界的民众在环保运动的鼓动下，能够说服政治人物采取更加环保的政策；或许低排放行业的资本家能成为高排放行业的反对力量；或许企业家和科学家能够联手开创一种以环保技术为基础的“创造性破坏”。只是目前还看不到上述任何一种可能性。当然如果全球资本主义出现持续的危机，全球生产下滑，那么（在经过一段已“成型”的排放继续上升的时期后）排放可能会停止增长甚至开始回落。反过来，如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消费者能够被改变，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减缓将成为全球共识，到那时人人都会对近乎于零的排放感到满意。每片乌云下总还有一丝希望！

但如果行动不及时，环境灾难开始带来恶果，那么乐观的情景是，此时全世界的国家能够开始协同行动，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另一种可能是如果不能协同行动，那么将出现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一些相对优势的国家，如北方的较富裕国家

将以“堡垒式的资本主义”“堡垒式的社会主义”或者“生态法西斯主义”为盾牌来对付世界其他国家；大量难民将面临饥饿；争夺资源的战争将爆发（不过核大国之间可能不会对战）。无论我们的后代把这类政权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什么其他的称谓，其最为标志性的特征将是邪恶。当然我们无法预测人类面对这样一种威胁时将会如何应对。

八 结论：末日或已临近，抑或还很遥远

上述模型列举了一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我相信这已经是最接近于预测未来的理论探讨。我首先希望我的理论说明了现代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并非系统这一点。它们受到多重相互叠加的权力网络的影响，每种权力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因果链。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在它们未来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中，有些情况更加明了。第一点是，美国正在丧失全球霸主的地位——即便是它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无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目标。这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美国霸权的终结已经临近。实际上，如果不能阻止当前的各种弱点在上述四种社会权力来源中串联发展的话，美国的实力将进一步下滑。第二点是，欧盟处于相对受威胁的境地，尽管目前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单一的政治弱点，即没有后援的欧元而更为加剧。对欧洲而言，几乎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结局，而这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第三点是，全球经济的力量将继续从西方向世界其他更成功的地区转移，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将面对更多的政治监管。以上几点都是相当清楚的。

其他的情景就比较晦暗不明了。如果像熊彼特那样把资本主义视为“创造性破坏”，那么可能出现在其他发展中地区进行“创造”，

而在西方面临“破坏”的情况。这种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回归到以前的多极权力网络，只不过这次是全球性的。但经济内部的力量大概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将在全球权力的分配更加均等后放缓，逐渐走向稳定、繁荣但却是低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除了会出现一个占人口 10% 到 20% 的被“排除”的少数阶级外，这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种结局。

然而，这一切都可能被核战争或者持续恶化的环境变化这类全球性的危机所打乱，前者是资本主义之外因果链的产物，后者源自超越资本主义的因果链。这两种情况都可能终结资本主义，甚至人类文明也会因此消亡。到时候昆虫将成为地球的主人。最后，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存在的，而政策决定将至关重要。从原则上讲，人类是可以自由选择更好或更差的前景的——因此归根结底，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有时会理性地行动，尽管这通常是短期的；有时会感情用事，受意识形态支配甚至是丧失理性。这也是我们最终无法预测资本主义以及世界的未来的原因。

第四章 共产主义的真相

格奥吉·杰尔卢吉扬

在一本论资本主义市场可能覆灭的书中讨论共产主义国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在很多人的眼中依然是最有可能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尽管它难免会让人联想起一幅幅烟囱林立、物资短缺、个人崇拜以及清洗迫害的恐怖画面。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理由：共产主义现在仍被视为压迫和低效的典型，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民意普遍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实力敬畏有加，甚至也有许多专家对苏联的制度极为倾心。20 世纪 80 年代，东西方都有不少人陶醉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欣然接受来自莫斯科的人本主义精华。而今天，虽然有许多中国的企业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中国市场的奇迹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大的成功，甚至是未来的希望。这实在让人质疑，共产主义已经覆灭的言论是否已属陈词滥调。

不过，苏联确实是解体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苏联蜕变成由企业寡头统治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或许这为我们讨论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如何解体提供了一些实证基础。确切地说，假定要发生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那么这会是以 1917 年俄国革命的形式

爆发呢，还是会更接近 1989 年苏联的公民运动？这是本书论及苏联的重要原因。本书的前两位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兰德尔·柯林斯在本书中预测了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正是这两位学者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通过不同的理论分析预测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覆灭。

这里我要承认一点：1987 年我在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公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会面时，并没有取得我们使馆中克格勃驻外特工的许可。我在马普托的波拉纳酒店外那棵老的蓝楹花树下等他的场景，活脱脱就是来自于格雷厄姆·格林的间谍小说：在一个被冷战时期“代理战争”^①摧残的非洲国家里，一位年轻的苏联官员偷偷地会见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只有那些尝试过偷读禁书之悦的人，才能完全体会当时我为什么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来满足自己学术上的好奇心。沃勒斯坦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理论，在苏联宣传部门的眼中无疑是歪理邪说。他当时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紧张，于是和蔼地对我说：“你们这代苏联人不必紧张。你们很快就能自由地环游世界了，不过这不一定会让你们过得更快乐。”面对我怀疑的神情，他笑着说：“你凭什么觉得 2017 年 11 月 7 号莫斯科红场上还会举行一场百年纪念的阅兵仪式呢？到那时候你可能连纪念的是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在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俄语就是“荒谬至极”这个词语！

1980 年春天，兰德尔·柯林斯在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俄罗斯研究所发表演讲后，台下观众的反应也大都认为这“荒谬至极”。这位行外的社会学家平静地告诉在座的苏联问题专家们：根据他的数学

① “代理战争”是指用第三者来代替自己打仗的战争，这在冷战时期很普遍，因为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不想与对方直接开战，因而以其他国家或非国家的武装力量来打击对手，但又不会导致战争升级，引发核战争。——译者注

模型，在座专家们的研究对象（苏联）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内将会不复存在。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从越战、经济滞胀和伊朗人质危机中恢复过来。那一年罗纳德·里根竞选美国总统的口号是美国的核军备已经被苏联赶超了，这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大力发展军备才能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魔爪。然而作为美国外交官的后代，兰德尔·柯林斯却在此时鼓吹核裁军和继续推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不过他这个良好的建议并非出自反战的理想，而是源自最早由马克斯·韦伯发展的地缘政治理论^①。

兰德尔·柯林斯运用了韦伯的模型，在他的分析中，在衡量地缘政治势力的五大参数上苏联都得了负分。唯一的关键性未知因素就是苏联衰落的具体形式。与当时普遍观点相反的是，在这个模型中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尚未出现地缘政治衰落的迹象。因此保障美国和全球安全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避免与衰落中的苏联发生核战争。历史上许多过往帝国的例子都表明，在长期冲突逐渐将冲突的各方简化为两大对手及其卫星国后，其中的一方一般都会由于地缘政治上的过度扩张而突然解体。解体的一种可能是，结构上较弱的帝国在分裂分子或者情绪不满的军方策动的内部动乱中土崩瓦解，另一种可能是，像罗马对迦太基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那样，最终被战争吞噬。

公平地来讲，苏联问题的专家们有理由感到愤慨。柯林斯的实例全部来自于上古时期和中世纪的帝国。地缘政治理论对分析波兰、尼

① 这段轶事详见 Randall Collins, "Prediction in Macrosociology: The Cas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6 (May 1995): 1552-93。他最早关于苏联解体的预测发表在 Randall Collins, "Long-Term Social Change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 of States."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1 (1978): 1-34。

加拉瓜和阿富汗局势的最新动向或者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另外，对苏联解体时间的预测也非常含糊，大概在未来几十年的范围里。宏观历史社会学的预测一向很笼统，只能指出结构性转变的方向以及大致的发展步伐，不大可能做出更准确的长期预测。不过苏联问题的专家们连短期的预测都与这相差甚远。

柯林斯和沃勒斯坦当年的预测与后来苏联的发展轨迹相比又如何呢？当前对资本主义未来的讨论，要求我们对作为替代制度的共产主义有明晰的分析，然而，这个话题却完全笼罩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我认为需要以更广的宏观历史角度来审视共产主义的兴衰才能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一 俄国的地缘政治舞台

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是小概率的历史偶发事件。不过这并不比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以及其后社会组织形态的各种变异更加令人意外。这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件奇事，而是说历史上的偶发事件一般都是在原有制约因素瓦解后，以人力实现那些在危机时刻中出现的尚不明朗的结构性契机。创造力、远见、错失机会和领导失败都是人们在结构性契机和制约面前的行为后果。当然，除了那些之后被冠以“远见卓识”的人之外，在普通人看来任何其他的历史选择似乎都不可能实现。而那些有远见的人只不过是在行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并且把这些可能性变为了现实。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起义使俄罗斯失去了最后一丝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俄罗斯更大程度上可能出现的法西斯化。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改变1917年之后的俄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是举足轻重，然而反过来也是如此。共产主义革命最早

能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产生，而不是在意大利、墨西哥，甚至中国产生，这对于后世的影响同样巨大。

要更好地理解俄国这个地缘政治和经济舞台，需要回顾俄罗斯帝国形成阶段的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出现在现代史的开端，大致在公元 1500 ~ 1550 年之间。如果让当代的政治学家投票选出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那么得票最高的肯定是各种新兴的帝国在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这片广袤大地上的强势崛起。这些专家们大概不会提及欧亚大陆西北角一隅发生的新教改革，甚至会忽略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明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全球的制造业巨头和人口大国。公元 1500 年后，莫卧儿帝国征服了四分五裂的印度。与此同时，伊朗的萨菲教团正在崛起，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以武力夺回了东罗马帝国的遗产，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正在逐步建立西方的天主教帝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可怕的中世纪终于过去了。这几个庞大的帝国为新一轮的社会稳定与繁荣带来了保障。作为保障的还有一系列创新，包括更加高效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掌管税收的官僚机构、较为保守的官方宗教信仰以及新型重武器的诞生。

俄罗斯只是这个大环境下一个边远的特例，而这反倒成了一种优势。初出茅庐的沙俄帝国，由于极其遥远的地理距离而没有受到来自西边的日耳曼人和南边的突厥人的威胁。同时火器的运用抵消了游牧民族的骑兵对农耕文明定居点的战术优势。从鞑靼人手里抢来的斯拉夫农户开垦了欧亚大草原的沃土，这大大增加了 16 世纪俄罗斯的人力和岁贡收入。当时俄罗斯的版图扩张之巨只有西班牙可以与之相比。以哥萨克武装为先鋒、正规军事据点为后续，俄罗斯在大草原上的扩张正好与游牧民族进攻的路线相反，以至于他们很快就逼近了中国的边境线。

与同时期拥有火药技术的国家一样，16 世纪的俄罗斯发展成为

帝国，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到了1900年，作为列强之一的俄罗斯依然在扩张。无论是中国、印度、伊朗还是土耳其和西班牙，到1900年时都已无法再续写自己历史上的辉煌。这个大衰退的原因正是那几百年间西方崛起的势力。西班牙重建天主教西罗马帝国的企图遭遇了西欧和北欧那些不起眼的王国、大公国、自治邦和城市联盟的共同抵抗。倘若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成功镇压这些抵抗势力，那么新教改革在史书中恐怕只会作为一次普通的异端一笔带过，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公商贾也会被描述成乱臣贼子。当然，真实的历史进程是，哈布斯堡王朝与由城市商人网络串联起来的新教国家资本主义同盟陷入了相持状态。正是这种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相持，而非新教本身让荷兰和英国这样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生存下来。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不过几十年，彼得大帝就开始在俄罗斯推行专政改革。了不起的彼得沙皇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的船坞里乔装做过木匠学徒，还可能在伦敦会见过艾萨克·牛顿。他笃定要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其中，荷兰就是彼得最早接触到的也是他自始至终最热爱的国家。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荷兰在彼得心目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俄罗斯国旗就是荷兰国旗的翻版，只不过是做了少许改动；而在圣彼得堡（荷兰语的拼法是 Sankt Pietersburg）开凿运河，其原因无外乎彼得执意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首都一定应该像阿姆斯特丹那样有一条运河。

同时期的各国主政者也推行过类似的模仿改革，例如葡萄牙的彭巴侯爵、奥地利的约瑟夫一世以及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然而越是远离西方核心的地区，改革的成功率就越低。就连西班牙最终也丢失了其帝国属地而退居比利牛斯山以南。印度、中国和伊朗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失败了，这几个国家很快被列强控制。有着贵族和自由传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曾一度是欧洲版图最大的国家，最终也被列强瓜

分了。波兰封建贵族（什拉赫塔，szlachta）不可一世的骑兵在新时代的海军、步兵和炮兵面前不堪一击，尽管后者的成本更高。奥斯曼帝国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一个世纪之后，才致力于坦志麦特改革，但为时已晚，最终土耳其落得一个“欧洲病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穆罕默德·阿里是埃及的一个无赖军阀。他在1810~1840年间开始打造自己的海军、军工厂和现代官僚体系，其成就一度接近彼得大帝。而此时的英国绝不愿意看到中东出现地区性霸权以至于影响其规划中通往印度的苏伊士运河，于是发兵击败了这位专制的埃及现代化改革者。

在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在1868年之后凭借明治维新，在当时比拼军事与工业化水平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势力。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和明治时期的日本这对跨越时空的奇怪组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这对迥异的特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在强大的西方列强面前不得不低三下四，这造成了两国意识形态中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深刻的不安全感之间的强烈冲突。这种对自身全球地位的二元理解是改革的动力，但不是必要条件，毕竟除了日本和俄罗斯之外，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困境中的帝国必须要集中财政和制度能力来行动，才能缓解它们对落后与脆弱的危机感。俄罗斯和日本相对较轻的外国贸易渗透和军事压力使它们在大型建设和进行军备竞赛时有了一定的喘息余地。而帝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他们既要向国家交纳更多的税款，又要为国家建设付出劳役，还要参加征兵。然而仅是强制农民还不够，专制的改革者还需要对他们自身所处的精英阶层加以惩处和再教育，然后奖励和激励他们，其手段就是将他们作为军官和官僚通通揽进国家行政机构。

这种发展模式是基于中央集权的强制推行以及源源不断带来的新资源、人口和帝国荣耀的领土扩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认

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宪政和财产权受到保护的私人企业是通往现代化的正途。但是很明显，还有其他方式可以与这些当时的强国竞争。这就是采用强力措施来推行现代化的工业和制度，让国家自身成为一个大企业，从而弥补资本主义资源的缺乏。所以日本和俄罗斯的改革者通过德国模式来效仿西方就不足为奇了。俄国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起就引进了许多闲散的德国贵族人士和手工业者为其发展助力。1917年布尔什维克人夺取的正是这样一个奇特的地缘政治舞台。

二 堡垒式的社会主义

1917年的俄国革命完全不令当时的人意外。俄国贵族长期以来就被反抗奴役的农奴起义梦魇所困扰。自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期待着一场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恐惧与期待又因为产业工人的罢工被哥萨克骑兵镇压而更为加剧。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职业者，对旧贵族官僚的制约和国家的整体落后格外不满。知识分子自认为是时代改革的领导力量。这种高大的使命感转化成他们汹涌的颠覆活动，这种颠覆既包括创作世界级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志愿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并以武力反抗压迫者。

即便如此，沙俄帝国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还创造了相当高的工业增长率。这主要是因为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俄国从没有打过败仗，而战败往往是革命的导火索。像其他许多革命一样，引爆俄国革命的正是1905年和1917年令人道德蒙羞且代价惨重的军事失利。士兵哗变了，警察体系也瓦解了。国家强权的崩溃释放了长久以来被压迫的反抗势力：愤怒的农民在乡下暴动；夺取了武装的工人在大城市

中暴动；知识分子积极地组织各种政党和民族主义运动，后者很快就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独立政权。

布尔什维克在国家秩序崩溃的情况下夺取了国家权力，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几年后他们仍在掌权。这是如何做到的？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只是知识分子中的造反派力量，由于其被取缔和遭到迫害，他们形成了严格的内部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同时对无处不在的警察探子保持高度警惕。这与中国的情形不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是游击队员，他们的势力仅限于大城镇内。这让他们视农民为没有知识的群体，只能被动地走进美好的未来。当然布尔什维克对卡尔·马克思末世论般的未来理论抱着近乎宗教式的信仰。而马克思主义的确有其令人信服的科学的一面。这使布尔什维克在浸染了现代科学和工业成果的同时，具有了一种较为特别的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视野。从一开始，这些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就不抗拒使用他们敌人手中的武器，无论是德国的军事制度、国家推行的工业计划，还是亨利·福特的流水线。

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伊始就建立了自己的秘密警察机构，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契卡”，其成员中不乏原来闹革命的恐怖分子。这保证了新政权对国内政治的垄断。接下来布尔什维克党又组建了自己的红军。在内战和外国军事干预的情况下建立一支部队，这不仅保卫了布尔什维克政权，而且使国家从根本上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帝国。纪律严明且又积极活跃的军中党组织特别具有适应力，既能组织各种后援又能提振士气。布尔什维克政权让崩溃的工业重新运转，向农民征粮，出于知识分子的热忱，还建立了各种博物馆与剧院，并且大兴文化教育和高等院校。

布尔什维克国家建设的一个关键举措，是以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组建苏维埃联邦，这对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因为

与其他民族、种族和宗教力量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布尔什维克党才打赢了局面混乱的内战。在 1919 年的一场关键性战役中，安东·邓尼金将军领导的反革命白军在后方遭遇了车臣穆斯林武装的袭击。这些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造反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圣战的一种形式，于是与布尔什维克党结盟。我们现在或许会觉得车臣人这样做在政治上很幼稚，然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确实衷心地希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能得到发展，尽管如何发展要听命于莫斯科。列宁的民族政策将民族共和国的安排制度化，在那里少数民族的干部可以得到优先提拔，并且能获得大量的资源来发展支持现代少数民族文化的机构，比如上述的各种文化教育，如建立高等院校、博物馆、电影制片厂、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不同的只是这些机构是专门为非俄罗斯的民族建立的。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的胜利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在动乱中重新建立国家秩序，尽管后者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场内战的经验是，建立广泛的组织结构，并对千千万万受到革命影响的群众的精神力量进行引导和利用。得益于新兴苏维埃制度提供的技术教育和升迁机会，一大批青年男女的人生机遇大为改善。社会流动性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城镇化开始后更是迅速提高。尽管有严酷的供给制、政治暴力和非人性化的工作量，但工业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培养出了大量爱国的苏维埃公民，庞大的国家机器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旧社群、旧教区和旧式封建家族的解体让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走进了更广阔的现代社会。这与彼得大帝（苏联的小说和电影对他都极为推崇）在 18 世纪推行的西化有类似的效果，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彼得的专制之所以在当时得以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大幅增加了贵族头衔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让新兴的精英群体有足够的机会参政，在意识形态上取得自信并享受西化

的生活方式。在苏联时期，无论是俄罗斯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农民子弟都可以学习操作现代化的机器，搬进国家建设的有自来水和电力供应的公寓，拿到新式的苏制手表和收音机，在单位食堂里享用机械化生产的热狗、煮黄豆、千岛沙拉酱和冰淇淋（原本是从美国进口的冰淇淋很快就成了俄国的土特产）。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造成了经济过热与各种物资的短缺，其中也包括熟练工种的短缺。苏联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型的工厂，因此也不得不像一个巨大的工业城市一样运作，国家作为唯一的雇主，向全民提供了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社会福利。

领导这场变迁的是党的干部，任用干部时都会参考一份称为 *nomenklatura* 的职务名称表。*Nomenklatura*（也可译作“官职表”或“特权名单制度”）后来成了僵化官僚的代名词。不过第一代的干部多是饱经战火洗礼的青年党委委员以及充满革命魅力和乐观进取精神的危机处理者。他们坚信，是非凡的历史机遇和列宁的天才将他们锻造成了人类进步的先锋队。哪怕是因为选举失利暂时地失去政治权力都是对历史前进的背叛。对很多论者和历史学家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造成的惨剧和革命者的启蒙热情很难在道德层面上调和。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共产主义的这两面的确同时存在。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其实是意识形态造成的错觉。俄国革命让一小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统治了一个主要由农民构成的大国。这些改天换地的革命家们全心全意地信仰科学和全人类的进步，但刚结束的内战又让他们学会了要依靠获胜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握紧手中的毛瑟手枪。简而言之，俄国的革命者们在斗争中成长为具有超凡魅力的官僚阶级。他们笃信积极的发展，并将 20 世纪的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打造成单一的专政结构。这一专政结构的顶点是高高在上的领袖。

斯大林的人格扭曲恐怕和他令人惊叹的人生轨迹一样曲折，就好像一个地下摩门教徒摇身一变成了宗教大法官，最后又当上了文艺复

兴的教皇。然而个性并不能解释其他地方的个人崇拜，比如古巴、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这些地方斯大林并不是主要原因。又比如戈尔巴乔夫在 1985 ~ 1989 年间的开放政策 (glasnost)，这让近 2/3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党政要员丢了饭碗，有些人甚至为之丧命。在这些官僚体系的牺牲品看来，莫斯科中央推行的民主化无异于一场灾难性的大清洗。我们会看到，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苏联的党政要员们为什么会采取防卫和极具破坏性的反应措施，并最终在 1989 年后毁掉了国家机器。共产党的领袖和反派人物都常常会发起政治迫害运动，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更为缓和的控制手段。对非官方组织和信息的压制使最高领袖完全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于是必然会怀疑其指令没有得到全面贯彻。

列宁主义政权这可憎的一面和俄国、中国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没有直接关系。卡尔·马克思若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大为惊骇，估计列宁也会如此。这个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共产主义国家（也可以算上第三世界那些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一开始的地缘政治地位。这些革命国家是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诞生的。超常的全国性动员需要超凡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指挥能力，这也让伟大领袖得以获得最高地位。他们的天才智慧在一次次几乎不可能取得的胜利中得到了验证。

夺取单一国家政权的革命随即就会转化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哪怕俄国这样的大国也是如此。因此现代革命胜利之后都会接着发生外部战争。革命会激起与别国的武装对抗，对手可能是想维持保守现状的国家，也可能是像第三帝国那样想通过征服和灭绝性战争来重塑世界的国家。20 世纪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是左派力量的一大成就。但是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经历的残酷战争，使这一政权从建立伊始就带有压迫性，其制度也有缺陷。20 世纪的革命

者要保卫并且巩固他们反体制斗争的成果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供选择。如果抑制军国主义需要一个理性的理由，这就是理由了。

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极权主义？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归纳对解释真实状况毫无裨益。当时的情况很简单：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超常的工业化发展取得了强大的军事—地缘政治地位。对俄罗斯帝国在世界半边缘地区强大地缘政治实力的继承，使这个国家得以生存下来。同样是对原有结构的继承，使苏联采取了以国家主导的方式强行迫使农民阶级实现工业化，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建设一支先进的武装力量中。

苏联是典型的现代国家，其精神也是现代化的。它成功地运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技术：机械化武装、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规划建设的大型城镇、大规模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以及包括体育和娱乐在内的标准化的大众消费。在 20 世纪 20 年代那个未来主义的十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又捡起了从帝国时代知识分子那里继承的古典音乐、芭蕾和文学，将其打造成新的大众文化。斯大林式的政权在很多方面显现出帝国的气质。不过苏联三代领导人都能够坚持整合少数民族的政策，这确实是进步的，也具有现代特征。苏联是最早实施“平权”的国家，并且通过发展和广泛的吸纳证明了这一政策的真心诚意。

当时的观察家们无论敌友都倾向于认为：通过计划经济和废除私有财产所取得的成果就是社会主义了。一大批民族主义者和寻求发展的政权都对苏联的一些重要体制进行了模仿或者改造，毕竟这种集中国家权力的模式，在 20 世纪的历史中是极为成功的。这其中有不少昔日的旧帝国，那里的人民希望一雪前耻、改写历史并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例如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南斯拉夫、越南，还有民族主义的土耳其政权以及后来发展出独特的反体制伊斯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伊朗。除此之外，还有国土虽小但坚韧不屈的古巴和处在冷战另

一大阵营中极为独特的以色列，它们都在民族主义式的反抗中运用了“堡垒式社会主义”的体制。

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敌对的地缘政治环境。在最初的革命浪漫主义消退之后，世界体系中结构性的状况就迫使人们做出明确的政策选择：是追求自发性还是纪律至上，是理想主义还是强制执行，是鼓励群众还是强征农民，是冒着被孤立的危险追求纯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立不那么牢固的国际同盟。共产主义要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有效的策略只能是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不管在意识形态上如何鼓噪，共产主义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事实上，冲突无论是在小团体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社会网络中最强烈的联系方式之一。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一直都是莫斯科的参照物，也是其心腹大患。1945 年以前是德国，之后是美国作为主要的军事威胁决定了苏联工业和科技的发展重心。但西方同时也是苏联通过出口原材料换取先进设备和高档产品的主要来源。以前对何种制度会取代共产主义曾有过无止境的争论，这个争论最终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打破，那就是任何一个苏联式共产主义国家，无论通过哪种形式，最终都要回归资本主义。

三 发展成果的年代

这把我们带回了兰德尔·柯林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预测。他们对共产主义终结的看法来自于大相径庭的理论和对不同历史过程的分析：在柯林斯那里是地缘政治的过度扩张，而在沃勒斯坦那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避免的结构因素。但很有意思的是，二者的预测可以相互印证。柯林斯看到了苏联过度扩张的困境会造成两种结局：要么是帝国的解体，要么是一场最后的大战。沃勒斯坦则在一

个围绕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正在形成的泛欧洲经济军事体中发现了第三种可能。这与夏尔·戴高乐长久以来的抱负和 20 世纪 70 年代西德的“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乐观精神相当一致。沃勒斯坦没有实现的这个预测在分析上让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反事实，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顺便要说的是，这个反事实预示着欧盟和重建后的俄罗斯在近期是有一定结构性理由来建立军事和经济同盟的。柯林斯和沃勒斯坦早先的预测只是粗略的抽象归纳，其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补充，比如社会力量的变迁、具体的机制以及最终造成那些已实现或未实现的历史结局的一系列事件。

1914～1945 年间欧洲重大的地缘政治动荡消灭了俄国当时的大部分对手。兰德尔·柯林斯通过把这段时期的互动扩展到未来得出了他的预测结果。1945 年后，全球的地缘政治形态由复杂的多极局势迅速简化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这使苏联成了超级大国，但是这也给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和责任。兰德尔·柯林斯早在 1980 年就指出，在与美国的持续对抗中，苏联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此时控制盟国和对抗外敌的成本已经高到其无法承担。

这个模型的一个重要推论是预测了中国潜在的经济繁荣。当时很少有人把这个由超凡领袖毛主席统领的亚洲穷国放在眼里。然而超级大国竞争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幸运地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个奇特的东亚共产主义国家发现，其面对的地缘政治成本比苏联要小得多，尽管国际环境对其还有一定制约性，但相对是稳定的。中国的领导人正如 1945 年后日本的当权者那样，选择了该地区当时最显见的发展策略来实现国家的权力与辉煌，这个发展策略就是，依靠美国的消费市场，以出口为导向来推进国家的工业化。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长期以来把共产主义国家比作在罢工中被工

会占领的工厂^①（这点比较有争议性）。工人要让工厂运转起来就不得不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的法则，他们也许会得到更多物质奖励，但是得不到平等与民主。更具“现实头脑”的工人运动组织者，会以外部市场压力为充分理由重新引入严格的生产纪律。复杂组织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预见到人数不多的管理决策层最终会脱离广大群众演变成新的统治精英。意识形态上的执著信念完全消散需要时间，不过原来的组织者总有一天会发觉，已经没有继续伪装的必要。于是工厂转回常规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运作，管理者则利用职务发财。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的社会学版本，但沃勒斯坦的分析对结构性条件和一系列因果发展做了条理清晰的阐释。他同时加上了一条重要的政治预警：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一个不再以资本积累为最高追求的历史系统取代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工厂的社会主义也将很难维持下去。

沃勒斯坦对工会控制的工厂回归资本主义的比喻，是基于现实中可考的情况。苏联领导人早在 1953 年就尝试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地位为代价推动与西方经济的一体化。斯大林尸骨未寒，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就下令第一次大规模释放劳改营（即“古拉格”）中的犯人，并向西方暗示莫斯科有意从东德撤军。这一短暂的插曲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可能性。贝利亚既是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分子，也是无比务实的经济管理者。假设他的计划得逞，共产主义恐怕早就终结了。苏联的工业和受过教育的工人此时才刚刚进入全盛期，而贝利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多部著作和论文中讨论过世界体系视角下的苏联。详见他 1973 年具有纲领性的论文“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m”。该论文收录于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71-105。另见 1991 年春天（也就是苏联解体以前）他与 Giovanni Arrighi 和 Terence Hopkins 合著的“1989, The Continuation of 1968.” *REVIEW* 15.2, (1992) 221-42。

亚很可能会以个人独裁者的形式，有选择地让他的亲信瓜分国家的资本主义利润。这可能会比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市场的恢复更具效力。想象一下当今西方的消费者驾驶着时髦的苏制“伏尔加”轿车，佩戴着“东方牌”手表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在1953年，两德统一对西方盟军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而欧洲还有大量的熟练工人希望经济能从几十年的战争与萧条中恢复过来。

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贝利亚被政治局中的对手下令逮捕并被处决。这是党政要员和军队高官因为害怕被秘密警察控制而进行的反扑。1956年苏联的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痛陈了斯大林的罪行，他的乐观主义让他也犯了轻率鲁莽的错误，结果他在1964年就被赶下了台。起因是他想削弱工业部委中堡垒般强势的干部官僚。这些庞大的垂直整合的部委在苏联的作用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公司企业。高级干部们当然也希望一定程度上的去斯大林化，但一旦实现了终身职务以及适应了高福利和轻松的工作节奏，他们就想维持这种官僚的乐园而不愿意继续变革。于是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大发展时期造就的经济部委及其触角庞杂的指令机构几乎是毫无改变地被永久保留下来。其中一部分甚至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还继续发挥着作用，这使共产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也带有了明显的寡头特征，例如惊人的财富集中和腐败的黑幕政治。

官僚自身的公司化问题在斯大林死后就越加严重了。指令经济必须依赖最高领导对资源调配作出决策，否则中央政府就会在各大有权势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游说下仅靠官僚惯性运作。以前对计划和市场孰优孰劣的经济争论是基于一个一直以来错误的假设，即这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是互为排斥的。计划经济，或曰指令经济，在战时、灾后重建或是跨越式的工业化发展中可以更有效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奇迹。然而这种指令模式并不适于更长远和更常规的发展

阶段，后一阶段需要的是更多元化和更灵活的应对政策。但是又有谁敢于废除这些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辉煌成果但早已僵化无用的部委呢？更不要说这些部委的领导还都是有投票权的苏共中央委员。这也正是1964年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推翻的原因。正如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当权者不能容忍国有资产和国家监管的存在，苏联的管理者和党内的理论家们也不能容忍赞同市场的理论。当然工业部委和行政部门领导的强势除了维持正统外还有更深层的理由。其中主要的考虑就是担心一旦允许自由争论和竞争，那些受过更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就会超越老干部，并取而代之。

苏联共产主义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早已僵化的上层党政官僚与新兴的中层业务骨干和充满创造力的知识分子间的矛盾。这些浪漫的“60后”一代年轻干部来自国家计划经济部门、高等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中下层。他们实实在在是苏联现代化的产物。这些青年业务骨干原来的意识形态是1956~1968年期间在世界各地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左派”运动的一个旁支。直到很久之后，年轻一代的反官僚诉求才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危机中以十分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一种是新自由主义追求的个性化人生哲学；另一种则是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正面认同。因此苏联官方本身反体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鼓励了年轻的叛逆者接纳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两极化的逻辑则让他们选择了其中最极端的意识形态。

这个过程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显著。正统意识形态要求文艺遵循“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路线，那他们就来点儿荒诞喜剧和精神至上的神秘主义；党政干部要求歌颂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他们就偏要搞些民族情绪出来；文化部把音乐和艺术限定在古典范畴里，可他们非要玩一玩抽象主义、爵士乐和摇滚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日渐老迈的专制政权一旦停止独裁，就成了年轻一代嘲讽和挑衅的绝好对象。

在斯大林大清洗后期进入政权的这一代苏联官僚思想僵化、做事顺从，他们完全不像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干部那样还有打破旧习的热情。

后期的苏联政权不但难以控制知识分子，而且无法管理工人。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上的。在出于自身安全整肃了秘密警察后，苏联的党政要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再次动用大规模镇压的手段。苏联的管理者需要工人来完成计划任务，而工人则可以有效地进行讨价还价，即使不成功，也可以到享受特供的莫斯科去碰碰运气，或者干脆去西伯利亚的工厂拿更高的工资。

然而，苏联工人能获得更大话语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迁。俄国中部农村的劳动力几乎已经枯竭。这让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同时，城镇化、工厂就业和教育让工人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苏联的生育率就跌入了谷底。工人的短缺在俄罗斯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沙皇乃至斯大林在招工和征兵时，都有源源不断的人口作保证。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人口基础就枯竭了。苏联文明的一大成就是将农民转化成了工人。这也打破了俄罗斯几百年来以农民支撑精英阶级并在军事上与西方展开竞争的传统。相对的人口短缺使传统的专制制度无法延续下去。

苏联工业化社会的成形和新的人口动态，为改变苏联彻底过时的军事化工业结构提供了两个结构性先决条件。然而崛起中的民主化力量要推翻专制的党政领导尚需第三个明确的政治条件，即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要与刚刚取得话语权的工人结成联盟。实际上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波兰汹涌的民间运动中，这种广泛的政治联盟就已经发挥了作用。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权面对左翼的群众反抗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它们已经主动放弃了或者是丢失了以大规模镇压来抗衡社会运动挑战的强力手段与资源。然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预测相反的是，在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中，阶级冲突并不是二元的，而是在苏联企业式的管理者、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这三方之间展开。因此党政阶层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收买工人阶级来削弱知识分子的力量。

勃列日涅夫时代对苏联工人的政治收买运用了两个代价高昂的手段，即个人消费的增加和对低效率劳动的容忍。党政阶层实质上是邀请工人阶级与其一起享用物质成果，同时却降低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偶尔也会再批判一下异见分子“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提价的意外所得将这个保守的福利契约从容地维系了 20 多年。其真实成本难以用实物来估算。酗酒、男性死亡率和工作单位里的小偷小摸大幅增加，而苏联产品的质量则越来越差，这些都是经济活力丧失和犬儒主义横行造成的后果。正是这种禁锢年轻人的社会固化和对问题的回避，使勃列日涅夫时代被后人鄙视为“停滞的几十年”。

四 解体为何不可避免？

令人翘首的年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活力十足，他属于在人造卫星和去斯大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这些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成就验证了他的同龄人对苏联体制的无比信心。戈尔巴乔夫甚至可以算作是 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重新崛起的一部分，而他也强烈地认为改革后的苏联和欧洲将有足够的理由和实力一起来抗衡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被边缘化的美国，其经济表现并不算差。鉴于欧洲的强势，华盛顿有理由以政治手段推动内需并与拉美和中国建立贸易区。这样的世界肯定还会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只不过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和类型会不大一样。

如果当时的世界选择了这一路径，那么戈尔巴乔夫将成为政治上的“斯芬克思”，用晦涩的信息巧妙地化解了各个地方的矛盾。他或许将因为“摸着石头一步一步过河”，把国家带向资本主义的繁荣彼岸而被赞誉为极富远见的务实主义者。这个过河的比喻当然是来自于中国的邓小平。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89年末甚至更近的一段时间里，戈尔巴乔夫都因为推动“民主”并大胆地实现欧洲统一而被广为称颂。中苏在结束苏联式共产主义时的不同点，不仅仅在于领导人及其政治风格的差异，而且还有许多结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大都是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或是偶发的因素，与苏联式共产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关联。

早在1921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援引过以前的革命经验，谨慎地指出他们的新经济政策（NEP）是革命进程中一个必要的阶段。换言之作为暂时的退却，最好是在阶级敌人之前先进行改变。类似的知名例子还有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和20世纪60年代亚诺什·卡达尔治下的匈牙利，这两国都把各种市场化试验和有针对的政治运动结合了起来。就连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也是如此。这段平淡无奇后来被人怀念为“好日子”的时期，实际上是对狂暴的“赫鲁晓夫解冻期”的保守回应。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领导人也不再谈什么“市场社会主义”了，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收入足以让他们短暂地享受毫无风险的官僚惯性。

当然，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没有石油可供出口。中国共产党转而利用大量勤劳的农民和城镇手工业者以及海外华侨的市场经验来推进他们的“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进入中国农村和出口型特区最直接的政治出发点非常简明，那就是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从而化解矛盾。实际上中国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发展型东亚国家和地区之前在冷战中美国霸权庇护下实行的模式。

中国幸运地走出了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危机，这让我们能准确地找出苏联最终陷入灾难的原因。总的来说，要归结为苏联党政要员重大的集体失误。1989年一系列政治雪崩造成了苏联干部的恐慌和大批党员的脱党。推翻这个国家政权的既不是少数民族共和国里那些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居住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那些民主派知识分子，而正是这些苏联干部本身。反体制的力量尽管咄咄逼人，但还没有组织起足够的力量来靠自身推翻共产主义。在1989年以及1991年，这些力量都缺乏真正的组织基础，无法快速地进行动员并接手正在崩溃之中的政权。

令人吃惊的是，苏联的党政要员在这个危急时刻没有利用任何有效的网络来协调自卫。在1985~1989年的改革年代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狡猾地利用其总书记的大权使自己免于官僚反弹的影响，并避免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结局。戈尔巴乔夫公开的（即通过“开放政策”）和在党内私下进行的政治运作都相当老练，他让苏联政权的三大制度支柱，即共产党、中央各部委和秘密警察都困惑不解而无法应对。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不可避免地牺牲了东欧共产主义卫星国时，处于困境中的苏联党政要员才猛然意识到，在这个没有把握的赌局中真正的赌注是如此巨大。1989年后，苏联的寡头精英完全是按照工业部委的官僚势力范围和少数民族共和国的界线碎片化了。在富有传奇色彩的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共产党的党内和党外头一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但这些派系，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十分短命。迅速到来的动乱让它们没有时间应对。党政官僚阶层剩下来的只有他们最熟悉的东西，那就是腐败和相互勾结的个人关系网。当时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混乱，但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

苏联的党政要员是官僚行政体系中的最高层。因此他们有着明确的等级之分，在原则上是可以被免职的。正如其他大型官僚管理体系

那样，生存的法则向来是通过寻找政治靠山来扩大内线关系网，积累游说的实力并且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1989年后这些生存策略被机会主义地运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党政阶层有三个交叉的等级体系：地方政府（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管理各个经济部门的部委以及党中央控制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审判”的部门。这三者中要属中央的控制部门势力最大，也最难私有化。毕竟没有国家，秘密警察就成了黑社会，而脱离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审判”就无异于是邪教。相比之下，苏联的地区和经济单位则有极大的自我强化和分离主义倾向。想想现在有谁能推翻民族共和国终身制的总统，又有谁能把将财产转移到海外避税天堂的私人资产阶级寡头绳之以法呢？

在立法进行私有化之前，苏联的工业资产就已经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被私人据为己有了（实际上就是窃取的含蓄说法）。同时各个民族共和国和市政厅也成了美国人称为“政治机器”的财团资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新手段正是自由化的知识分子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建议提出的。各种新生的“公民社会”（现实中通常限于各个共和国首都里的知识分子网络）都致力于将自己的共和国打造成可以单独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由民主国家，它们比戈尔巴乔夫还要超前。这种从新左派和共产主义改革到撒切尔主义的快速意识形态转变表现为任何革命中的诉求都会被极端化。1989年后的知识分子有三大要求：自由选举、民族主权和市场。这三大要求都是针对执政的官僚体系提出来的，人们认为通过实现这些诉求就可以奇迹般地把民间力量解放出来。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执政者在目睹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后，也意识到，只有先发制人地宣示主权，才能确保他们不被戈尔巴乔夫以“干部年轻化”为由免职（或者说是清洗掉）。提前选举也让党政阶层的候选人能够战胜那些更有名望但却抱着乌托邦理想的知识分子。其后的市场私有化进程则让新老总统们通过照顾自己

的亲信和随从而大发横财。

前官僚阶层大规模地退党并迅速转化为资本家和民族主义者，这让国家和经济结构陷入混乱。民族战争随着苏联解体在南部边疆地区急速升温。即使在苏联的心脏地带，公共秩序的崩溃也使党政阶层一些人的生命安全都失去了保障，很多人不得不与黑社会暴力分子勾结。这种结果完全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本意。他的目标是运用超级大国的实力换取整体进入西欧资本主义网络的优厚条件。但是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很快就丧失了强大的军事和国际声望、先进的科技和公共秩序。苏联解体后各国的快速衰落使可控的工业发展无法进行。

苏联建立的是一个单一组织的工业化社会，其中各种公共事务都是被统一管理的。国家的完整性一旦被破坏，所有现代制度都无法运转，也无法在家庭和亲朋网络之上组织集体行动。这种状况会自我延续。对个人而言，最合理、回报最大的行为就是强占国家资产，并在几次侥幸成功后把资产转移到国外。统治者在国家衰败中难辞其咎，因为腐败的官员和毫无作用的司法体系是侵吞国家资产和发展恩庇网络^①的必要条件。传统上通常以军事实力和处理内乱的能力来考量一个国家的实力，这在以美国霸权和全球金融体系主宰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已经毫无意义。所有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如今都宣称自己是市场民主，尽管各种“民族特色”给当权者们粗鄙的专制提供了蹩脚的理由。

私有化对原来鼓噪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的名望、公职、专业和人脉无不植根于国家的机构中。自由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社会批评家在经济上失利、政治上失意、意识形态上

① 恩庇网络指权力结构中上下级之间形成的“恩主庇护—扈从效忠”的关系。——译者注

失语，因为他们的自由化和民族主义的纲领被毫无信仰的人劫持了。更重要的是，精英的权力策略从国有的工业生产和军事建设转为私人保安、商品出口和金融投机，这更加剧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寡头与其他公民隔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工人都失去了作为劳动力和爱国对象的集体杠杆作用。在破产的工厂组织罢工、打着早就失去号召力的民族独立旗号上街游行，或是为那些最终都要成为叛徒的政治人物摇旗呐喊，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改革时期的公共话语权和乐观期许的气氛突然间被冷漠的犬儒主义、对经济困难和犯罪的关注以及不顾一切想要移民的想法所取代。苏联解体之后的现实更接近中东的残酷现状，而不是西欧的乐土。

五 预测与此不同的历史路径

兰德尔·柯林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总体上正确地察觉到了苏联式共产主义即将消亡这一结构性趋势。柯林斯着重点出了苏联在扩张巅峰时期显示出的其地缘政治局限。他也正确地预测了解体的方式，即民族共和国和卫星国中不顺从的精英阶层为应对帝国中心的政治混乱而大规模脱离共产党，从而引发突然的解体。但是兰德尔·柯林斯的模型无法预测莫斯科面对超级大国困境时的行为方向和速度。

沃勒斯坦在他的分析中进一步指出了可选的方案。他认为苏联改革最好的结局是在泛欧洲大陆联盟的基础上商讨回归资本主义。在冷战的气氛下，包括苏联的改革者在内，没有什么人真正认真地估算过这种可能性。但是沃勒斯坦低估了苏联的工业部委和民族联邦主义带来的复杂的制度性包袱。碎片化的后继国家确实都回归了资本主义，尽管是以一种较弱的外围的形式。而苏联的党政阶层并没有理性地运用超级大国的优势以更体面的方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为了

在戈尔巴乔夫的清洗与可能发生的民众暴动中保护自身的寡头地位，而在一股脑的恐慌中挥霍并蚕食了苏联的资产。沃勒斯坦的理论从根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把握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宏观脉络，而同样也是这个宏观脉络使他没能预料到苏联的精英们这令人尴尬的政治失误，他们完全没能在最佳的历史机遇面前合力行动起来。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极为残酷的教训：寡头精英，特别是在制度解体和被意识形态冲昏头脑时，很容易会把自己的过渡搞砸了。

与当时主流的左翼和右翼思潮以意识形态的准绳来衡量苏联的做法不同，柯林斯和沃勒斯坦的分析是系统的和相关联的，得出的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换言之，他们把苏联阵营视为世界更大的一部分。柯林斯的预测基于军事地缘政治的长期规律；沃勒斯坦则聚焦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的不同维度以及不同地区的精英可选择的政治方案。这些是不同的但在分析中却能相互啮合的维度。

俄中两国的历史显然极大地影响了两国共产主义的不同特色和迥异结局。经济史学家对历史上中国在缔造接近于现代水平的制造业和商业中所扮演的先驱角色已有累述。而中华帝国没能在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的原因，即帝国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持内部“和谐”并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西方自罗马衰败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帝国，于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不得不首先结成城邦，之后再形成民族国家以求自保。中国在19世纪末叶开始落后了，然而这一系列灾难性的落后损害的只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企业家要同时面对国家的内乱以及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进犯。在又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大动乱后，共产党的部队才在中国取胜。毛泽东试图发起一场苏联式的工业化，结果却事与愿违地造成了大饥荒和其后十年的动荡。由此带来的浩劫让中国没能按之前设定的计划打造出现代化的工业和实现城镇化。

在兰德尔·柯林斯的地缘政治理论中，这是因祸得福。中国在世界和地区势力的平衡中都受到了遏制，但这同时也使中国远离了冷战的战线，从而有可能与西方进行经济接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早有通过草根阶层和主要是扎根于乡村经济的企业家精神来恢复内部“和谐”的传统。中国转向市场的举措也约束了地方党政干部，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让自己受益，同时让忠心耿耿和表现良好的手下同样受益。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消亡。毛泽东身后的中国领导人结合了东亚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型国家所需的结构性条件，并在更大的尺度上复制了这种模式。这也印证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一直以来的预测：共产主义国家将作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劳力之间务实的协调者重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六 资本主义及其在 21 世纪将面临的挑战

军事地缘政治在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分析中屡屡出现，因为这是决定 20 世纪革命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不是源自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也不是植根于俄国或中国的本土传统，而是起源于特定的左派思潮，即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国家战败之时发现了夺取政权并通过军事升级捍卫其全球地缘政治地位的机会。布尔什维克党有意地遵循了法国雅各宾派的先例，并展示出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能激发和动员广大群众推翻旧政权，击退外敌入侵并在更广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强大的新政权。

苏联通过直接援助或者是凭借其在 20 世纪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帮助了一大批由激进的本土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起义，并取得了成功。尽管这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成为了共产党人，但他们都或多或少采用过布尔什维克党所开创的策略。一些国家只没收了外国资产和诸如

大地主、大买办这种特别“蒙昧”或者不爱国的阶层的财产，这个过程和结果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余波在那些被西方资本主义欺凌并沦为附属国的老农业帝国中引起的震荡最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从最早的1918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到印度史诗般争取独立的过程，再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在伊朗革命中，类似1968年的后现代学生运动点燃了城市贫民和商人反抗伊朗君主世俗专政的斗争。而这场近代式的革命造就了一个本质上现代的革命政权，它更近似于苏维埃式的政权而不是中古时期的哈里发政权。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苏联的政权一样，奇特的伊斯兰共和国也是在爱国的伊朗人民抵抗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入侵中得到了巩固。这场战争无疑是外国反革命同盟操纵的“代理战争”。

尽管在2001年后这种背景中又掺杂了一些逊尼派的圣战分子，但在反体制挑战的大背景下这不过是美国错误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带来的余震。基地组织旨在通过发动“洗刷道德”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抗外敌运动来制造全球地缘政治对抗。这种策略并非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实践，而是大致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这些人才是自杀性爆炸的始作俑者。比当时俄国恐怖主义分子更惨的是，圣战主义分子并没能政治上掀起群众反抗运动。

而在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主义政党要面对西方社会中难以抵挡的财富以及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温和策略的成熟的议会制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共产主义政党被法西斯党残酷地限制住了，后者作为一种新的反革命力量动员了困境中的国家精英以及“普通愤怒群众”盲目的爱国情绪。对这种反体制运动的法西斯变种需要认真对待，因为在重大危机时刻它还有重新抬头的可能。1945年后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

同为集权主义的邪恶双胞胎。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业化运动、经济计划和国家控制技术的融合，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而这些技术在 20 世纪的广泛应用超出了许多人的估计。用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的话来说，大规模战争和经济萧条的时代迫使各国政府学会了统治的技术。这一趋势包括比较温和的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政权和英美的自由民主政权，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经济计划、大众消费和警察监控的新技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公共建筑和通常具有雄性风格的图案设计。

实质性国家暴力和象征性国家暴力的规模尽管在个人层面看十分突出，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地缘政治地位的差异以及内部改革挑战的强度。英美民主下的统治阶级不像欧洲大陆的统治阶级那样面临如此大的威胁，因此不太会纵容可憎的种族主义暴力分子在街头对左翼革命者大打出手，也不太会寻求对外征服来获取“生存空间”。希特勒的超级军国主义欲以血腥而不是革命终结资本主义，在抗衡这个威胁时，英美的自由派欣然地和共产主义势力结盟。20 世纪一个重大的但又完全可以谅解的反讽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依靠苏联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实现的军事工业化才得以生存下来的。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 19 世纪相互竞争的两大政治思潮，这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后激进升级的结果。两方都积极地争夺相互重叠的来自新兴社会底层的支持者，比如普通职员、下级军官、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这两大运动都为追随者提供了巨大的个人声望、话语权以及前所未有的在党内、国家官僚和军队中晋升的机会。它们都打破了旧贵族政权的禁忌，只要被视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就有机会得到晋升。

对正义和普通人政治权利的现代理想，在理论和实践中竟会有两种相互敌对的表达方式，这让人十分忧虑。视社会平等和人类团结为

正义的一方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启蒙运动最初的理想，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经久不衰的吸引力。但是在政治层面，这个纲领从来都很难维系，因为它跨越了地位、地域、宗教、种族和性别形成的社会鸿沟。不那么普适的正义原则，也就是让某个群体享受特权，通常表现为民族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是特定环境下的组合。尽管与这种思潮对应的学术传统要粗鄙得多，但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却往往更有效力。两百年来的民族主义带来了多少积极的或是极度恶性的政治动员，可时至今日它还是最有效的政治纲领。

共产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它们是在 20 世纪早期的帝国主义工业化战争中形成的道德上的死敌和意识形态上的两个极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可能以我们熟悉的面部重新抬头，因为幸运的是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其他重大的危机也不会引发来自政治光谱两极的强烈反应。实际上，当传统的政治机制失去凝聚力后，这种敌对反应出现的可能性会更大。然而如果本书中的两位合著者对未来的预测能像他们以前的预测一样准确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做出一些预测。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主要在世界经济而不是在地缘政治中展开。其结果看起来更像是囊括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在内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国家联盟之间的世界大战。此外，这个斗争将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这里的民主政治制度比较稳固，也有长期的社会运动传统。受到威胁的将是公众对私营企业的控制，而不是对国家军队或是对准军事的意识形态组织的控制。由于全球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宗教或者民族的印记，丑恶的排外反应还会十分突出。极端民族主义可能会试图将现代国家的权力导向类似于先前极权主义的高压政治和极端的警务，并把它提到一个新的技术层面上。

这里有很大的危险。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会看到以自由左派普适正义的纲领为基础动员起来的政治同盟，这一理念至少在启蒙运动时代以来就在现代世界中越来越流行，资产阶级和社会运动在 1945 年后都吸取了教训，它们共同作用使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内战更难打响。如果战争可以避免，那么在 21 世纪我们同样有可能避免暴力革命以及极左派或极右派的专政。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 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预测资本主义终结时就不那么有用了，应当参考的是 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群众动员和 1989 年正处于高峰时期的苏联改革。在这两个例子中，执政精英的反应不是实行彻底的暴力，而更多的是情绪的恐慌。可惜的是反抗运动并没能利用统治阶级的大混乱，所以结果难以令人满意。大胆并且负责任地对未来进行展望，我们认为，在考虑政治和经济纲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在面对重大危机时，冲突各方是有可能为了降低过渡期的不确定性而形成同盟或者相互权衡的。这大概就是共产主义留给我们的最有用的一条经验教训。

第五章 资本主义面临怎样的威胁？

克雷格·卡尔霍恩

资本主义似乎是熬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与经济危机。尽管这次危机的谷底不如大萧条惨烈，但它给富庶国家带来的经济衰退或者零增长却比大萧条更为长久。更严重的是，当前的危机是在片面的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的蚕食和越演越烈的贫富差距不断侵害我们这个时代之时袭来的。这使问题更加棘手，解决起来也越发无力，同时还压缩了在经济震荡中保护普通人的缓冲空间。投资人还在赚钱，政府也没有垮台，可是未来看上去却并不太平。

不过，这种资本主义崩溃论反映的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老牌核心国家的看法。在亚非拉的许多地区，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当前的危机展现了长期以来处于欧洲和北美核心经济体的经济动力正在向新兴的发展中地区转移，危机同时也加速了这种转移。决定资本主义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种势头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资本主义正在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移，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它会重新焕发活力。然而快速成长的经济体同样面临诸多挑战。老牌“核心”经济体要重新取得资本主义式的增长有赖于其自身的变迁，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与政治权力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变迁。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不仅容易受

到市场震荡、过度风险承担以及银行管理不善的影响，而且还会因为战争、环境恶化、气候变化以及社会凝聚力或者福利方面出现的危机而受到牵连。

要清楚地分析资本主义将如何面对衰落、重新增长或者发生变迁，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不是一个自我完备的系统。或许我们能从更复杂的历史条件中抽象地归纳出一个理论上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但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总是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以及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密不可分；资本主义既是经济体系又是法律和制度体系，而其面对的许多最深层的挑战往往来自于资本主义对纯经济因素之外的因素的依赖。

在此我要反驳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观点，并将论述即使资本主义丧失了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那也将会经历一段漫长的变迁，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崛起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继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长期前景就一定会有保障。

首先是系统性风险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财务平衡问题。其次是资本家的利润往往要依靠将其活动成本的外化——这包括人工、生态和金融成本。在不稳定的市场中，诸如污染和失业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注意。但是目前缺乏这样的办事机构；在资本主义快速增长的新兴地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而新自由主义则削弱了西方国家的制度能力，甚至造成了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挑战。最后一点是，资本主义不仅容易受到“经济内部”或体制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诸如气候变化或者战争一类外在问题的干扰。尽管曾在历史上创造了空前的经济增长，但面对环境对增长的限制以及由不平等的增长造成的潜在地缘政治冲突时，资本主义将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制约呢？

如果能在这些领域中化解威胁，可能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

溃，而只是将资本主义转化成其他形式。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仍将在世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将恢复一定的活力，但或许已无法继续像从前那样组织并主导世界体系。

一 资本主义为什么不会崩溃？

认为资本主义会像苏联解体那样一下子土崩瓦解，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它隐喻了急速性，即在短短几年中就可以发生从有到无的转变。苏联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停止存在，因为苏联是一个具体的制度结构——国家，其在法定形式上是可以被解散的，而对资本主义却不能用这样的类比。

作为一个国家，也可将苏联比作一个公司，其解体首先是公司的解散。当然其法律政治架构的解体也引发了其他势力和实际活动的深远变革。但是，许多被苏维埃国家机器编织在一起的机构在这个国家消失后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着。莫斯科市在苏联时期的法律和制度地位与后来其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时期的地位相差无几，而相比之下，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气”）的变化则更大些。1989年该公司组建时调整了当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和运作形式。在苏联解体后，“俄气”在1992年进行了私有化，此后成为股份制公司，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资产剥离，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又被部分地整合并划归国有控制。类似这样部分延续、部分变迁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尽管如此，杰尔卢吉扬在分析苏联时，仍将其作为一个直到解体前夕还保持着稳定并且明显具有持久性的政体，这一点是极具参考价值的。仅仅将未来视为线性发展而不考虑可能出现的重大波折，这是错误的。杰尔卢吉扬提醒我们注意压力的累积会让系统难以维系，由

于系统的整合并不稳定，微小的事件都可能造成极大的后果。他同时也提醒我们，哪怕是我们习以为常地为生活提供基本语境和条件架构，其可变异性往往也要比表面上展现出来的延续性大得多。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苏联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因而不能直接地将其与资本主义来做类比。苏联是另一个层面上更具体的对象。

无论是把资本主义看作各国资产阶级的一套行为准则，还是将其看作是把全球企业、市场、投资和劳动编织起来的经济体系，上述的观点都是成立的。正如迈克尔·曼所说，资本主义是基于一系列权力网络的历史产物，在过去的四百年间，它主要是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阐释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不平等且等级分明的组织整合形式，其中主要的单位是民族国家，而经济个体无不强烈地依赖政治权力所创造的条件和关系网络。

当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多少有些理想化；以政府机构塑造社会文化身份从来都不会完全成功；经济整合本身就会推进民族融合，经济个体也肯定会反过来影响到政府。不过即使有虚构的成分，民族国家还是正式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单位，并通过政治同构化得以复制。大多数国际组织都是建构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参与之上。以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国家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国家为企业和市场提供法律和货币支持，其或是直接管理，或是为不同企业、产业和部门的相互依存提供管理的基础。尽管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组织并不完善，但通过这种组织以及有时对市场进行的监管，国家还是实现了对工人、消费市场和彼此信任度的组织。“民族国家”可以被看成是“以民族国家对政治和社会文化加以组织”的简写。并不存在独立于这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组织之外的“纯粹”的全球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现有的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可持续性都依赖于民族国家及其制度供给。这种制度供给必须或可持续下去，或是被其他安排替代。但

40 年来，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都没有这么做，它们反而是掏空了过去福利国家的制度优势，并以压缩成本来追求短期的竞争力，从而忽略了各国长期的福祉和安定，更没有为实现未来的经济参与进行集体投资。

尽管如此，大多数欧洲和以欧洲移民为主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显示出会立刻崩溃的迹象。英国的全民医疗制度还在运转，虽然不断上涨的支出已经威胁到了全国预算。美国最近才迟迟地改善了医疗保障（特别是针对大量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医疗保障的人群）。诸如此类的严重制度腐蚀还有许多。各国财政都面临着赤字，并且难以调整。不过，这并不能证明就来不及“亡羊补牢”了。欧洲国家已敲响了警钟，那里的财政危机已经严重到必须在国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削减福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还有塞浦路斯都已到了悬崖边上，其他国家的形势也不妙。但是，这只会威胁到欧盟的生存，而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

资本主义可能会偏离平衡状态越来越远，最终导致准自然系统（按照沃勒斯坦从普里高津那里继承来的术语）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枝”，或者是导致政府监管、企业战略和投资者的谨慎等机制在混乱的资本市场中失灵，抑或是导致对分散的利益个体的制度协调力被弱化。当然也可能会造成柯林斯所设想的结局，即由于不能广泛地分配财富而无法创造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从而导致新就业机会的减少（不过失业的政治后果可能会更快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哪种机制，失去稳定的平衡点将会使资本主义更加难以维系，并加剧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这种平衡态的偏失是解释当前危机的一种方式，平衡态偏失得越严重，恢复平衡态所需的措施就越艰难越昂贵。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资本主义不大可能崩溃。它可能会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略显弱势，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组织力也会被

削弱。但要用崩溃这个词将会有误导性。我们说罗马帝国崩溃了是可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持续了两百多年，并不是一次危机所造成的。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范式来说，封建主义是在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崩溃的，我认为这并不那么合乎事实。首先，封建主义并不像现代资本主义那样具有“系统性”。其次，并没有一个封建关系和封建制度崩溃的具体时间点。封建关系的衰败是漫长的，它经历了国家的形成、战争、农业技术创新、全球贸易的兴起、宗教振兴和宗教改革，整个过程至少持续了三百年，这并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崩溃”就可以形容的。天主教会在封建制度衰亡的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之后它不再扮演从前的角色，不过，它还是存活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王朝被推翻了，但也有些王朝通过自身的变革而延续了下来，在这个完全称不上封建的时代里，有些国家的君主制甚至仍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假如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确实会到来，那么这个过程可能也会是相对崎岖坎坷的，而且很可能因我们身在其中而难以察觉。有些制度和机构仍会存活下来，比如许多企业不一定会因为资本主义不再是时代的动力而就此停止交易、生产或投机。低买高卖的行为方式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盛行，而且往后也不可能会很快消失。

二 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特殊的以金融为主导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给其自身、给人类社会和大自然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并不足以使资本主义出现致命的危机，但极端的金融化却可以造成这种危机。

金融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经济

活力、快速扩张的能力和管理长期成本的工具，并在科技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笼统地说，金融使我们有了最基本最可靠的能力，可以在预期得到更高收益的情况下，将资本从一项投资转移到另外一项投资中。

恰如其名，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它通过在不同的赢利活动中进行投资来实现对财富，即资本的灵活运用。资本是指可供投资的或是已经投资的财富。包括直接借贷和其他证券交易在内的各种金融活动，都是资本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金融活动对资本的流动性以及经营扩张和分散成本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企业的活力要依靠金融支持，但是失衡的金融化则会带来各种扭曲。比如它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都引发了严重的国内收入不均，并将资金抽离对生产企业的投资。失衡的金融化还鼓励投机，助长了一轮房地产价格的“超级泡沫”，包括造成 2008 ~ 2009 年金融危机的抵押房贷市场的泡沫。

在 2008 ~ 2009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股票和债权交易超过了创造就业和真实利润的实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有所有投资额的 1/4，在金融化的浪潮下，到 2008 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 75%。当时全球的金融资产总量已达到所有股票面额总和的四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十倍。

这是一个由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系列因素引发的全球现象，在 20 世纪末期更是得到了加速发展。由于缺乏民意支持，美国主要是靠借贷打完了最后几年的越战。为了解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困难，美国和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终结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并以可自由浮动、无限交易的法定货币取代了稳定的金本位。1973 年阿以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原油生产者开始限供，它们靠着全球对石油的深度依赖大发横财，随后就把大部分所得放进了主权基金。然而金融

化在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最为极端（较弱的经济体也通过加入欧盟或是不对称的商品贸易被捆绑进来）。在由大额资本主导的同时，这一过程也吸纳了普通的消费者，这使后者在收入停止增长的情况下仍可以通过借贷来继续维持高额消费。现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正在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半边缘向核心靠拢，而生产型企业和金融业较好的比重分配正是它们的优势之一。

最近的金融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主要软肋。这个系统性的风险植根于造就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复杂网络之中。明确这一点以及危机的本质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是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这样的“经典”资本主义危机。在对“实体”经济的生产和消费造成一系列广泛影响的同时，这场危机首先并且首要是一场金融危机。之前几十年国际金融爆炸式的增长，特别是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金融资产所取得的主导地位，使这场危机的影响格外深远。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过度杠杆化、过度风险承担、监管不足、监管缺失以及对一系列新型金融技术的重度使用和滥用产生了如此大的风险，最终酿成恶果。金融化大大提升了金融资产的规模，从而加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影响是：金融化不仅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机构间依靠大体上透明的市场交易所组成的关系网，而且还加强了通过各种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关系所形成的网络。这一点在金融行业中特别显著。2008 ~ 2009 年那些被冠以“大而不倒”之名的的大型银行，更准确地说应该称它们是“连而不倒”。不过金融化不只影响金融产业中的企业，它还是大规模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汽车公司成了汽车金融企业，而矿业公司则和外汇投机套汇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金融化提升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它促进了对已有资本结构（例如特定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驱动了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产地的发展。而极端的金融化则会将投资导向追求越

来越短期的利润，并损害长期和更深层次的增长，同时还会造成投机泡沫。这加大了市场对资本收益低于平均值的企业的压力，迫使它们从依旧赢利的旧产业中撤资，进而造成生产企业员工的工资下降，使资本主义实业难以通过加薪来与产品生产者分享利润。最终的结果是加剧了不平等。

金融化使财富投资的收益远远超过实业的收益，让金融交易师的所得超过了产品生产者（除去一些著名的特例外，交易师的收入普遍远远超过大多数企业家）。这增加了其他部门在金融服务上的支出。2010 年纽约证券业员工的年终奖金总额高达 208 亿美元，薪金最高的 25 位对冲基金经理的总计收入达 227 亿美元。这还是发生在市场股价暴跌，金融化对整体经济的损害显露出来之后。

技术创新和空间重组是资本主义增长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随着金融化的深入有所加速。金融化加快了资金从旧产业和旧产地到新产业和新产地的转移。结果不仅是成就了技术和经济上的变迁，而且还造成了人口的迁徙。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镇化和老牌核心国家工业城镇的衰落正是这一过程的两面。随着制造业利润的下滑，欧美各产业部门的回应措施是要求给工人降薪、引进新技术，或是要求政府减税甚至给予直接补贴，或者向他国转移生产线。有时在成功减薪和获得补贴后，企业仍然会背弃原有的承诺继续转移生产线。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会帮助企业打击反对这些变革的工会力量。这也间接造成了优质就业机会的丧失，柯林斯视此为资本主义长期的危险因素，但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不仅仅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结果。金融资本使工业生产的快速转移成为可能。

流动的金融资源也加剧了地产价格的泡沫。20 世纪末长期的国际房地产热就是一个例子。这极大地炒高了世界各地房产的价格，特别是市区和旅游区的房地产价格，房地产热通常会加剧经济失衡并带

来其他市场的扭曲，最重要的是，它将房地产、地产建设、房屋所有者的个人积蓄和一度谨慎行事的地区性银行编制进一个巨大的国际体系中。正是这种联系造成了引发 2008 ~ 2009 年危机的系统性风险。

这个系统性风险被金融工程和投资中运用的新技术放大了：对冲基金和衍生品由于监管失效开始发挥核心的经济作用。也就是说发展出了一系列新型金融工具，其中很多工具是将不同经济个体捆绑在诸如债务和保险这样的相互责任网上，同时吸引了史无前例的大量资金进入这类新型投资中，而这些资金从事的交易内容往往不为公众所知。一系列看上去很稳定的本地资产——如房贷抵押——被打包成证券在全球交易，而投资者往往无法评估其真实质量。尽管很多新工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降低风险并让资本更具可预见性，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投机交易的对象。风险开始集中并且加大。评估机构评估对应的风险量级和风险对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衍生品作为证券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对实际资产最终价格的赌注，主要是作为保险来抵消其他投资风险。然而除了对冲基金，其他机构也开始购买衍生品作为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投入这类“其他”投资的资本已经超过 50 万亿美元，到了 2008 年危机爆发时，更是达到了约 600 万亿美元。这可能让基金经理们以为风险已经被抵消，然而实际上对冲机制的屡屡失效却指向了相反的可能。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拉格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在评论 1998 年俄罗斯政府拖欠债款时所说：“对冲机制可能在最可怕的时候失效，让那些错误地以为受到保护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

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终结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设想一下，如果资本不能在不同的投资项目间转移以寻求更高收益，如果资本再投资失去了动力、无法驱动创新积累和生产力的提升，那么资本主义

实质上就是名存实亡了。一方面，以此为目的的监管手段会损害经济活力和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一定的监管和管理良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复苏和反弹又十分关键。企业家更活跃的经济体与那些仍然被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相比，表现会好些。不管怎样，从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监管的状况都没有什么改善，这很让人失望。在降低潜在的系统性危机方面，我们几乎毫无作为。

三 从危机中思考

2008年3月股市暴跌，养老金储蓄一夜亏空，英美等地的大型银行纷纷倒闭。有些银行则是“大而不倒”（现在我们知道这里有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内线交易的成分），政府出巨资为它们解困，于是公共收入不但为私人的过度风险买了单，而且还直接将其转化成了私人财富。虽然一些工业企业也在救市行动中得到了援助，但最大宗的补贴划给了金融业，这些补贴没有制造就业机会，也没有帮助房屋所有人避免房产被银行没收，而是直接转化成了资本。假如政府没有提供这种支援，资本主义金融市场可能会更加摇摇欲坠，对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打击就会更加严重。

美国在基础设施和对金融业的直接补贴上投入巨额的反周期投资。英国选择了财政紧缩政策，其削减开支的幅度之大甚至超过了信贷市场的要求。北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强制南欧国家接受财政紧缩政策，以至于欧盟几乎到了解体的边缘。

欧洲大陆的国家起初认为它们的危机应对政策强于英美，但很快就有几个欧盟国家的财政在压力下开始崩溃。特别是在南欧国家，对银行的救市把牟利的私营的金融行业的危机变成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相继濒临破产，即使推行了激进的财政紧缩政

策也于事无补。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盟和欧盟区内构成上的弱点，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金融化时代的产物。欧洲需要更大的共同体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与和中国和美国展开有效的竞争，这与花旗集团和皇家苏格兰银行在快速扩张时的策略很类似。欧洲的金融和商业高层对单一货币的渴求导致欧元的发行缺乏有效的统一金融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政治体制保障。欧洲央行理事会的成员来自利益相左的各国政府，而各国的财政政策和手段又大相径庭。随着欧盟从原有的核心国向外扩张，欧洲一体化把差异极大的经济体连在了一起。经济上升期中被容忍的再分配在危机来临时就成了争议焦点。

欧元和欧元区的前途依旧未卜。西班牙和葡萄牙仅能维持基本的稳定，意大利风雨飘摇，塞浦路斯则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欧洲的危机还会扩散到哪里：也许会波及老成员国比利时，或者新成员国斯洛文尼亚，还可能祸及欧盟本身并动摇单一货币协定的根基。同时各国的财政紧缩政策通过减少国家在福利和安全上的支出来实现宏观经济调整。这些削减有些是本国对市场压力的回应，有些是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债务缠身的第三世界国家做出的结构调整，有些是二者兼有。政府不得不出力帮助投资者减少损失，以防止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萧条。尽管投资人和跨国金融业在泡沫期赚取了巨额利润并在救市过程中通过政府提供的流动性资金直接获益，但我们在讨论危机和解决方案时，却常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过于偏重以国家为单位来叙述金融危机也会强化其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日益普遍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对穆斯林的排斥）。当然，简单地把危机理解为希腊的挥霍和德国的精明而完全忽略金融化在当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是无益的。金融化带来的利润让欧盟急于扩张并对成员国的财政问题视而不见。欧盟国家中较为富裕的国民对救援他国经济大为不满，但是他们忘了救市行动主要惠及的是金融业和那些拥有大量资产

的个人。

欧美的金融机构在被注入大量纳税人的金钱后依旧很不稳固。有些机构不得不对在高风险市场投放的贷款做价值重估，只有政府间的借贷能免于崩溃。几乎所有机构在泡沫期冒失的扩张后都面临持续改善财务状况的压力。但各国证券市场相继恢复了正常，不少已经回到危机前的水平甚至再创新高。新的公开募股又变得有利可图（和往常一样，公开募股的既有产品实力和收益能力良好的企业，也有仅仅炒作概念和希望的公司）。投资银行和其他机构又开始发放高额奖金，这再次刺激了过度风险承担的发生（尽管更多的机构开始以公司证券的形式发放奖金，并通过禁止短期套现将雇员的利益和机构的表现捆绑在一起），但也有机构以“冗员”为理由进行裁员。经济再次衰退的忧虑还是很严重的。对监管的改革少而又少，衍生品市场依旧十分不透明，并继续以低资产获得高杠杆。和此次危机前相比，银行业甚至更加集中在几大巨头手中。房价持续走低，一些地区的价格在看似走稳后又再次下跌。信贷依旧吃紧，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不乏可能加息的忧虑。

“实体经济”即便没有完全陷入萧条，也一直是萎靡不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低，失业率居高不下，新的就业机会在数量上屡屡达不到分析师的预期。然而出于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负债的担忧，很多人更倾向于财政紧缩而不是追求增长。美国许多州的长期财政状况并不比希腊或者西班牙乐观（虽然有些州实现了短期的改善），尽管联邦政府有州立政府所不具备的财政调控手段，但它面对的是巨额赤字，而且对究竟应该在多大限度上削减开支或再次举债或两种手段并用还没有达成共识。经济上的不满是造成普遍而强烈的政治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众对腐败、自私自利和无能政府的愤怒同更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连在了一起。政治合法性的削弱威胁到了资本主义

的延续。

不过，从欧洲目前的发展方向来看，其前景既不是崩溃也不是发生革命，而是经济停滞。欧洲虽然缺乏经济增长，但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经济体系也基本完善。商店里并不缺货（尽管倒闭的店铺越来越多），多数政府还能正常支出（尽管同时在持续削减开支）。当前主导的政策反应是通过财政紧缩来降低政府在账目上的赤字。由于这种政策没有什么积极的效果，因此无论政客们在思想上和长期规划上有多么谨小慎微，他们都越来越把增长作为突破口，然而迄今为止还缺乏有效促进增长的机制。

作为一个共同体，欧洲在未能解决其金融问题时还面临着一系列以国家为单位的金融危机。欧盟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在每次危机中对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采取救市行动。虽然公众普遍表示不满，但目前还没有出现挑战现有政党或政治过程的大型社会运动。虽然在公共广场上常有大型的示威活动，甚至是“占领”运动，但这里代表的不满情绪仅仅限于对旧制度的否定而尚未转化成新的政治纲领。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利用这个机会打出反移民和其他反动的纲领，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是令人不安的。不过他们最大的成果也不过是将主流的保守党派向右拉了拉，其自身的运动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欧洲的左翼运动除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罢工运动和法国国家主义者的宣言外，几乎没有任何可见度。真正涌现出来的是一系列在本质上“反政治”的运动，例如意大利人贝佩·格里洛领导的五星党运动，在其他国家与之相呼应的是公民通过选举来反对现政府，尤其是反对政客，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出更能干的政府。民众对经济危机和政府合法性削弱的反应常常包括右翼倾向和排外情绪。

美国尝试了更利于增长的刺激计划，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差不多达到了2%的增长率——这远远好于欧洲0%~1%的数字，但

这也没什么值得雀跃的。美国的经济前景至少在短期内由于找到了新的能源来源而有所改善，长期的改善则需要依靠其经济中企业精神的更大发挥。然而这个国家的活力受到了政治僵局的严重影响。茶党如今在选举中主要是作为共和党的一个分支，但其根源是更为“反政治”的，这和意大利的五星党运动有些类似。奥巴马政权主要是由中间派技术官僚组成的，尽管在一些自由的议题上也有重大的政策创新，但在危机面前，奥巴马政权没能改变总体的施政方向。原来那些机构依然主导着金融业，它们做的事和危机前没有什么差别。对美国经济最大的一些威胁来自于负债累累的州立和市立政府。在这些级别上的开支削减影响了联邦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州立和市立政府要履行的长期义务可能导致其财务全面崩盘，除非出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才能够减轻这个负担。

尽管 2008 年危机的根源主要在美国和欧盟，但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媒体信息的深度关联性和快速流动性，使得危机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其国际性。这一半是事实，一半是错觉，或者说是视角不同造成的扭曲。资本市场的混乱确实有长远的影响。资产价格的暴跌给阿布扎比主权基金带来了很大损失，险些让邻近的迪拜酋长国破产。迅速恶化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失业问题大概是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当然很明显，经济危机只是当时更复杂的时局问题的一部分）。上海、东京和约翰内斯堡的证券市场随着纽约和伦敦股市的暴跌也相继触底，虽然它们回升的速度要快得多。中国和越南的产业工人由于国际需求不振而大量失业，尽管中国和越南的经济在短期受挫后继续保持增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极大，在一开始的暴跌后，由于还有来自中国等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的需求而有所恢复，而有些价格随后又跟着中国经济的震荡而下挫。

在一段时间里，美国为了摆脱二次衰退苦苦挣扎，而欧洲的危机则只限于几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问题，此时的中国、印度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保持了快速增长。实际上，2011 年最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头痛的，不是经济的下滑，而是经济“过热”，即经济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原材料、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增长，以至于造成了难以治理的通货膨胀。由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正像其他外国投资者一样）在关注出口市场的同时，也担忧以美元结算的资产是否会贬值。中国经济在字面上的增长速度让欧洲人瞠目结舌，但是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快速放缓，这说明中国也不能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之下独善其身。过热的金融市场是一个挑战。在北京和上海有成千上万的空置公寓是投机者买来准备再次出售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提速，或者出现更坏的情况，即经济增长率跌到 5% 以下，那么房地产泡沫很可能破裂，过度杠杆化的房产所有者会开始大量抛售房产，从而引发一系列恶性反应。这个系统性风险的例子或许相对封闭和本土化，但还有其他规模更大的例子，其中有几个与高度杠杆化的金融市场深度关联。上述例子也是让中国领导人担心可能引发国内不和谐的因素之一。

印度的资本主义还比较有活力，企业精神更强，和中央政府的联系也更弱一些。最后这一点是件幸事，因为其中央政府的效力要比中国低得多。印度的贫穷问题更为普遍，基础设施也没有中国发达。效率低下的情况十分严重。但是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可观的，而且似乎受到投机泡沫的威胁也较小。和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和政治效率也饱受泛滥的腐败问题影响。和中国一样的还有印度也面临着各种生态和环境问题（虽然还远远不及中国空气污染的程度）。印度对自主的社会机构更加开放，消除风险和扶贫的慈善部门也更加发达。但不平等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快速的城镇化又让这个问题以新的形式浮现出

来。帮助没有资源的群体寻求市场解决办法的政府机构还比较弱小。

令人高兴的是，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和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新兴市场中，经济增长还在持续。在被欧盟冷落了多年之后，土耳其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还不能完全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但足以让欧洲国家羡慕不已。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经济体面临动荡，全球的资本扩张也近乎停滞。这给人一种假象，好像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还能不间断地保持资本主义扩张，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危机完全只局限于世界上较富裕的经济体。

这次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它植根于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化之中。当然了，其影响在不同地方各不相同。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实力向中国转移（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实际上，这种转移作为较富裕的工业化经济体金融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已开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过程缩小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这比先前几十年工业繁荣期间富国对穷国的援助和促进其发展的政策的效果还要明显。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无法在全球经济下滑时独善其身，其他金砖国家也经历了更大的波动（如俄罗斯），或是经济增速放缓（如巴西）。

我的最终结论依旧是资本主义不大可能因为一场经济危机而终结。经济与政治危机的交叉碰撞带来的威胁最大，或者说早先公众在追求增长的同时默许了对社会和环境的破坏，而这个不成文的契约正在被打破。欧洲成了无增长的资本主义——这几乎是个自相矛盾的称呼，也不清楚欧洲对此会如何应对。亚洲还能保持一些增长，但政治状况起伏而脆弱，原先期望值更高的群体会因为增速放缓而心生不满，民选的领导人则可能试图限制公众自由并打击异见，造成反复的政治动荡。

塑造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观念是存在一个与国家和公民社会界限

清晰的纯粹的市场，但资本主义自身从来都是也必须是跨越这三者界限的机构和行为的产物。国家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有章可循的，而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不仅依赖于作为“客观”系统现象的组织市场的体制，还要依靠诸如公司这样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后者除了是法律上的实体外还是组织工作的体制。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仅依靠国家和社会，而且还要依靠对大自然的开发。资本主义在这三种情况下都会破坏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而极端的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这种倾向，资本主义未来的存亡，就要看能否在不毁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找到限制或者逆转上述破坏的办法。

四 制度缺陷

我们能感受到亚洲大部分地区和非洲、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正在发生变迁和复苏。经济的高增长让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普遍抱有乐观态度，甚至让政府也和民间人士一样将“绿色增长”和构建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列为努力的目标。这与财政紧缩的欧洲和政治上陷入僵局、经济上勉强增长的美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然而在气氛与发展轨迹的差异之外，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关键的相似点。

资本主义式的增长带来了重大的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动荡和不平等。资产阶级精英对财富超乎正常比例的占有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张扬的，尽管迄今为止，其他群体在发展中分享的收益足以让他们保持沉默。在不平等之外，腐败是另外一层挑战。为了发展工业和满足快速城镇化的住房要求，需要对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大量投资。这些成本大部分被外化了，而新创造的财富又被那些有能力占有资本主义利润、从中获得劳务所得或赋税的个体所获得。也就是说，环境和社会成本并不是由企业来承担。其中，政府也承担了大部

分进行必要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

那么资本主义是否就没救了呢？这取决于企业是否能继续靠“外化制度”让国家、非营利组织甚至是家庭和普通个人来承担成本，这包括建设有用的基础设施的成本和资本主义副产品带来的损害。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赢利能力和增长主要是靠成本的外化。企业很少完全支付它们享用的公共投资，比如医疗、工人教育或是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它们制造污染和垃圾却不承担这种损害带来的金融、人力或自然代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同时也一定会创造出各种副产品“病征”（illth，这里借用的是约翰·拉斯金在描述19世纪污染严重、贫困遍地的英格兰时创造的单词）。只有在这种病征继续得到容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才能继续创造财富。国家试图在这个取舍中保持平衡，但是要让资本主义企业支付其自身的成本所需的税负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可能完全抵消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动力。

资本主义企业还通过其他方式从国家那里获利，比如维护财产权，将政府拨款研发的成果转变成私人商业化的产品。国家供给了从货币到交通道路的各种要素，并保证了合同法的稳固。资本主义的生存也依赖社会团结和学校、医疗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即使这些制度有时是部分国有或非营利的，但它们还是能经常给资本主义带来赢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并使企业免于将成本内化。

企业，即使是商业企业，也不是仅仅局限于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被资本主义所控制。实际上，企业是依照法律来组织，并受到政治影响，在为企业所有者赚取利润之外也为企业的雇员带来了好处。企业就业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包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尽管在极端金融化的时代这方面有所削弱，面临撤资和被

收购的企业失去了长期规划的能力，为了取悦资本市场不得不开源节流使收益性更为明显。从医疗到教育，再到关怀老人和失业保障，政府机构在降低生活风险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包括由资本主义制造或加剧的风险。这些机构在金融化时代遭遇了被削弱的压力。与此同时，家庭、社区和宗教组织只能承担部分的额外负担。一些以自助和帮助他人为目的的新型非营利组织开始出现。有经济能力的人还可以通过买保险和储蓄等方式来对付风险。但是作为一种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和波动性，需要一些辅助性的制度帮助普通人来应对。在老牌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由社会组织提供的风险规避已经受到严重侵蚀，而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规避风险的新制度发展相对缓慢。这让我们不得不发问：资本主义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政府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合法性吗？

资本主义实现繁荣并维持普遍合法性所依赖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中受到了破坏，资本主义的复兴有赖于这些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复兴。一方面要提供合法性、社会团结和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则要应对资本主义的特征，即资本主义增长同时牵扯到的城镇化、资源需求、环境恶化、移民等许多问题，而不仅仅是投资、生产和利润分配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不仅来自市场，而且还来自于政府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正如卡尔·波兰尼在经历了 20 世纪的大萧条和战争后指出的那样：回顾 19 世纪并展望未来，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式发展一定会破坏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且会削弱资本主义自身依赖的社会条件；而为建立新型制度所做的努力在稳定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也让人们能对资本主义增长创造的利润进行更有效的分配。

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维护资本主义延续的国家通过不成文的社会契约获得合法性：公民享受经济增长，但要容忍不平等和长期成本的外化。今天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高增长国家需要在自身的增长模式

中找到平衡，以维持国家的团结并确保未来增长所需的投资，这是相当严峻的挑战。要保持最近的增长率并不是件易事，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速走低的时候，而如果不能保持这种增长，就会出现投机泡沫破裂和民众不满的双重问题。

欧洲和美国面临同样的挑战，而且没有国内乐观情绪和经济增长的帮助。国民对经济长期没有增长和政府应对这个问题时明显的政治无力十分焦虑，但迄今为止还没能催生出能够真正塑造未来的社会运动式的回应。民众对经济危机和政府合法性削弱的反应主要是来自右翼的思潮，并常常伴有排外情绪。欧洲各国政府的回应是通过紧缩计划来恢复国家的财政平衡，同时保护金融化的主要受益者和引起危机的祸首所掌握的资本，这只能让情况更为恶化。美国在刺激经济增长上做得更多，但遇到了政治僵局和相同的政治信念，即费用要由纳税人来负担而不是由金融机构或投资者承担。

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时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员工的薪酬。同时，经济增长负担了医疗、教育、交通和其他福利的扩展，使公民得以通过进步的税制和政府投资而广泛地共享福利。今天的公民对他们的后代是否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繁荣和机会持怀疑态度。较富裕国家的公民继续致富的欲望遇到了国家维持国际竞争力的压力（不仅是在贸易领域，还要确保那些可能逃离高税收国家的精英和企业的忠诚）。我们有理由预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率将会继续低于全球增长，结果是这些国家虽然还很富裕，但在没有重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提升空间的机会越来越小。同时，保障了资本主义总体合法性的制度结构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受到了侵蚀，在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这种侵蚀更为严重。

“新自由主义”一词指的是一揽子政策，包括试图降低政府支

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同时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监管。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这个自由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来自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差异是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废除成熟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安排。主要的靶子就是在应对大萧条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些制度安排。与 19 世纪自由主义的关联是有教育意义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对“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追求以及弥补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过度扩张问题的努力，这二者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在 19 世纪，自由主义者常常设法废除影响资本主义获利的传统制度，并且限制新制度的出现。这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问题。

比如在中国，极具活力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一些古老的社区结构和共产主义时代的其他制度发生了冲突，例如“单位”，这个制度曾经让“工作单位”成为公民住房、医疗和就业的主要提供者（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一些家长式的公司城镇有些类似）。新就业的工人，尤其是那些迁徙到快速发展的城镇区域寻找新工作机会的民工，失去了在原有居住地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单位”曾经提供的制度化福利供给。他们要在城市里重新求生，生计好的人或许还能有钱购买旧福利供给方式的市场替代品，生计不好的人就无力承担了。他们有时会为自己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比如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老一辈的民工成立了以同乡或宗族为基础的同乡会。这些民工通常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把努力工作的积蓄寄回老家，或是把亲人接到城市里来。政府试图对这个过程进行监管，比如通过“户口”制度限制没有得到批准的民工，不让他们享用学校等城市机构。这种限制的存在既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同时也表明了制度上的缺陷。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的是更强大的制度。中国政府确实在努力扩大教育并重建医疗保障制度，其中包括建立新的社

区医疗体系。随着社会的快速老龄化，如何照料老人成了令人忧虑的难题（以家庭为基础提供照料的老办法不仅遇到了人们观念的变化，而且还要面对劳动力迁徙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问题）。未来中国会发展出何种制度来提供失业保障和社会服务，我们还不得而知。新的机构可能是慈善组织或是互助协会，但至今一些政府部门还不太愿意给这些组织较大的自主权。中国明显在复制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不过还很难判断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复制，也不清楚中国会不会模仿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来调整这些制度，或是推行某种（“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的450年间是一个例外的制度，但资本主义可能出现的变迁会使国家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主流。可以说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包含了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而法西斯主义肯定是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当今各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增强合法性，这使国家资本主义出现的可能性变得更大。重点是未来的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作为过去两百年间在西方历史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得以扩展。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可能这只是把资本主义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方式之一，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斗争所决定的。

当然，在国内实行新自由主义和在国际上鼓吹“自由贸易”是密不可分的。降低关税和贸易监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降低内部流动性并削减政府对市场的影响。人们认为国家主导的资本投资在国际市场中将带来优势和缓冲，再加上国家提供军事安全（或军事优势）和社会保障，这可能使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可行的模式。没有怎么受过自由民主洗礼的国家尤其可能采纳这种模式。当然，西方的政府也会经商，尤其在运输、通信和能源产业，但政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填补市场缺陷，很少是为了进行资本积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要

求把这些产业私有化，这种私有化不仅在英国这样的老牌核心经济体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且在拉丁美洲等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越演越烈。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独特的制度结构在未来的演化过程中，是否会像西方过去那样明确地将政府、商业机构和公民社会区分开来，这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五 资源缺乏和环境恶化

资本的持续积累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困难和社会政治保障体系重建问题的限制，还受到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影响。资本主义依赖原材料和一定的人口基数，还需要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容忍资本主义企业把环境恶化的成本外化给公众来承担，不论这是以政府支付的形式还是社会化分配的形式。

人类对自然这一概念的传统认识，使其应对生态和气候方面的挑战更加困难。长久以来人类都把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对立面，通常，自然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这种看法在西方特别流行，但也不仅限于西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类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然存在，人类必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才能得以生存。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将自然建构成资源。对资本主义而言，自然就是用来利用和开发的。我们熟悉的例子从森林到水资源不胜枚举。以后者为例，全球淡水的使用量在 20 世纪后半叶增长了三倍。技术进步使农业和其他水资源的使用者能从更深的地下抽取水源，这会导致水源枯竭和地下水水位下降。人类修建了更多更大的水坝进行发电并预防洪涝，但同时也使许多人口被迫迁徙，并造成良田被淹没和鱼类的大批死亡。河流正在枯竭，湖泊正在消失。以价格评估来应对这一现象的尝试，几乎总是严重地低估当前的资源利用给未来几代人带来的

负担。

自然即资源的理念总有其局限性，而资本主义又是一个致力于永久扩张的体系，因此资本主义也会孕育出超越自然极限的能力。现代科学与商业和政府支持的结合大大促进了新技术的产生，这包括通过新技术来扩充自然资源，比如农业和新材料领域的进步，以及新型的能源开采手段。资本主义通过这些手段增加了地球对人类生活的承载力，通过农药、机械化、疏通灌溉和科研带来的新型农业手段，农业变得更为集约化并补充了自然的潜能。资本主义也带来了制药业的新技术和设备齐全的医院，使医疗更加基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这延长了人类的自然寿命，让更多的人能够颐享天年。还有生产过程和设备方面的新技术也极大地改变了同时也缩减了人工劳动在创造新商品中所起的作用。此外，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克服了距离和地理的障碍，而其他的基础设施技术使人类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镇化生活。再加上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更是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大规模的城镇化以及人口流动性的大幅提高。

但是社会生活新的组织形式也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这主要是靠煤炭和石油一类的碳基能源以及核能和其他类型的能源来满足的。新技术也加大了对各种矿物的需求。人类生活规模的剧增不仅强化了人类对稀缺资源的依赖，而且还带来了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包括可能出现的灾难性的环境变化。农业的集约化虽然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本身就会造成土壤流失和其他破坏；新发明的材料经常是生物降解性较差的；碳基的资源带来污染；一系列随着资本主义增长而得以扩张的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这正是为什么从里约到京都再到多哈的谈判难以达成对环境变化采取切实行动的全球共识的原因所在。

更笼统地说，在金融化的时代，应对环境恶化的行动本身也成了交易的对象。通过碳交易来应对碳排放污染的方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种“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的方案给排放设置了上限，但也让那些污染没有达到上限的企业可以把它们所谓的“剩余量”卖给其他污染者而让后者可以加大污染。这种方案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受欢迎，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污染权可以被打包成证券交给投资银行来通过交易获利，这能比实际减排带来的利润更高。

自然资源被穷尽和受到不可逆破坏的程度将是威胁资本主义未来（以及人类生活）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分析的范畴。一部分原因是很难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估价（尤其是考虑到其长期的可持续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仅仅把自然作为资源的想法，严重限制了我们，使我们很难看到人类活动给自然带来的真正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

如果只是把自然视为有限的资源，那么自然就成了资本主义组织和国家争相开发利用的对象。石油政治经济就是一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例子。不过其他新出现的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将极大地影响不久的将来，并会对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和人类社会形成挑战。能源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矿产则是现代技术所必不可少的；水资源正面临短缺、供应不稳而且常常受到污染；随着贫瘠的阿拉伯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开始争夺肥沃的非洲大陆上的耕种权，连农田也变成了竞争的对象。

对资源争夺也是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已经是一系列内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犯罪活动外围的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基本元素。与此同时，确保包括石油和各种矿产在内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将对发展中的中国至关重要。为了确保这些资源，中国不得不与一些遥远的国家纠缠在一起，其中就包括一些局势极不稳定但对其自然资源的获取却很重要的国家，比如说最近分治的南北苏丹，这两国的石油主要都销往中国。出售自然资源对俄罗斯和原属苏联的一些中

亚国家也十分重要，欧洲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对象，双方在能源供应方面也发生过不少冲突。伊朗是中东一个不可预测的国家，对伊斯兰世界也有更广的影响。海湾国家是重要的国际投资者，同时也是地区安全问题中重要的参与者。如果这些国家开始不稳定，那么带来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尼日利亚一直是“资源诅咒”的最佳范例，近年来却似乎在曲折的发展道路上获得了一些成功。拉丁美洲国家中有几个是主要的石油输出国，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巴西，是新兴的地区强权。美国已经减少了对国际能源的依赖，这一部分是依靠在金融危机中的投资，包括新型的液压破碎技术。开采页岩中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新的能力大概也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它展示了技术有可能解决未来资本积累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这比“更绿色环保”的技术还要有用，后者迄今为止还很难大规模地解决能源需求问题）。但是技术的解决方案也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资本主义依旧深陷于国际能源资源带来的各种政治问题中。陷进来的强权还有不少。能源问题和保护领土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出现在了东亚海岛纠纷、中亚政治问题以及英国和阿根廷的后殖民时期冲突中。

能源可能是导致暴力冲突加剧的最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水资源和可耕地同样稀缺。而在资源之外还有宗教、移民和国界问题造成的各种争端，还有准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更不用说由于发现邻国大规模扩军或研制核武器带来的紧张局势。各种独裁者和非政府的个体也是额外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而过去十年中的实际冲突——特别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久拖不决的战争，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削弱了美国通过有效管制实现霸权的能力。这些都增加了未来战争爆发的概率，也使小规模的地区冲突更有可能被带入更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当中。在很多方面，冷战的40年只是地缘政治冲突和重组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插曲。

六 非正式部门和非法资本主义

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共同削弱了维持西方相对富裕国家中资本主义稳定所需要的各种制度。这不仅包括政府的监管部门，而且还有工会和企业。原来被视为个体就业基本框架的商业企业无法继续提供医疗、养老或长期的就业保障；随着资产在资本市场中进行交易，许多企业被剥离了对雇员、社区和其他企业的责任义务，甚至自身也不复存在。社区的根基被经济基础的震荡和人口的迁徙所动摇。正式的组织越来越难为普通民众提供社会保障或是就业机会。这个转变带来的震荡没有苏联解体时的制度危机那么严重，但发展方向是一样的。宗教组织已经开始介入，不仅组织慈善活动，而且还提供从就业到心理咨询的各种服务。而经合组织国家则出现了地方性的网络来组织部分不牵扯现金的易货贸易经济。

正式组织的弱化伴随着非正式部门的增长。这个术语来自对第三世界情况的描述（特别是阿瑟·刘易斯和基思·哈特），那里的正式组织没有在全国层面上发展起来，结果就是在那里被正式记录的货币经济只占全部经济活动总量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部分，也就是对广大人口的实际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在各种过程中都依赖对“传统”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这种重新整合在新形势下为人们提供了支持，带来了易货贸易这样替代正式市场关系的制度，以及面对面关系的网络，其中的交易完全不受法律的限制，也不需要纳税。但是通过这些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时产生的概念，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非正式部门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在法律的框架下支持或应对非正式部门的努力从来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

非正式部门在过去 40 年中飞速发展。无论在富国还是在穷国，

这都是经济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民众在公共机构效率低下时重要的应对手段（例如在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末期），更是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减少时民众主要的应对手段（不仅适用于前共产主义国家后期的过渡时期，也适用于强行推行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组织集中在社区级别，如小规模以物易物、合作社组织、规避纳税和金融业的现金交易。非正式部门不只是简单的社会问题的集散地，而且还是创新的温室。那些创造了硅谷奇迹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初出茅庐时，往往是通过非正式的形式组织创业（至少在风险资本尚未盛行的年代是这样的）。今天在印度和尼日利亚也有很多类似的企业家，包括电影人和艺术家。非正式部门有时是波西米亚式的，有时又令人吃惊地具有中产阶级的积极特质。其灵活诱人的商业模式不一定需要纳税，但其员工也有可能得不到养老金或医疗保险。

非正式部门不只是本地的社区网络，也不只是替代正式市场或正式机构的其他面对面组织的形式，它还包括大型的跨国资本主义结构，至少部分地运行于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之外。后者包括洗钱、银行业以及以武力为担保的投资和合同，还包括逃税、贩卖人口和各种非法的流动——从矿产（“血腥钻石”和钶钽铁矿）到武器（主要是轻武器，但也有坦克、飞机和导弹），再到毒品和人口。这些通常是不正当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资本主义在组织上更为正式化，这也与“非正式部门”这个称谓不大相符，其收入和投资高达数万亿美元（准确的数字很难估算出来，这也在情理之中）。

已经很庞大的逃税产业和非法资金流由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取代共产主义这一特殊变化而更为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前公职人员对国有资产的窃取，以及将其转变为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相联系的资本主义企业行为。这助长了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并使大量新的资金涌入已经十分活跃的国际非法市场网络。大概有价值一万亿美元的非注册

资本从俄罗斯等国快速地转入了塞浦路斯和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接着又被投资到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合法生意与非法生意中。

相对非正式的部门活动和大规模的非法资本主义活动，这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展现了资本主义增长中的弱点。首先，这种增长无法完成维持社会生活和维系人口所需的分配。在很多社会中，正式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依赖非正式部门来维系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基于合法市场的这部分社会维持繁荣所需的社会安定。在受到正式市场衰败影响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点尤为突出。比如在贫民窟里，由于宏观尺度上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在这里失效，居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互相依赖并靠小规模的经营维持生计。但有时在资本主义的宏观尺度上也是如此，腐败的泛滥就说明除了个人的贪婪之外，还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其次，投入全球非法贸易的大量资本直接或者虹吸式地将资金从正式部门中吸走，导致市场和风险更加难以预测。当然，来自非法部门的资本也有办法进入合法的资本市场或者被直接投资到合法的生意中去（既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也有可能伴有非法的手段——如贿赂和武力威胁）。非正式化和腐败扰乱了必要的政府监管，使合法生意直接或间接地与毒品交易或贩卖性工作者这类非法勾当结合在一起。

很大一部分的全球政治经济是以超出“正式”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式所存在的。政府与许多势力同流合污，比如与企业、各种规模的有组织犯罪、没有政治头衔但享有政治权力的军阀和卡特尔^①，以及国家半自治领域中的经济势力。这让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并会威胁到现有的资本主义。同样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还有

① 卡特尔（Cartel）亦称同业联盟、企业联合体或垄断联盟，是垄断组织的一种形式，通过由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组成联盟来控制该产品的产量和价格。——译者注

维基解密、黑客攻击、恶意程序、鱼叉式网络钓鱼等计算机安全挑战和其他攻击手段，发起攻击的既有个人也有以国家为后盾的势力，攻击的对象既包括国家也包括企业。这是资本主义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没有先例，但未来的走向尚不明朗。

七 结论

虽然资本主义不大可能在下个星期就崩溃，但也不大可能会永久地持续下去。只是线性地从当前的形势来设想未来，这样做是不明智的。

资本主义可能会被内部矛盾所击溃，这包括其自身容易造成危机这个一般特征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过度金融化带来的特定风险的加剧。实际上，2008～2009年的股市暴跌后，改善监管和市场结构的举措令人惊讶地少之又少；当权的差不多还是原来的那些机构和个人。因此我们仍然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同样重要的是潜在的外部干扰，无论是环境灾难、疾病、战争还是叛乱。资本主义依赖的基础设施系统，比如通信网络和能源供给也有可能被一些政治力量破坏而中断。出于这些原因，曾经越来越紧密的全球一体化过程可能会被部分地逆转。可能要依靠适应力基础不同的、关联更松散的系统才能应对这些破坏。

资本主义可能不会崩溃，而是衰败下去，随着替代体系的崛起，其组织的经济活动会越来越少。增长会减缓，这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更可能是因国家和地区而各异。在资本主义驱动下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市场一体化可能会放缓甚至逆转，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组织系统也各异。资本主义可能在某些国家中更为重要，在其他国家则受到约束，甚至被边缘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企业可能会更多地管理经济关

系，留给“自由”市场的空间会更小。在组织经济关系时可能会更注重资本积累之外的目标。社会政治制度给资本主义提供的平衡力可能会更强，也可能更弱；非法的资本主义可能会滋长，也可能衰败。因此资本主义既有可能在维持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发挥主导作用，还有可能会发展出全新的经济结构。

当前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熬过的第一个危机，之所以能熬过来，完全是因为政府愿意干涉并承担了“过度”资本主义造成的各种代价。当然，这些代价被外化给了公民，这些民众通常都十分不满。但是如果政府能通过吸收企业外化的成本来解救资本主义，那么也可以通过应对失业和疾病等风险来帮助公民。迄今为止，还看不到什么社会运动有潜力能推翻那些以紧缩政策保护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的政府。这至少提醒我们注意，同资本主义面对危机的脆弱性同样重要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资本主义有可能因为其依赖的政治、社会和环境条件的解体而受到影响。

应对制度缺陷是一个基本的挑战。当然，应对这个挑战的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尤其是非营利组织，资本主义的企业如果足够稳定，也可以作为社会机构来支持其雇员，从而能够应对这个挑战。对很多人而言，非正式部门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缓冲，当已有的正式机构无法有效地为公民服务时，非正式组织可以维持人们的生计，但这也会带来大规模的腐败。庞大的非法部门会涉及逃税和有组织犯罪。非正式部门和非法部门与正式和合法的资本主义相互依赖，然而它们也会削弱其所依赖的国家制度和其他制度。

政府是否能够继续为资本主义提供其增长所需要的运行条件，这不仅在欧洲一些地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些不那么发达的、通常被称之为“脆弱国家”的地方也是重大的问题。在安全问题之外还

有财政危机。基础设施和其他增长型的投资短期内很难获得实际收益。对全球金融进行监管并应对环境挑战需要有效力的大型跨国治理结构，但是建立这些机构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维系一个全球性的世界体系需要霸权和一些国家超出比例的投入。美国单边承担这些负担的意愿正在降低，但还没有出现哪个单一国家或者是多极体系能够取代美国。一种可能是，世界体系将会丧失凝聚力而更加青睐相互竞争的地区结构——这样的话，资本主义可能对某些地区更为重要。

威胁资本主义未来增长的“外部”挑战有些就是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比如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绿色增长”也许有可能维系资本主义并应对环境的挑战。但“绿色增长”也可能会遭遇极限，造成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再次生成，并导致其无以维系，因为归根结底，资本主义毕竟是增长的机器。

对于每一种威胁，都可以采取行动来应对损失并减轻资本主义片面发展带来的风险。采取行动的可以是赢利公司或非营利组织的企业家，也可以是各国政府，也有可能会受到社会运动的推动，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与全球挑战同等级的运动。不管怎样，如果制度没有被改造，就业情况没有好转，环境、公共卫生和其他挑战得不到解决，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繁荣。

各国资本主义市场同时大规模的崩溃将是灾难性的，不仅会造成经济的动乱，而且还会颠覆政治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可能会促成这种崩溃，但崩溃更有可能是由生态变迁或暴力引发的。这个风险因为资本主义的成本外化、环境被破坏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制度不稳定而变得更为加剧。但不连续的变迁不一定会造成突然的或者灾难性的后果。

我一开始就隐含地指出，资本主义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至少也是将来可能出现的情景。说起来，更强有力的

国家、更高效的农业生产力和宗教信仰的复兴可以解决封建时期欧洲面临的问题，这让欧洲经历了不断的变迁，久而久之的结果就是将欧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政府对风险的应对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加上资本主义的企业，这二者为 20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些同样也能改变资本主义的面貌，尽管是在维持资本主义秩序的条件下。

资本主义秩序是规模庞大、高度复杂的系统。最近 40 年的发展深刻地破坏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资本主义重新发展起来的各种良好制度。修补和替代这些制度的努力将会改变这个系统，正如新技术、新行业或者新的金融行为会改变资本主义系统一样。即使成功地使资本主义复兴，资本主义以及四百年来在资本主义驱动下增长的现代世界都会被改变。即使没有别的情况，资本主义也会改变原有的模式，增长将由老牌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之外的力量所驱动，这会让资本主义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结合起来。

问题是，改变是否足以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外部威胁，如果不能的话，在新秩序建立之前是否会出现更大范围的灾难？

结语 回到现实中来^{*}

说到底，我们有哪些共识和分歧呢？对当今世界形势，包括思想与政治环境的分析让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盲点，这些盲点足以成为危害未来的危险因素。这一共识是本篇结语的主要内容。但我们也不回避在阐释世界的现状及未来时存在的理论分歧。合著此书时我们有一个迫切的期望，那就是我们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可以给读者带来全景式的分析并引发富有成效的讨论。而更大的期望是：如果能引起足够多的读者关注，那我们或许真的能有所作为。

我们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将是一段晦暗狂暴的历史时期。宏观的历史结构需要时间来改变并展开。最近的大衰退迫使我们深思这个世界的前景。其核心问题不在于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在地缘政治中的霸权能维系多久，或是下一个全球霸权的所在，而在于是否会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尽管在预测中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我们的社会学观念有很大的共性。我们的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历史社会学这一领域中的学术积淀——这种对历史和当下的比较研究浸染了马克思主义和韦

^{*} 结语由本书五位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曼、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和克雷格·卡尔霍恩合作完成。

伯学派对社会权力与冲突的重视。我们着重于考察多层次的因果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等有诸多共识，而分歧则集中在不同层次因果关系的交汇处。比如某个动态环节是否会强大到压倒其他因果关系，存在多重因果关系的世界是否总会造成更高层面上较大的不可预测性，或是某个具有主导型的视角是否能展现出存在于更高层面上的体系并将各种因果关系汇总成更宏大的历史格局。

作为结语的本章将首先概括如何用宏观社会学的方法来描述当前的全球化以及它的起源和前景。结语的后半部分则着眼于社会科学现在面临的困境和短期内能否找回其有用性。换言之，本章阐述的是我们心目中更为现实的世界图景和论述方法。

一 造就当今的时代

（目前限于）西方世界的大衰退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个从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开始后长达 40 余年的中期历史阶段。这个时期令人困惑，这从新自由主义、后工业化、后福特主义、后冷战、后现代、后消费主义等诸多谬称中就可可见一斑。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全球化”成为描述世界形势最流行的词语。所有这些标签在我们看来都有问题。“全球化”被解读为一个宏大的历史动因，其实它不过是 20 世纪 70 年代危机中地缘经济的产物，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生产分配大转移，简单地说就是“外包”。造成这些标签失实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当前这个阶段缺乏一致性和真正的新意。即便是互联网的产生，如兰德尔·柯林斯所论，也不过是再次引发了机器取代人力劳动和人的生计这个老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1 世纪头十年这段时期的主要境况，并非产生于新的

结构性因素，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表明了既有因素的消亡。我们指的主要是三大“旧左派”运动的枯竭与衰亡，即“第一世界”核心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改革主义，“第二世界”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共产主义革命专政，以及“第三世界”的民族民粹主义运动。

“旧左派”过去的辉煌是 20 世纪地缘政治动荡的直接产物，这不是抽象的“人类进步”的高歌猛进，更不是个体阶级意识的成长，而是直接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以及各国国内民众的动员，后者让人民不分种族不分性别都获得了机会。在本书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迈克尔·曼以各自的方式勾勒出了这条资本主义内部变迁的主线，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则更多地着墨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崛起以及造就它们迥异结局的过程与势力。向触角更广阔、更具侵犯性的现代国家制度过渡这一长期的历史趋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极大的促进。1917 年后，不少国家的左派势力发现他们突然拥有了捕获战时国家机器的能力，进而能将这种国家能力用于工业化发展和社会再分配。其间又恰逢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这给了左派——当然还有法西斯主义者一个政治机会。在他们的夹攻下，那些奄奄一息的贵族王朝、信奉自由主义的寡头政权和那些还停留在 19 世纪的殖民帝国全都名声扫地并濒于破产。1945 年后的冷战则将那个时代变迁的产物固化了几十年。冷战（也是谬称，实际上是多方停火和外交默许的“冷和平”）将西方民主内在的改革妥协和福利供给制度化，从而遏制了长期潜藏于西方的革命幽灵。冷战同时确保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共存，从而也遏制了西方的战争幽灵。通过对原有殖民地提供政治保护与经济援助，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将殖民地人民对西方的仇视转化成对普世现代化的乐观期许与合作。这是用许多年世界大战的错误与牺牲换来的丰厚收益和美好时光。

然而好日子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戛然而止。克雷格·卡尔霍恩提示

我们注意，这时的政治转型并非始于右派的再次崛起。恰恰相反，最早挑战冷战妥协体系的是年轻的新左派。他们追求更美好的愿景，要求铲除官方的虚伪和僵化的官僚体系。无论在东方、西方还是在南方（指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当时各国的体制确实都呈现出了僵化官僚和伪善专制的各种病征。然而必须强调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这些令人诟病的体制全部来源于先前那个狂飙时代追求现代化、社会改革、反殖民或者革命的运动，是那时建立的各种政权的后期阶段。不论那些被大肆渲染的意识形态分歧和战时催生的国家制度都依赖于被美国人戏称为“大政府”“大工会”“大企业”的三大组合，还是与其相对应的苏联式工业部委和民族共和国，所有这些政治经济结构都提供了大规模的现代教育以及住房、医疗和福利保障，并以此作为权力及其合法性的来源；这种保障通常意味着：工人的终身就业，以及在官僚体系、军队和职业工种中提供舒适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不少弱势的社会群体，比如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裔、少数宗教信徒、移民和性别弱势群体，苏联的非俄裔居民和非无产阶级，第三世界贫民窟里新来的乡下人。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感觉自身被排除在官僚化组织的繁荣之外，却无法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激情的学运分子和知识界异见人士的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他们传播组织技能和“造反”的意识形态与口号，矛头直指当时的“体制”。

新左派在哪里与潜在的社会紧张关系对接（通常是不自觉地），反体制运动就在哪里受到追捧。这种社会关系的紧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工业衰退，人口迁徙，城镇、社会、地理的变迁，受压抑的民族记忆，甚至从前被现代主义的城市、工业、国家规划者边缘化的精英教派斗争都能激起社会关系的紧张。这些反权威的造反派基础广泛，他们更偏向于采用非暴力的斗争策略，并把诉求集中在从官

僚主义的一律化中争取自主权和对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认可上，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身份政治。他们深刻地改写了革命的历史模式，同时也在马克思以经济阶级作为基础的社会斗争之外开辟出了新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纷繁多样的抗议活动之所以看上去有着共同的目标，是因为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其中不少体制中还盘踞着居高临下、家长作风严重的领导人。这种局势很容易让抗议者以“我们针对他们”为诉求，在公共空间里引发大规模的极端两极化的对抗。1968年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1978~1979年伊朗风起云涌的反巴列维游行、1980年的波兰罢工、1989年波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示威运动都是如此。当然，还可以算上2011年埃及的反穆巴拉克运动。

这些运动的参与者、评论者以及对此带有同情与共鸣心的研究者把绝大多数的注意力都放到了运动抗争性的一面，毕竟这一面充满了激情和希望。当时对运动参与方的一些分析通常会对受困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忽略不计或者是做想当然的推断。很奇怪的是，对大部分这样的运动，当时的官僚体制似乎都不愿意采用一面倒的恐怖镇压手段。这实在让人有些意外，因为不论是“资产阶级的猪仔”^①，还是“共产主义的干部”都有能力而且也有实力对不听话的市民发起大规模的暴力镇压，就像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在1968年革命激荡的浪潮中，悲观的预测十分流行。我们不要忘记当时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继续被短暂复兴的欧洲法西斯主义所控制；拉丁美洲经历了独裁统治；南非还在推行种族隔离；阿拉伯国家政变和“紧急状况”频发；而在东亚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反共产主义国家都遭遇了内部暴力，例如军政府统治下的韩国。以国家暴力应对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每个运动都是本土化和特定的。

① 对只顾自己赢利而毫不关心劳苦大众的资本家的蔑称。——译者注

然而镇压主要是发生在世界的一些极端地区和半边缘国家，那里的政权还比较虚弱，而且通常是刚刚建立起来。

国家对抗议的不同反应指向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在西方和社会主义阵营，政治体制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确实已经完全官僚化了，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东亚则不是这样。前者的制度和统治者是在20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中形成的，在冷战不稳定的平衡中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些国家的高级官员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法西斯准军事组织的失控、斯大林的大清洗或是20世纪拉丁美洲屡屡出现的种族和劳工冲突暴力还记忆犹新。也许是因为新左派压倒性地采取了和平与文明的策略，而不是像旧左派那样诉诸革命暴力，这让国家安全部门无法找到暴力镇压的明确对象；也许是因为处于高度制度化环境中的官僚和政客形成了谨慎的态度从而有助于避免出现公开的冲突。总之，这些“后马基雅维利主义”^①的统治者们采取了官僚阶级惯用的“混日子”的策略。这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甚至是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的真知灼见：向前展望，我们要说的是，在预期可能出现更大规模的危机甚至革命时，社会科学必须优先研究暴力行为的产生条件和现代官僚国家应该如何避免使用暴力。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体制内官僚们混日子和逃避政治选择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都很有有效的解决方案。新左派运动像烟花一样迅速地绽放，又迅速地燃尽。但是其破坏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以长期的视角来检视时更是如此。那些声名狼藉并一度不知所措的统治者们开始放弃原先对工业现代化、全民就业和福利的承诺。在西方国家，政治系统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以可控的方式来推行这种

①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译者注

转变，同时把这种转变称为后工业化、灵活性和全球化的新时代。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个过程失控了，造成了政治和工业经营的恐慌，结果是国家的碎片化和大规模的私人掠夺。信心不再的新左派在共产主义灭亡中取得了代价重大却又得不偿失的胜利。但是与组织化的（更准确地说是官僚组织的）旧左派不同的是，新左派的进攻力没能转化成足够的制度和政策，以便其在现有政权倒台时夺权。此外，当时的去工业化以及高等教育、文化事业和整体福利遇到的经费缩减很快就击垮了民众信心的基础，因此也瓦解了新左派反体制进攻的支持基础。

与此同时，另一种民众运动正在右翼中产生。新右派从沮丧的新左派那里学到了很多斗争策略，甚至一些原来的左派运动人士也加入了右派的队伍。这个向右翼的转变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漫长时期的结束，那些熟悉的符号、策略和演练到精准的谈判方式也成了历史。对此的政治反应是身份政治^①，这使得人们在政治上又多了一个污秽偏激的指控方式，因为身份认同通常是无法妥协、无法商谈的。新右派有两大类型，虽然常常交汇在一起：热爱种族或者热爱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与强调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两方都要求用军事手段来保护他们信仰中的原教旨主义成分——或者其他被称为社会根本认同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原教旨主义都把怒火撒到了政府官僚体系上，指责它们过于世俗化、远离民众、偏离正轨或者机构繁复。各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和其他当代原教旨主义的疑虑和恐惧几乎都伴随着对小本生意、小城镇生活和家长式作风的家庭的歌颂，这很能说明这些原教旨主义的一些问题。

①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新社会运动的一种理论，即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在于“阶级结构”，而在于人们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公民身份、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不同身份。——译者注

左翼力量在全球迅速衰落，在公众脑海中留下的位置被政治冷淡或者原教旨主义的愤怒所取代。这个群众政治的逆转给西方资本主义精英中的保守派打开了机会之窗。新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谬称，它实际上来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信念，认为如果人们在追求和处理利润时不受限制，那么最终会让人人都有收益。世界的进步、所谓的人性法则和至高无上的理性不过是 19 世纪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信念的支持。新自由主义只承认最纯粹的、不受任何监管的市场是资本主义，这显示了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原教旨主义特征——正如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只承认他们自己那套激进的信仰才是真正的宗教。然而历史则告诉我们，在任何实际经验中都找不到自由市场的理想类型；自由市场纯粹是意识形态的幻想。追随费尔南·布罗代尔和约瑟夫·熊彼特的足迹，我们也认为持续的利润总是需要一定的国家保护和市场垄断的。正是霸权式的垄断使美国的实力和金融业在 21 世纪初再次复兴。当时迈克尔·曼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都公开反对过美国建立全球帝国的计划，他们两位也都做过分析论证来质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确凿证据来显示当初这些预测与事实的相符之处了。

正在结束的这个 40 年的阶段可以分成大体等长的两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 20 年标志着 20 世纪左派运动以及政府主导的国家发展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危机和崩溃。在其后的 20 年中，也就是 1989 年和 2008 年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之间的 20 年中，美国的实力从冷战的外部压力和社会妥协的内部制约中解放出来。蒸蒸日上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们宣传的是资本主义回到了常态这

① 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2003);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一乐观信念，并把它打扮成了全新的、不会终结的全球化时代。1989年后的盲目乐观实际上类似于1914年前经历的那种常态（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那个年代虽然也保守，但受到越来越强力的国家影响）。在那个左派衰败、非西方民族被征服的时代，资本家们追求的是让他们的目标大体上不受国家政府要求或者社会政策考量的限制，而新的交通技术和殖民统治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也第一次在历史中造就了可供资本家任意驰骋的真正的国际化舞台。

21世纪全球化的前景对其倡导者而言更加光明。美国的霸权避免了帝国主义竞争者的出现，正是这种竞争在1914年打碎了上一次的全球化。劳动密集型生产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向位于边缘地区的更廉价的“新兴”地区外包，这颠覆了分国界的劳动和环境监管，并给各国政府和各国公民带来压力，让他们必须更具“国际竞争力”。政府监管的解除使领先的资本主义群体得以从极其复杂的国际金融游戏中攫取超额利润。即使是大众的革命运动，也奇怪地回归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从资本主义的敌人变成了原先封闭的国家中的民主倡导者。这种符合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倡导者主要是一批非政府组织，它们像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信徒一样在全世界扮演着民主传教士的角色。过去在政治上和金融上都十分蹩脚的殖民主义在最新的全球化时代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强力的放贷机构的非直接控制、美国军事基地组成的全球网络以及国际顾问、全球大众媒体和边缘地区年轻精英们共同认可的规范，这些规范正是这些精英在美国大学接受知名的工商管理 and 政府管理教育时获得的。这个新型的制约制度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非法洗钱的机会，渠道是作为避税天堂的小国组成的全球岛链。剩下的几个不服从不妥协的“流氓国家”可以被称为邪恶轴心，作为残暴的对立面发挥其意识形态作用。

这些精彩的设计还是碰到了世界体系在20世纪的重大变革中形

成的结构现实。回到1914年前帝国主义的常态是不可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个超级大国，这在现代时期是前所未有的，但即使这样，这一超级大国也无法达成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采用过往帝国残酷的强制手段，其效果必然会适得其反。或许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国狱卒们并没有采用盖世太保或者萨达姆式施暴者的做法。但不管怎样，许多无耻的图片被公布出来后，在整个中东地区掀起了一场民族愤慨的风暴，在西方世界也遭人唾弃。这样的事件以及1968年后西方社会对本国军人伤亡的厌恶给运用暴力手段增加了政治制约。此外，在军事高科技化的时代，后勤给养线过长而带来的巨大物质成本不降反增；其结果是美国在海外充当政治警察行动的开支越来越大，这使其在政治层面上无法取胜。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看到了美国霸权及其新保守主义全球化面临的另一种制约。尽管减税和精简政府的呼声一直很高，但世界各地实际的税收水平几乎都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等一下，那么各种预算危机、公共就业缩减、养老金缩水以及教育和社会服务经费不足的问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个谜题背后，我们发现的是盈余持续地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政府渠道进行了再分配。再分配正在向上转移，转向更强大国家的民众，并极大地转向那些拥有政治和金融决策权的精英手中。其结果就是，这些人手中积累的巨额财富使他们实质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寡头。这个过程很简单。社会再分配的削减（从广义上来说，还包括工业增长和就业领域的政策）使依旧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流动的资金可以自由地被输送到金融寡头那里。可以通过对“大而不倒”企业进行可耻的救市行为，但主要形式是最近几十年无止境地制造借贷，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家和单个家庭在预算上的不足。

问题就出在这里。政府和家庭需要足够信贷的原因是邪恶的

(没错，就是贪婪和债务质役)，但很明显这些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久远的过去，资本主义由精英把持，满足高等阶级的奢华消费和国与国之间军费高昂的战争需求。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由于大规模市场的需求和政治合法性的需求，开始依赖大众消费。此外，20 世纪公众的政治参与以及对国家的依赖也使资本主义不敢造成太过严重的人类痛苦以至于出现具有破坏性的强烈反弹。这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功能不断增加这一历史趋势中的“棘轮效应”^①。

民主化在过去两百年间即使不是不可阻挡的，但确实是一个真实的趋势。这意味着很多人，包括那些对既有秩序最忠诚的人，在人生的过程中都会期待三件事情：第一是长年的教育；第二是稳定的收入和合理的就业；第三是年老后获得养老金。在这个期望值的名单上也可以加上住房，而住房的提供是十分昂贵的。最近几十年住房的普遍私有化把这一经济负担转移到了房屋所有人的个人身上，同时把他们也变成为资本主义利益投票的小资本家。但是这个转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房贷的激增，并且让年轻的一代失去了拥有房产的希望。2008 年多国的房贷市场崩溃使这个矛盾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对国家而言，需要的是技术熟练、足够健康的国民作为劳动者、顺从的纳税人和爱国的征兵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历史趋势不可避免地给私人利润带来压力。西方的资本家通过他们自己的抵抗来应对这个压力。复兴的市场保守主义成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平台，而市场全球化则是他们的主要战略。新右派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要求通过政府紧缩政策和去除监管来让资产阶级自由地采取自己喜欢的手段，以应对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并且从未缓和过的经济巨变，全球化首要

① 棘轮效应 (ratchet effects) 一词最初来自对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研究，即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译者注

的目的就是让大额资本可以在以国界为限制的监管体系之外流动。资本流动和税收的压力使大部分政府只剩下三个让人反胃的选择：多印钞票、举债、通过慢性经济窒息或者警察直接的暴力进行镇压。每个选择都有其内在问题。哪怕是对贫困、边缘化和反抗群体的镇压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使那些在道德上赞同镇压，尤其是实际执行镇压的人保持忠心。但是当其金融的流向已经被寡头利益控制时，政府去哪里找这么多的钱呢？

这就是最近几十年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参数。如果能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同样的困境一定會在短期和中期内更加严重。因此沃勒斯坦关于资产阶级扩张会自我限制的理论和迈克尔·曼关于地缘政治扩张在今天遭遇限制的论点是相互印证的。由于缺乏有组织和有效的反对力量，金融资源在一极的积累可能会过度。但正如美国的军事垄断并不能使其在任何地方都发挥全部实力，因为这已大大超过其帝国主义的目标，金融垄断在某一点上也会不可避免地像用纸牌搭起来的房子一样瞬间倾覆。积累的那些名义货币不能有效地被利用，因此那些实力根本就是虚构的。

这个宏观图景与西方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最为密切。如果把其他地区也加进来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当然，中国奇迹在这里显得十分抢眼。我们当中有几位年纪够大，还记得经济发展的专家们普遍看衰东亚前景的那段时日。当时冉冉兴起的明星是菲律宾、君主制的伊朗，还有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后两个国家完全复制了西方的制度、拥有现代的基础设施、规模很大的国内市场、受过教育的技术官僚和中产积极。与之相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受困的“军事体制”政权，当时的新加坡和香港则是历史遗留的殖民地自由港，几乎各方面都很欠缺：既没有国家主权，也没有中产阶级、自然资源或者现代教育。在当时的专家看来，东亚国家受到人口过剩、难民问

题严重、权贵和腐败横行以及其他各种所谓不变的亚洲传统的拖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这些因素后来又被专家们当成解释亚洲成功问题的标准答案：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较小的国内市场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出口的机会，包括缺乏石油这样的“资源诅咒”，此外还有共同的重纪律、勤奋、相互支持和服从权威等亚洲价值观念。甚至连这些政权的专制主义，不知怎么也成了保持稳定的因素，或者是具有适应力甚至是具有远见卓识，而非意味着权贵和腐败。

兰德尔·柯林斯在他过去的研究中指出东亚的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中古渊源，是从佛教丛林制度的有组织经济中演变出来的^①。学术界现在已经广泛地接受东亚作为一个世界区域或者自身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这里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大最有活力的一些市场。从东亚传承下来的技艺、资产和社会网络在 20 世纪通过各种偶然的，通常也是血腥的路径重新崛起。正是 1945 年以前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后来美国抗衡共产主义的各种战争，催生了一系列发展主义的专制政权。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大陆最终加入这个外向型世界体系的过程，基本上是一系列国际和国内政治突发事件的结果，尽管这些突发事件在结构上早已蓄势待发。

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试图把最近东亚的例子也作为不受限制的市场能带来企业精神大爆发的例证，这根本是缺乏历史分析和实证根据的。东亚一直就是监管严厉的法团主义国家的典型例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减少监管的政策和东亚的重新崛起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是新自由主义把更多的生产活动从西方吸引过来输送到了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在这些新投资地是不

① Randall Collins, *Macro-History: Essays in Sociology of the Long Ru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A.

受监管的。确实在很多国家里还有大批贫困人口愿意接受长工时和低工资。但是这些劳动力首先必须被组织起来，然后经过训练才能投入生产。当地经营者的抱负和贪婪也要被组织起来并有所约束后才能发挥作用。此时，国家正式组织的连贯性以及非正式组织通过约定俗成的观念和 network 来约束社会领域的能力，就能对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腐败丑闻说明了法团主义国家契约中的一个核心因素，在这些国家中来自商人的回扣是官员的重要经济来源。然而正如纽约以前的一位政治人物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的名言所说：“有老实的贪污，也有不老实的贪污。”在这里，国家能力主要是指根据表现来选拔官员，包括官员对组织和自上而下分享“老实”的贪污这一做法的忠诚度。这造就了可预测的制度环境，对资本家而言这是很有吸引力的。

东亚历史的文化和经济遗产尽管有些独特，但并不全是东亚所独有的。随着全球资本持续流动地寻找新的生产地，可以预期还会出现更多奇迹般的经济复兴。印度和土耳其已经提醒我们，在注意亚洲过去的经济奇迹时不要仅限于中国。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正随着拉丁美洲的左转而显现出来，在这里领跑的是巴西。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论调如何，也不论其对公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原住民运动采取的是什么策略，其效果都是推翻了拉丁美洲传统上依赖列强、寡头和军事宗派的政治模式。这个遍及整个拉美地区并引起剧烈冲突的不均等过程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矛盾，但还是打造了真正的民族国家。当社会运动的领袖取得国家权力后，必须通过打压地方要员的权力和他们的准军事力量以及贩毒集团才能获得实权。一个方法就是将军队和警察交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事机构来管理。另一个与巩固新民主相关的办法是让国民融入由中央管控的提供人权保护、社会福利、土地租赁和就业机会的机构中。也许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

新的、更好的资本主义。在 21 世纪里，拉丁美洲终于赶上了先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法团主义国家变迁的模式，因此也为新一轮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非出现真正的灾难性情景，否则西方、日本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持续的衰退可能会促进原先第三世界地区的工业崛起。在过去，处在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国家通常会因为核心国家的动乱而受益，因为这些危机可以帮助降低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使核心国家放松对全球市场的政治控制，并为劳动成本更低的生产者提供赢利的机会。欧洲大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经历过的一轮进口取代式的工业化并非偶然。20 世纪 70 年代后，东亚的外向型工业化则是受到核心地区去工业化带来的外包驱动，而苏联解体后其原加盟共和国的出口市场和资源提供在中国，特别是在土耳其的经济扩张中也起到了作用。

我们五位都认为全球不平等差距的缩小是令人向往同时也是真实可能的前景。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讲，这会把短期的痛苦降到最低并将在中期到长期时段能将这个世界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潜力最大化。迈克尔·曼则在这里找到了维持市场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即以 1945 年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复苏为模本打造一个更平等更繁荣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看上去确实是很好的前景，但是这和以私人赢利为标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能兼容吗？沃勒斯坦和柯林斯都不认为“其他地区的崛起”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预测有什么矛盾。相反，国际市场中新的资本主义参与者以及受过教育、具有流动性和全球竞争力的中产阶级可能将加剧资本主义的困境。

至此，我们再把最近的状况推演到近期的未来，那么高科技的资本主义内部或者全球世界体系和地球生态可能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迁又有哪些呢？

二 “系统极限”对“无止境的集约化”

迈克尔·曼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持乐观态度，对环境危机的看法却十分悲观。“其他地区的崛起”至少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为资本主义带来近乎无穷大的发展空间。较贫穷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及其带来的全球城镇化及人口迁徙正在深远地影响世界人口、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一切最终会逐渐地稳定下来。迈克尔·曼对是否存在泛系统的结构或周期表示怀疑。他认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这四种异质且结构独特的社会权力网络将通过五花八门的形式重新结合在一起。原则上来说，还无法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迈克尔·曼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预测，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资本主义将继续保有韧性，尤其是在更务实的自由-劳工政治的指导下。

迈克尔·曼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斯·韦伯的结构性视角。他综合了权力模式的四个维度，指出当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来源相互交叉时，普通的历史事件会成为历史转折点。在20世纪早期，这个转折点是世界大战与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而加剧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二者的结合。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疯狂增长与多元政治的僵局这二者的结合指向的则是生态危机。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无法超出这四种权力来源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结构性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原因都能够引发无法预测的相互交叉。这里，迈克尔·曼不赞同柯林斯和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危机的看法。相反，他强调除非政治动员能够有所作为，否则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将会是灾难性的。因此在他看来，主要的偶发因素是环境（或者更广义地说是经济）与政治领域的相互交叉。

克雷格·卡尔霍恩赞同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外部威胁，特别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是环境威胁作为中心问题的看法。和其他作者一致的是，卡尔霍恩也认为未来并不是完全确定的，因此政治行为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他认为内在的系统风险对资本主义的挑战比迈克尔·曼所说的要严重得多，而资本主义要存活就必须恢复原有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既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又能补偿资本主义将成本和损失外化为社会整体负担所造成的问题。按照沃勒斯坦和柯林斯的思路，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能否持续承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攀升的成本。这不是纸上谈兵。社会科学家应当关注并度量资本主义的动力，判断资本主义创造的新财富能否抵消这些成本，判断将利益分配到全球相互连通的社会结构中去的那种政治机制是在增强还是在衰落。

迈克尔·曼和卡尔霍恩都认为严重的环境危机很快就会到来，并会对在经济发展方面仍然可行的资本主义带来挑战。柯林斯和沃勒斯坦把环境风险看得更为长远些，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十分迫切。柯林斯引用科学界的共识，预测重大的环境危机将会在 2100 年前后发生。迈克尔·曼则认为在 2030 ~ 2050 年以前，严重的生态破坏就可能会威胁到一些国家的存亡。柯林斯和沃勒斯坦则预测全面的资本主义危机将在 2040 年前后的几十年间出现。因此他们认为，我们将在环境极限到来之前就遭遇资本主义危机。如果我们持柯林斯和沃勒斯坦的观点，那么可以想见或许会有一套社会主义的方案，通过改变政治结构来应对资本主义危机，以至于生态危机最后也能相对轻松地得以解决，而如果资本主义一切照旧的话，就很可能无法解决生态危机。迈克尔·曼的看法不太一样。任何大型的资本主义危机都会显著地降低 GDP 的水平，因此也会减缓环境危机（在全球变暖不太过分的情况下）。在他看来，造成气候变化的三大罪魁祸首，除了资本主义以外，还有民族国家和进行大众消费的普通民众。危机的解决必须要同时限制并改革这三者。无论危机后存活下来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

义（或者其他什么制度），其形式一定是全新的。

此外，迈克尔·曼和卡尔霍恩更注重西方之外的资本主义活力。对迈克尔·曼而言，真正具有全球性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生态危机。因此不能说在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和地缘政治霸权衰落之时，世界领导权就会转到诸如东亚这样的增长地区，或是转到诸如金砖国家这样的联盟手中。环境学家们认为，最严重的环境灾难很可能将首先在中国、南亚和非洲地区出现。这种预测与新兴的全球领导地区将取代西方的看法相左。迈克尔·曼的观点是，生态危机可能会是整个人类的末日。如果不那么纠结于字面表达的话，我们要考虑三种，而不是两种可能出现的情景：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终极危机；资本主义旧霸权的衰落及被新霸权所取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发生巨变以及巨变带来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结果。柯林斯和沃勒斯坦认为第一种情景会出现，迈克尔·曼则认为第三种情景会出现。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兰德尔·柯林斯对情况的解读并不相同，但又相互一致。他们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体系，或者说是作为一种通过经济食物链和市场利基而形成的等级化的生态系统。像其他复杂的系统那样，资本主义也有其相互关联的结构和动态趋势，因此也一定有其终极的极限。即使新的地理发展和生产技术可以提高系统极限，但极限本身不可能消失。没有人能够具体地列出资本主义之后这个世界的各种制度和参数。在这里，克雷格·卡尔霍恩的理论插了进来，他提醒我们留意世界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人们在斗争后作出何种政治选择。不过柯林斯和沃勒斯坦还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接近其极限，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将会出现全球性的转变。他们明确具体地列出了推进这种转变的结构性过程，因此对他们的假设我们可以批评审视，甚至可以进行实证验证。格奥吉·杰尔卢吉扬把苏联作为检验柯林斯和沃勒斯坦过去预测的例子，从理论和实证上检

查了哪些预测成为现实，而哪些没有成真。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轨迹显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单位是如何在达到其自身成功的极限时，在结构性重压和完全偶然的因素双重作用下解体的。

迈克尔·曼的预测（或者说是对其未来的估算）与柯林斯和沃勒斯坦的预测对应的是进化人类学学者总结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动态模型的两方面。用术语来说就是人类生态的“承载能力”对应其“生产的集约化”。在这个模型中，以往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最终造成环境的饱和，或者说是达到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这种达到极限后出现的危机可能会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是灭亡。人类群体因为饥荒、瘟疫或种族灭绝式的战争部分或者全体地灭绝，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断重复的惨剧。这对应了马尔萨斯理论中实际人口根据可养活的人口数量进行调整的悲剧性周期。人口减少的阶段会创造以原有基础恢复生产活动的条件，直到环境再次达到其承载能力的极限，并再次引发一段困难期。第二种可能是多元化。这让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未开拓的地理疆域并在适应当地条件后进行移民——从北方的冻土地带到热带的岛屿，从大草原到沙漠、山区和森林，直到人类占满整个星球。第三种可能是所谓的进步（即全部技术资源集约化的质变），这让人类能从有限的资源中不断获取更多的所得。这一条是人类社会创新演进的主要驱动力。

复杂的阶级社会和最初的国家是在富饶、令人无法丢弃的地区产生的，比如夹在沙漠和山区之间的肥沃河谷。著名的“牢笼效应”就是迈克尔·曼以前在研究古代帝国、市场和宗教时发明的术语^①。意思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区域。历史上的这种情况迫使一些人类群体演

①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另见 Randall Collins “Market Dynamics as the Engine of Historical Change,” *Sociological Theory*8 (1990): 111–35.

化出本质上全新的范围更广、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即新文明），从而增强了在这些人类已经长久定居的地区中继续汲取和交换剩余物资的能力。“迫使”强调的是很多人不愿意成为奴隶、农奴或者朝贡者，但由于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地区，而武士和僧侣精英又推行了强制措施，因此这些人被困在了“牢笼”之中。在过去，生产技术的集约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重组同时发生。这些变迁过程都伴有大量的冲突。

在本书中，迈克尔·曼认为资本主义将继续保有韧性。卡尔霍恩大部分赞同这个观点，但他更强调资本主义要想复兴必须要通过一些方式来改变自我。卡尔霍恩还强调一般的资本主义和最近加剧系统风险的不均衡的金融资本主义这两者的区别。在迈克尔·曼看来，资本主义有通过生产创新、全球化和深化消费市场实现自我集约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如果资本主义被毁灭，那么一定是核武时代军事冲突的爆发达到了毁灭的极限，或是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危机。前者依赖的因果链大体上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因此具有偶发性（即不能从对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分析中加以预测）。这是迈克尔·曼和卡尔霍恩的观点与沃勒斯坦和柯林斯的预测主要的分歧所在。然而环境危机毕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之一，与政治和文化因素相互交叉。因此反过来说，即使交叉的因果关系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消亡，资本主义还是有可能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衰亡。

兰德尔·柯林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接近其结构性极限。他们都承认资本主义有超常的能力扩张并强化自身的政治经济。资本主义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囊括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口和生产资源。19世纪农业和产业工种被机械取代的过程并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当时所预言的那样造成西方的贫穷化和革命，因为私营企业和政府官僚体系中现代管理、专业技术和职员类工种的发

展制造了现代中产阶级这个良好的缓冲带。但在 21 世纪，这些空间上和制度内部的预留地最终会被耗尽。如果这个主要考察寡头过度积累和中产阶级危机的模型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相关性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终极危机的形式将是在一段漫长的衰落期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危机。

然而最终我们都赞同一点，那就是迈克尔·曼迫使我们考虑的三种无法估量的情况：气候变化、瘟疫和核战争。它们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威胁并不是不可估量的。不可估量的是灾难发生的时间。人类对这三者的理解很深入，但是不确定因素太多，研究者们也都观点不一，以至于我们不能肯定究竟会发生什么。除去那些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理由而拒不承认的人以外，气候变化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另外，造成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还在加速而不是减缓。对于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穷国和富国的政治分歧很大，至少现在无法达成消除这个风险的协定。

不过地球的生态系统是如此复杂，而气候变化的规模又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也不知道还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比较明确的是海平面已经开始上升，并且会继续上升，这很可能导致大量陆地被淹没。另一个比较明确的是世界各地的平均气温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将继续变化。但这些也会造成农业和能源产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能抵消其他地区的损失。

瘟疫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全球医学的巨大进步似乎成功地控制了很多疾病，然而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情况，那就是细菌这个人类古老的敌人又找到了新的途径来抵抗我们。人类在这方面的知识似乎也不少，但是说到最后，其实这种知识是少得可怜。在和时间的赛跑中，我们的学习速度能有多快？为了人类的存活，又必须破除多少原来的陋习？

不要忘了还有核武器能将人类灭绝这个幽灵的存在。自从冷战结

束美国开始傲慢地推行单边主义以来，核扩散就变得难以避免。可能没有马上爆发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危险。实际上情况或许正好相反：核武器本质上是防御性武器，因此会降低而不是增加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概率。但是还是有几种无法估量的情况。非国家个体的动机不一定和那些负责任的官员一样。毫无疑问，想获得并使用核武器（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大有人在。许多国家在防范这类武器不被他人夺取或购买方面能力有限，这有可能使非国家的个体获取这些武器。还有可能出现流氓式的国家代理人，我们永远不要排除会出现小说中“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那种人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很可能会在全球转变的过程中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但也可能无法避免。这取决于新的政治结构何时出现并以何种形式出现。可以想见这种新的结构将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甚至排除出现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让我们更明确一些，这些不仅仅是自然灾害，饥荒、瘟疫和核恐怖主义绝对是整个人类面对的政治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其为无法估量的对象。寻找有效的反制措施意味着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许多人遇到这类危险时主要的反应是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式的大幅度向后撤退。这意味着寻求建立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体系的人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制定政治策略来抗衡这种趋势。

三 转变

我们都认为会出现的一个大趋势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全球政治经济原有的布局肯定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但将如何改变现在还看不太清楚。政治人物、社会运动和媒体评论家想靠传统智慧来应对未来的岁月，那肯定会是手足无措。政府和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会发现它们的权力衰弱了，它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屡试不爽的策略如

今要么失效，要么带来全新的问题。抗议者可能还是那么愤怒。但是对抗议的对象究竟是谁，应当要求什么，如何组织和与谁结盟这些问题，抗议者可能远没有过去那样明确。我们对过去历史转变的理论知识不足以为未来提供完美的建议。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的理论将会做出重大的修改和补充。一部分的原因是，许多问题和前景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不过这正是科学知识的特征）。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知道重大的历史转变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时进行。正如地缘政治理论一直以来的预测，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明显正在处于衰落中，其在生产力、金融以及迫使中国和欧盟政治服从方面的最大储备正在消耗殆尽。一个大问题是，西方将会是迅速衰落还是逐渐衰落。我们最大的希望可能是通过老牌西方国家和其他正在崛起地区的协商（即非毁灭性的）来平均分配财富和权力。

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共识是未来世界的前景并非已经确定。政治斗争会产生各种可能的结局，这点在决定人类未来的路径和集体命运时至关重要。此外，社会科学可能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发挥作用。宏观历史理论已警示我们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一个比较中庸的可能性是碎片化和退化（即沿着基本上不变的方向继续发展，但是发展迟缓，情况更加糟糕）。与此最接近的实例就是苏联的命运。还有一种可怕的可能性是，依靠愤怒群众的社会运动和凶猛残暴的国家警察进行法西斯式的专政统治。不幸的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表明，这种情况至少在几十年里可以维持一个一大群人通过压迫另一大群人而受益的政治经济体系。德国那个格外邪恶和狂妄的纳粹政权最终是被外部战争击败的，而不是被内部政治变迁或革命搞垮的。

然而相同的理论也指出在未来动荡的年月中，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光明的路径。我们的期望在理论上植根于对历史的考察，人们过去在

面对重大的结构性危机时倾向于建立本质上全新的，并且更广泛的集体权力。这个趋势带来了人类创造力的周期性衰落和爆发（虽然远非次次都是和平的），最终为新的稳定和繁荣期奠定了基础。

现在人类再一次面临这样的周期，这一次涉及地球上的整个人类。我们过世的老朋友和同事乔万尼·阿里吉曾经说过，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在他的分析模型中，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经历了几次空间扩张和重组的波峰^①。在16世纪资本主义形成期的混乱中，欧洲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身及其企业，首先的行动就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以此相应地获取了支持它们的陆军、海军和税收机器。用更细分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主义通过保护成本的内化而取得了其历史突破。下一波的行动则是通过生产成本的内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深化和巨大的殖民扩张，也就是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英国领导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个时代也带来了多重危机，主要是商业周期、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制度化以及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后者在1914年险些将资本主义置于死地。20世纪美国的霸权增加了另一种复杂的可能性，即交易成本的内化，这有助于缓解上述危机。在多重危险面前迫切需要稳定的资本主义体系，这决定了1945年后出现的由现代政府、经济企业和国际组织组成的复杂而宏大的体系。

从逻辑上讲，这个时代在21世纪还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和环境再生成本的内化。让我们考虑一个过于宏大以至于政策讨论通常不会涉及的事实：在过去的一万年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乡村中。乡村社区的发明（其实是在各个地区不断地

^①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Update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10).

被发明的）标志着人类集体能力的一次重大重组。这使考古学家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农业社会成为可能。乡村的生活模式使中等大小、没有血缘关系的群体能够全面并稳固地组织他们的集体事务。这涵盖了所有与社会再生产相关的方面：劳动分工、对资源的传统式管理、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促进文化和技能的传承、遵守各种保持群体团结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宇宙观上的）仪式，还有各种神秘的或平常的乡村舞蹈。总而言之，乡村社区把人类从生到死的所有功能性和情感性因素全都组织了起来。而自组织的乡村后来也成为从部落到城邦再到帝国的所有复杂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

资本主义出现时，这个世界还是以乡村为主。但资本主义的市场和地缘政治活力很快就开始颠覆乡村社区，因为需要村民作为劳动者、殖民者和士兵到更远的其他地方去。就村民本身而言，他们通常也不愿意继续生活在贫穷和处处受到限制的乡下。乡村的消亡有很多原因，比如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人口过剩、识字的普及，或者是帝国主义和军事革命。最终的总体效果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原有的乡村居民开始大量地迁徙到城市中，或者说更多的是迁徙到贫民窟中，这首先是在西方发生，接下来是在日本，然后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后是在世界各地。

城镇取代乡村成为组织人类生活的地方，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其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如此难以解决。因为需要有新事物的介入，才能继续为人类新的聚居地提供全面的规范性的秩序、社会管理、日常安全和福利。此外，这些任务不仅需要在更为宏观的尺度上完成，而且还要比原来的乡村做得更好。不要忘了，乡村确实能够提供亲密的舒适条件和庇护，但这也造成了过度侵扰个人的监管和社会的“牢笼化”。传统惯性形成的保护性、父系家庭中年龄和性别造成的不平等、对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蔑视和暴力复仇的态

度都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现代史上的大规模迁徙、人口变迁和新型政治社群的形成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和痛苦。欧洲向海外的移民有助于改善人口对资源的比例，但其代价是殖民地中的原住民被强行迁徙、沦为奴隶或直接被灭绝，这些原住民没有武器，对入侵者带来的细菌也缺乏免疫力。现代国家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非本民族”的少数民族被镇压和被排除。1914年后，民族主义激进地突变成军国主义和民粹主义毒瘤般的法西斯主义，这把上述的历史趋势升级成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另一种激进的升级发生在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为实现工业化和子孙后代的现代化生活而造成的牺牲恐怕要以百万人为单位来计算。直到1945年后，西方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原来的农民和工人阶级才被政府纳入社会保障系统，得以从经济繁荣中获益。这总计才有几亿人口。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尚且不说政治意愿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南方国家几十亿的人口也纳入进来呢？

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为我们实现“地球村”而欢呼雀跃。对这个乐观的预计要冷静地进行评价。世界大同长久以来就是人们努力的方向，有各种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版本^①。但是作为对一个由稳定国家组成的世界的补充，意义就不同了。另外，全球化还有一些其他更保守的版本，其能量来自于帝国主义的野心、民族主义、反移民运动、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是这些力量的结合。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平台和人类共同的身份认同，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会成为政治争论的主要问题，现在预测其结果还太早。全球层面的系统性危机将带来浩劫、恐慌和各种令人恐怖的反应。但是也会让人们朝着更民主、更负

^① 详见 Craig Calhoun, *Nations Matter: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Cosmopolitan Drea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责，组织上更灵活、更有能力的全球治理方向去共同努力。人类还是可以避免在集体组织形式的复杂性和广度上出现灾难性的后退。也许 20 世纪革命和社会改良运动的经验教训足够丰富，足以抵御近几十年来新保守主义的进攻。也有可能在现代国家复杂而矛盾的制度架构中会出现深刻的变化。至少，这又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太愿意把“全球国家”，更不用说“国家”作为美好未来的政治结构。这其实是最大的未知数。更光明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模式，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观察。我们几位中多数都质疑现存的国际组织能否成为未来结构的原型。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沃斯、G8、G20 和其他这类俱乐部还停留在资本主义融合和美国霸权的时代。目前这些机构因为政治操作与技术官僚的脱节而被弱化或者不得不对许多问题妥协。然而我们当中有几位认为解决环境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组织一个更强大的国与国之间网络——一个超级联合国。其余几位则质疑这样的政治一体化速度是否能足够快，何况其本身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不过，1945 年出现法团主义国家后，世界相对和平繁荣的时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这可能会比其政治制度的寿命更长久。

未来政治变化的结构和方向肯定会让人惊讶不已。大多数人认为从原有的经验中向前展望是最合理的。民族国家不可阻挡的增长的确是整个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现实。但是如果把地球层面上一些我们熟悉的因素重新结合，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呢？不管怎样，这正是兰德尔·柯林斯对最新的技术取代的看法。尽管我们都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现实策略，但我们必须承认，反体制的精神是 1968 年革命最经久不衰的遗产，无论对左翼还是对右翼都是如此。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在边缘地带顽强生存的各种非国家主义运动，更加认真地考虑它们

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组织形式。为现代时期带来变迁的国家权力和民众动员是同战争与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在这些情况下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任何效果。但是如果未来出现非军事的紧急状况，比如说生物物种的灭绝或者中产阶级工种的消失，那时会怎样呢？让我们再认真想想，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确信国家或者国际联盟能够胜任这样的任务来组织几十亿人无私地参与植树、发展新技术、教育后代、照顾老人以及在总体上维持人类的生存呢？一种自组织的动力可能成为那时的时尚。谁知道呢？这甚至有可能带来共识，消除现在左派和右派群众运动的敌对。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前沿课题，那就是当代意识形态和大众政治的动力学。

四 在未来的变迁中社会科学将如何演变

政治期望会不会搅浑我们的理论视野？对此我们的答案是：承认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假设之间的联系是社会科学理论诚实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研究我们自身的时代时。社会理论常常被比作切割不同的镜头，通过这些镜头我们可以总结出人类行为的模式。当镜头完全按照研究者的信仰来切割而去除了所有反对的部分时，那么人们能看到的就只有意识形态了。政治和公共辩论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镜头，其作用更像是眼罩。理论则不一样，因为理论必须接受检验。社会科学中哪些理论能被检验，一直以来对此都很有争议。我们对那些试图在社会科学中确立一种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的做法表示质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者。然而我们也不完全是相对主义者。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分析对象的不同层级让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实验和统计是社会科学重要的工具，但不是普通的。严谨的民族志观察在研究局部社会环境时往往更有效。在我们研

究的宏观历史层面，主要的方法可以比作是把大谜题中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另一个检验宏观历史理论的办法是反事实，也就是在某个历史节点有可能出现但最终没有走上的其他道路。换言之，我们必须说明如何从一个历史情形转变到另一个历史情形，以及在转折点实际出现的各种结构性可能和结构性因素。这差不多是我们这种研究中最接近于实验的做法了。

历史上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冲突、变迁和突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选定了本书的主要问题：如果未来充满重大危机，将会出现怎样的前景呢？社会图景具有流动性，像气候图一样常常会出现湍流。局部事件从根本上说具有偶然性，即便在回顾时我们能够找出究竟是哪些结构发生了变化和解体，哪些人类行为从具体的时间点上产生并最终抓住了可能的机会，从而对事件做出解释。预测长期的具体事件是徒劳的，但预测结构性形态则是可以做到的。以天气为例，预测明年，比如说1月13号在芝加哥会不会下雪，这是不负责任的。这是由于偶然事件发生的时间太“短暂”。而预测明年1月芝加哥会下雪就很简单了。因为这属于对长期结构的预测。然而几十年以后呢？或许那时芝加哥的气候会接近受飓风侵扰的佛罗里达，也有可能变成西伯利亚冻土带那样。

希望在本书中找到对未来准确预测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他们有这种挫折感不是没有原因的。社会预测无法做到准确无误，这是因为在一些结构性选择面前，我们共同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正常时期的选择比较少，但即使如此，能让结果更好一些或者更坏一些的政治选择也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危机时期，当现状提供的常见机制失效时，我们的选择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意识地促进系统转变的策略。即使外部情况没得选择，人类还是能够在与他人的冲突和协作中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科学应当阐明外部情况和涌现出来的各种

可能性，特别是在这些可能性会迅速出现或消失之时。

在这一点上我们对当代社会科学中那种从历史变化的结构性可能中刻意抽离出来的做法持批判态度。我们的批评对两种差异很大的主流思潮同样成立，即后现代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两大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社会科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二者以各自的方式反思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十年后这一段尚无定义的时期、左翼运动的衰落、美国重拾霸权以及新保守主义全球化的野心。

在人文学科更为强势的并被概括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学术思潮对宏大的理论，也就是它们所说的“宏大叙事”一直持极为怀疑的态度。相反，它们颂扬的是怀疑、反讽、生活经历、信仰的解构，以及对各种文化行为细微的诠释。这场学术运动直接来源于1968年的革命以及学术界内部人员的组成变化，即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员比例的上升。这一转变让学者更加关注人类自我想象和想象社会、宇宙的各种方式，这唤醒了一直以来没有被提及、没有被研究的信仰问题，并为此注入了新的批判性视野。后现代主义运动搅动了许多死水，但也只是把水搅浑了而已。

在另一个极端，社会科学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及其在其他学科中形式上的模仿者所主导。这个情况背后的结构与原来星相学的影响有些类似。这里不妨来一些“斯威夫特式的恶搞”。现代时期以前的星相学，就像今天的经济学一样也是一门可靠的学问。无论是在东方文明还是在西方文明中，它都能直达上听。它也能给星相学家带来丰厚的回报，而且得到最高回报的总是那些能触及人类最深刻的不确定性和焦虑问题的专家。在以家庭控制为基础的帝制和封建政治结构中，精英阶层最大的忧虑无外乎是在王位继承和战争中变化莫测的时运。同样，资产阶级的忧虑也来自于不确定的投资选择、市场的波动性以及资本主义运行中偶尔造成的民众反抗。星相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一样，都是一种和当时统治阶级的常识相符合的意识形态学科，然而星相学在其全盛期并不仅仅是对精英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星相学基于几个世纪以来经验观察的积累，是高度数学化的学科，这也是其精华之所在，后来，这成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由于预测只有一半是准确的，实际的预测往往要根据直觉和政治敏感来做一些调整。一个成功的星相学专家必须精通如何做一个精明的臣子。我们今天的商业顾问和政府的经济学家差不多也是如此。

在危机来临并造成政治两极化之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有各种机会来有所作为。比如在市场的替代组织形式方面，将会出现全新的开拓性的研究。20 世纪左派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错误就是低估了市场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对约瑟夫·熊彼特的学术遗产怀有极高的敬意。但是未来如何运用他关于企业活力的理论呢？什么人或者什么机构能够在未来，甚至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之后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呢？有没有可能把企业家的能量更多地引向市场创新而不是破坏呢？

我们对卡尔·波兰尼“虚拟商品”的概念同样十分重视，这个概念包括不能进行交易的土地、金钱和人的生命。在 21 世纪，从广义上讲，“土地”可以代表环境，“金钱”代表国际金融，而“人的生命”是指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成本的内化，这可以通过国家提供廉价质优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当然还有城市治安来实现。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能否在结构上形成运作原则不同的部门，比如在广义的公共服务部门以社会再生产为主要目的，而在消费产品和服务部门以市场有效性为主要目的？此外，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能自身就不是静态的。未来很可能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周期性回归，恢复允许私人财产存在的市场经济。世界可能会更多地是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安排间震荡。对这个过程必须很好地加以控制。

对国家权力的厌恶在政治上的危害性不比对市场的厌恶要小。随

着政治左翼势力的溃败，新保守主义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复辟，通过消除监管和全球化对国家权力形成了严重挑战，这绝非偶然之事。资产阶级早就对“大政府”有所怀疑，其理由相当现实：通过民主选举、街头抗议，或者二者兼有，现代国家有可能被非精英的公民捕获并被用于社会再分配和市场监管这类非资本主义的目的。为了维持和平，曾经必须容忍 1945 年后的大型福利国家的模式。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各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的资产阶级，看到了打败左派并取消“二战”后妥协的机会，他们跃跃欲试。现时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现代官僚制国家在危机时刻和系统性转变来临之时，在处理我们的集体事务上究竟会扮演良性的角色、恶性的角色还是完全不发挥作用的角​​色呢？这个大问题又可以分解成许多小问题、实际问题和有待探索的理论悖论。社会科学家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将有很多重要的学术工作要做。

五 尾声

我们五位作者一起勾勒了世界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种结局。我们总结了许多各自过去研究成果中的论点，并针对未来有所阐发。五个人意见的不统一是有意为之。希望这样可以引起争鸣并促使我们认真思考每位作者独立主题中的观点。我们讨论了问题的各种复杂性、特别的说明和不同的声音，也没有回避那些惊人的，甚至是“雷鸣般”的观点。鉴于所讨论主题的宏大性和严重性，这样做是应该的。未来的几十年绝对不会是平常的，或者说以过去五百年的视角来看将会是异乎寻常的。人类的集体发展轨迹将发生重大转折，但不一定是向糟糕的方向发展。

在结语中我们更为乐观。重大的危机和转变无论其具体情景如

何，都不意味着世界即将终结。基于社会学累积的知识，只要还存在由社会组织联系起来的人类，就没有理由相信历史会终结。幸运的是，全球核战争或者环境崩溃这样最严重的情景看上去是可以避免的，原因正是在于人类的集体灭绝这一问题几十年来已经被人们广泛地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属于这一类的灾难。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承载结构中的危机远不是世界末日。说到底，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光明的前景。没错，这个过程有其内在的危险，但我们要牢记的一点是，20 世纪早期应对危机产生的反资本主义替代品最终发展出了极权倾向，并以官僚体系的惰性而告终。同样不应该忘记的是，许多反资本主义的运动都是直接来源于在世界大战中建构起来的国家机器和人员配置。未来几十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方向将是遏制军国主义并在全球范围内将民主人权制度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僵局会把我们带到历史的节点，在这里，原先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幻想的制度很可能在新型政治经济体系中成为技术上可行的方案。这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个星球生物圈所面临的威胁，并让人类更好地完成其他那些在本世纪后期需要面对的任务。

有些人担心后资本主义会带来一段致命的停滞期，他们的想法肯定是错误的。而那些期望后资本主义会消除自身危机，带来永恒的极乐世界的人大概也错了。在危机之后，或者像我们当中一些作者所预测的，在 21 世纪中叶的非资本主义转变之后，会发生很多事情。希望大部分是好事。我们拭目以待，时间已经不远了。